

炎黄春秋



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64年周恩来与胡志明等在河内合影

同志加兄弟

周恩来与胡志明半个世纪的交往

美国友人目睹的

“乒乓外交”内幕

六十年前谋杀蒋介石案的策划者

——华克之

执掌美国设计斜拉桥牛耳的
桥梁专家邓文中博士

汉末大经学家郑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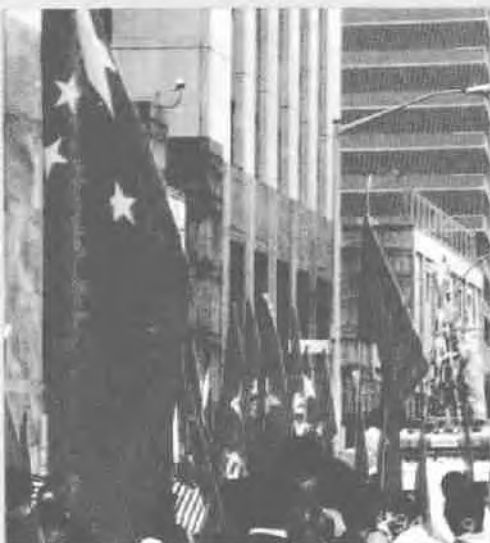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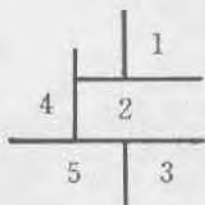
11
94

炎黄子孙 普天同庆

——纽约华人庆祝祖国华诞掠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5周年时，成千上万华人同胞，在纽约中国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场面空前热烈壮观，为世人所瞩目。

邱光欣 摄影报道



- ①莫道返老还童 只缘心情激奋
- ②喜逢佳节 同胞齐贺
- ③尘缘皆脱尽 祖国留心中
- ④汇聚五星红旗下 忘却脚下是他乡
- ⑤引领风骚新一代 誓为祖国铸辉煌



本期导读

周恩来与胡志明半个世纪的交往

这两位当代伟人，从共同在巴黎求学，走上革命道路，到中越两国各自经历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建立了人民新国家，他们始终同甘苦共患难，共商国策，相互支援，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情厚谊。

60年前谋杀蒋介石案的策划者华克之

今年92岁的华克之，是一位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但他的名字和他的英雄事迹却鲜为人知。这篇文章生动地介绍了华克之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他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的动人事迹。

美国友人目睹“乒乓外交”内情

“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之间关闭已久的大门。尽管新闻媒介对此有过不少报道，但从美国友人的角度介绍这一事件的文字国内尚不多见。这里发表一位美国友人的目睹记，读者一定会从中得到一些新的珍闻趣事。

执掌美国设计斜拉桥牛耳的邓文中

美籍华人邓文中博士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桥梁专家，他所设计的斜拉大桥，在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他又是一位心怀祖国热爱故土的爱国华裔。他为我国的桥梁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

这是一个波澜迭起的悲壮故事，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特殊较量。八路军一个军区司令员叛变，杀害了副司令员，并企图拉走队伍投降敌人。但邪不压正，斗争的结果是司令员成了“光杆司令”，数年之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下期要目

胡耀邦七次来广西

反共摩擦，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阎锡山在台湾无可奈何的最后十年

黄伯韬殉葬记

皖南事变后，陈诚看管叶挺

女杰胡筠志难酬

我所知道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历史不再走回头路

——记三个亿万富翁的私营公心

冯玉祥在重庆与蒋介石的争斗

《本草纲目》在日本

汉文帝提倡薄葬

蔡畅和陈毅前妻赖月明的两代情

顾问:
 伍修权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锲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M1274
 出版日期: 每月 20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 元

特 稿	殒 星 篇	古 镜 台
④ ⑪ 周恩来与胡志明半个世纪的交往 美国友人目睹的「乒乓外交」内情 杨明伟 任译	⑳ ㉑ 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 中帼英雄——秋瑾 严风莲 陶丽华 晓 凌	⑤④ ⑦④ 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一生 中国人你还知道「甲午」吗? 管理成 王 恒 张 剑

目 录

<p>春秋笔</p>	<p>文荟园</p>	<p>赤子心</p>	<p>西洋景</p>	<p>人海浪</p>	<p>读者来信</p>
<p>③③ 六十年前谋杀蒋介石案的策划者华克之 ⑦⑦ 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杀的 ④④ 能言善辩的乔冠华 ⑥⑧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p> <p>马福龙 徐国梁 虞 骁 尹 骥 黄国平 吴妙发</p>	<p>①⑦ 炎黄颂 ⑥⑤ 历尽沧桑的炎帝陵</p> <p>程思远 罗炳生</p>	<p>①⑧ 我祖父严济慈的品学与脾气 ⑤⑨ 桥梁专家邓文中博士 ④⑨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纪实</p> <p>严 立 陈 浜 王永志</p>	<p>⑦① 「万宝路牛仔」攻入神州</p> <p>叶维力</p>	<p>⑧③ 辅佐梅兰芳成为伶界大王的三名人</p> <p>葛献挺</p>	<p>⑧⑥ 经济形势越好 越要反对形式主义</p> <p>李德复</p>



同志加兄弟

周恩来与胡志明 半个世纪的交往

●杨明伟

1956年11月17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陪同下，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访问。越南之行，对周恩来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仅要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会谈，而且要去见自己34年前在法国结识的“老大哥”。兄弟要去见大哥，自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11月18日上午10点，专机徐徐降落在河内机场。稍后，在范文同总理的陪同下，周恩来前往主席府。这一消息，早被主席府的主人闻知。当周恩来乘坐的汽车进入主席府的院子时，周恩来从车窗里看见，胡志明主席已等候在台阶上，迎接这位中国“兄弟”。两只大手紧紧握着的那一刻，多少往事、多少幸福，一起涌上两位伟人的心头。

11月21日，胡志明举行国宴，专门招待周恩来一行。宴会上，胡志明充满感情地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一起做革命工作，我们是亲密的战友。”

听到胡志明这样“同志加兄弟”般的称呼，周恩来也很动情，他也说：

“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地马克思主义者，而我还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

周恩来的思绪，回到了与“老大哥”胡志明相识、相处的过去……

塞纳河畔·巴黎地铁

1920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港，然后又换乘火车抵巴黎。

1921年春天，经北京大学来法的教师张申府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年轻的共产主义者。

就在这一年，法国共产党为联系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成立了一个“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位活跃的越南青年，他就是后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当时的名字叫阮爱国。他早年当过海员，到过欧美各国，1918年留居巴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他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利用“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胡志明联系了许多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聪明的

才智、超凡的气度、很强的工作能力、高尚的品格等等，逐渐引起了胡志明的注意。一天，胡志明主动约比自己小8岁的周恩来在塞纳河下的巴黎地铁某站见面。

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常住的地方是戈德弗鲁瓦街17号，这里离宏伟壮观的巴黎地铁不远。他按约定的时间，急步赶往地铁入口处。当他在地铁里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仰的越南朋友阮爱国（胡志明）时，被这们异国老大哥真诚、慈爱的目光所感动；胡志明也被面前这位中国小兄弟聪敏、稳重及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近半个世纪兄弟般友谊的基础。后来，他们各自都多次提及首次相见时的情景。

从此，在异国他乡，周恩来有了一个亲密的越南老大哥。他们常漫步塞纳河畔，谈理想、抱负、追求、生活；谈法国、中国、越南、世界；探讨各种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3年，胡志明离开巴黎，赴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他和周恩来依依惜别，各自为革命而奔走。

可爱的“广东”老头儿

胡志明离开巴黎后的第二年，周恩来接到国内党中央的指示，让他立即回国，参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国共合作运动。同时，旅欧党、团组织也需要他回国向中央汇报情况。

1924年9月，周恩来怀揣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向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回到了广州。报告中写着对周恩来的评价：

“周恩来——浙江，年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回到广州后，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随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很快显露出过人的才华。

就在周恩来回国后不久，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局常务委员，于1924年底也来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他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身份，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没有多久，他便打开了工作局面，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越南革命青年党），并参与创建远东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他还在广州举办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为自己的祖国培养、输送干部。令人兴奋的是，胡志明来到广州便得知周恩来也在这里，他很快到周恩来的寓所找到了一年多不见的小兄弟。两人

相见，欢谈甚深。得知周恩来已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及其军事部的负责人，胡志明很钦佩周恩来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才干，当即邀请他给在广州的越南先进青年们讲课。

1925年初，年仅27岁，英姿焕发的周恩来，应胡志明之邀，来到位于广州文明路的一间教室里，为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主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讲课。早在10年前，周恩来就是南开学校演讲会的负责人，以“善演说，能文章”著称。给越南同志讲课，他更是认真地作了一番准备，那动听的语言，把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越南青年同志很爱听。经过周恩来引荐，胡志明还先后请了李富春、彭湃、刘少奇等人到训练班讲课，并组织越南青年学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中国的农民革命等问题。此外，胡志明还挑选了一些优秀的越南青年进黄埔军校学习，他们成为周恩来的正式学生，后来为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越南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州，与周恩来结为终生伴侣。胡志明得知后，以老大哥的身份赶去看望他们，每次聚在一起，都充满了好似一家人的欢乐、亲热气氛。对远离越南、独身一人、工作在广州的胡志明，邓颖超作为战友加弟媳，给予了细心的照顾。中国的同志都没有把胡志明当外人，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居民呢。

1926年底，周恩来由广州秘密去上海，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调中共中央任职。他又一次与胡志明分别。1930年，胡志明领导创建了越南共产党。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胡志明曾一度到延安，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并肩战斗，共同生活。延安的枣园和延河岸边，留下了这位可爱、和蔼慈祥的“广东”老头儿的身影。他还先后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处工作，生活、战斗在八路军当中，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后来，他辗转来到重庆，这时，周恩来正在重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国统区的党的各方面工作。他们又一次相逢，共商对敌斗争对策。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两人的想法更是不谋而合。在重庆，胡志明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活动，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1941年2月，胡志明回到越南，直接领导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年，他领导建立了越南独立同盟，并当选为主席；他还创办《越南独立报》，宣传反帝反殖，建立独立、民主的越南的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越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为了使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统治，胡志明四处奔波，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一样，也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周恩来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竭尽全力，战斗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虽然这一时期周恩来与胡志明很少见面，但共同的斗争目标、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1942年夏季，胡志明沿滇越交界的边界线活动。8月，他进入广西德保县，准备去重庆再次会见周恩来，交换中越两党共同抗日的意见和对时局的看法。不幸在德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投入监狱。这一消息很快就被中共中央获知，立即电告周恩来，让他在重庆设法营救胡志明。

此时的周恩来，大病初愈，刚刚从医院出来，在住院期间，毛泽东曾致电董必武，交待：“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休息”。周恩来出院后，又一不幸的消息向他袭来：父亲已在他住院期间病逝。他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说：“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毛泽东交代他：“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但是，想到还有党和人民交给的繁重的工作需要自己去做，同时也惦记着尚在狱中的胡志明。因此，周恩来在安葬完父亲的遗体后，立即会见蒋介石，与国民党方面交涉释放胡志明等事。此外，周恩来还采取多种营救措施，他亲自到国民党爱国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处，商议营救胡志明的办法。受周恩来之托，冯玉祥又去拜访桂系首领李宗仁，从国际、国内各方面陈述利害关系，敦促李宗仁想法释放胡志明。在冯玉祥的劝说下，李宗仁又与冯一道去面见蒋介石，提出应该释放胡志明。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这时正在不断地制造事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他们对马上释放胡志明的要求置之不理。为此，中共方面联合国际、国内各方舆论和各抗日组织继续努力，直到1943年夏，胡志明被国民党关押了1年零12天后，才在广西柳州获得自由。

细致入微的周总理 与和蔼可亲的胡主席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发表，越南革命取得了胜利。9月2日，就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天，越南民主共

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就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发表了告越南人民的《独立宣言》。1946年3月，胡志明以自己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杰出贡献，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然而，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越南人民刚刚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受到了早年曾经侵入的法国殖民者的武装干涉。胡志明再次领导越南人民英勇不屈地进行抗法斗争，为争取越南的真正独立和统一而奋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刚刚欢庆抗战胜利，内战的硝烟又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又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时期，周恩来与胡志明各自在自己的祖国奔忙，没有见面。但是，双方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的局势，希望对方胜利和平安，心灵息息相通。

1950年1月，胡志明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秘密来华。由于交通不便，他在中越边界赤足步行了17天。当他踏进既感熟悉而又新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已先后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胡志明到北京时，与周恩来未曾见面，只是与刘少奇商谈了有关援助越面的问题。之后，在刘少奇的精心安排下，胡志明又前往莫斯科，正好同时会晤中国和苏联党政领导人。

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一道，同斯大林商定了共同援助越南的大事。值得高兴的是，胡志明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此时胡志明60岁，周恩来52岁，两人相会，感慨万千。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这列火车上，同行的还有一位贵宾，他就是胡志明。列车为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三人各备了一节车厢，回国的路是漫长的。

然而，车厢内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加兄弟”的长时间相聚，其乐融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列车每到一个大站都下车参观，受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等



1959年，胡志明（中）在庐山。蔡畅（右） 邓颖超（左）

城市苏联党政领导的盛情接待。一路上，周恩来除了陪同毛泽东外，对胡志明的饮食起居也给予了悉心的照料。

这一年，应越南方面的要求，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方面派出了一批顾问到越南，参与策划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一些重要战役。7月至11月间，中国方面还派周恩来早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学生、警卫副官陈赓将军，赴越南协助组织关系重大的边界战役。陈赓早在给周恩来当副官时，就在广州结识了和蔼可亲的胡志明。这次到越南，他又带去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胡志明的问候和关心。

1950年后，胡志明多次公开或秘密访华。当他进入中国，踏上这片熟悉、亲切的土地时，每次都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感受。在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胡志明都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一觉醒来，早有人把崭新的皮鞋、合体的衣裤放在他身边。他知道这是周恩来交待的。

有一回，胡志明身上穿着一件旧毛衣，引起了服务员的惊奇，他深情地解释说：“这是邓大姐亲手给我织的毛衣……”胡志明记起：当冬天来临，邓颖超还惦记着给他送去丝棉衣裤；他爱吃中国的苹果，周恩来夫妇总是设法尽快送到；为了让他身体健康，减少抽烟的危害，周恩来经常把我国轻工业部烟草研究所特制的低尼古丁的“中华”、“熊猫”牌香烟送给他；就连朝鲜金

日成主席送给周恩来的上好的高丽人参，周恩来也舍不得吃，又转送给胡志明。

莫斯科、日内瓦、柳州 周恩来再晤胡志明

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次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日内瓦。4月21日，代表团先到苏联莫斯科停留，这是因为要与苏方协调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方针、策略、统一口径，整理和研究有关材料；另一目的，是要在这里会晤越南方面的胡志明和范文同。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对越南问题，周恩来还细致地与胡志明交换了意见。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飞抵日内瓦。此后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为促进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费尽心力，与美国、法国等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正如随同前往的师哲所说：

“这次出国活动和来回奔波，前后长达四个月。总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劳累。”

会上，企图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重建殖民统治的法国，拒不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更不承认高棉和寮国的抗战政府。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作为首席代表，于5月4日率越南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受胡志明所托，范文同在会议期间与周恩来相互配合，协调行动。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就在前一天，在韦国清将军的协助组织下，越南人民军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这是抗法战争决定性的最后一战，对谈判桌上的斗争非常有利。但是，由于美国等方面的阻挠，会议进展仍很缓慢，斗争极为艰巨。

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6月30日，回国抵达广州。7月3日，周恩来偕罗贵波、韦国清、乔冠华等人，到广西柳州会见越方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人。从3日至7日，双方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方案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达成了“7月5日协议”，即：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巩固北方，以利将来的统一。并估计对方最多只能让到17度线。这次柳州会晤，胡志明眼见周恩来如此奔波劳累，身体

显出疲劳之状，极为关切。胡志明再三叮嘱周恩来要注意身体，并感谢他为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和平所做的贡献。

7月6日，周恩来飞抵北京，向中央汇报日内瓦会议以及中越柳州会谈等情况。他连续作了几场报告，并接见了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还未好好喘一口气，7月9日上午，周恩来又一次飞往日内瓦，为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继续努力。7月21日凌晨，日内瓦会议终于达成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等一系列协议，越南最后在会议上接受了以北纬17度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取得了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自己的军队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日内瓦会议本身则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确认和支持上述各项协定和声明。

7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75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支那的停战再一次证明了和平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的确，由于和平的力量推动，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使越南的北部完全获得解放。

然而，由于美国侵略集团的干涉政策和南越吴庭艳集团的破坏，日内瓦协议难以执行。协议中关于通过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不久就遭到彻底的破坏。周恩来总理多次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曾对胡志明等人说：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两国领导人进一步精诚合作，并肩抗美。

“胡志明同中国党的关系不比一般”

1955年6月25日，正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审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这天上午10时30分，胡志明主席兼总理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全体出动，亲自到机场迎接胡志明等人。次日，周恩来又亲自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胡志明主席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次正式访华，历经两个星期。周恩来率领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谈。虽然“一五”计划时期中国还很困难，但是

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将以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56年11月18日至22日，周恩来回访越南，这便出现了本文开头那充满深情的一幕。越南方面特意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了有10万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周恩来一行。两人促膝交谈，亲密无间。当周恩来离开河内时，胡志明在主席府为他送行，并委托范文同总理一直送到机场。

1960年春季，周恩来在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以后，再次前往越南访问。范文同总理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带来了胡志明的问候。这次访越，周恩来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南党的中央领导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就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欢送仪式和宴会。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还有一次，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在这里，他们又回忆起过去：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这期间胡志明也到过武汉，两人又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共事。这次两人再聚武汉，已事隔30多年。周恩来特设宴招待胡志明，共同回忆了过去在武汉的日子。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观察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一挥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了不得的人。”周恩来笑着答道：“我不过是中国一个勤务员罢了。”

1966年，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7月，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越战争的罪行，并指出：“对越南来说，没有比独立和解放更宝贵的了。”这句名言成为越南人民的座右铭。就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恩来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几天以后，周恩来又参加了首都百万群众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胡志

明的《告全国同胞书》。

次年4月7日，周恩来在偕叶剑英、陈毅等与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会谈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三个人都老了，我快70岁了，叶剑英同志70岁，陈毅同志67岁了。年龄虽老，雄心还在。南方战争明年不结束，我要到你们那儿去参观……”叶剑英也补充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周恩来“明年要到越南去”的愿望没有按期实现。因为这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日理万机，焦虑千重，使周恩来心力交瘁。而由于越南遭受长期的外侵，胡志明在不懈的奋斗中也心力衰竭，身体每况愈下。

1969年7月，胡志明在病重之际，还委托李班副部长和驻华大使吴明鸾转达自己再次访华的愿望。7月17日午夜12时30分，李班和吴明鸾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见到了周恩来，李班表示：

“胡志明主席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来。只要周总理同意，他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

周恩来深知胡志明对中国党和人民的深厚情谊及眷念，但他早已得知胡主席病重，不忍心让胡志明增添劳累，便回答：

“我们是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的。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有为难的地方。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请向胡主席说清楚。”

在胡志明病重的日子里，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他的病情，并想方设法使他康复。胡志明熟知中国医务人员的医术，他提出派中国医生到越南，与越南医生配合起来为他治疗。为此，周恩来专门找来我国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让他们挑选最优秀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组赴越南，他还亲自审定了胡志明的病情报告和治疗方案，并派专机给胡志明送去最好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中国医务人员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越南尽全力抢救胡志明。

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胡志明的病情稍有好转。一天，他托一位准备回北京休假的中国医生，请他在回来时顺便带两只北京烤鸭来。周恩来得知，专门请教有关方面如何保藏和携带烤鸭的方法。在那位医生返回越南前，周恩来特地让厨师精心为胡志明烤制了两只烤鸭，并用冷藏方法细心包装好，然后让医生带给胡志明。这份情谊，再次给病中的胡志明带去许多安慰。

8月份，胡志明的病情再次加重。一天，他在昏迷中醒来，又想起中国和他的朋友们。他对身边的中国医

生说：“我希望听到一首中国歌曲。”……

1969年9月2日，周恩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宣布独立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会上，他还详细地向吴大使询问胡主席的病情。次日，便传来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噩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中共中央立即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前去吊唁。也只有周恩来去最合适。

9月3日晚，周恩来彻夜难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和慈祥的老大哥而万分难过。9月4日一早，他没来得及收拾行装，便匆匆赶往机场，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河内。当天下午，周恩来又一次来到曾经那么熟悉的主席府。这里除设有灵堂外，其他景物依旧，而主人却离去了。踏上主席府的台阶，回想起胡主席曾在这台阶上迎接过他，周恩来脚步极为沉重。进到主席府会议厅，周恩来对越南党政军负责人说：

“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说到这里，周恩来极为动情，眼眶湿润。他接着说：

“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更感觉到这一次来晚了，没有能够在胡主席去世之前同他见一面……”

这番发自内心的话，使在场的人也深受感染，大家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说完，周恩来又在越南党政军领导人陪同下，走进主席府正厅的灵堂，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胡主席遗像前献花圈、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言。晚7时，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专程到医院，瞻仰胡志明的遗容，总算“同他见了一面”。

回国后，9月6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来到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胡志明主席，向胡志明的遗像三鞠躬。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痛，看着胡志明的遗像，他明白再也见不到活生生的老大哥了，只能把对他的记忆和怀念永远留在心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组）

（责任编辑 王 恂）

欢迎订阅 《经济参考报》

《经济参考报》创刊于1981年，是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我国第一张专业性经济报纸。

《经济参考报》是新华社发挥在国内外有庞大记者网的优势而主办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新华社创办和办好《经济参考》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确定《经济参考报》由国务院研究室直接联系和指导业务。

《经济参考报》在宣传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上，融指导性、参考性、实用性、服务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它成为既有权权威性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经济专业报纸，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经济参考报》是对开四版（周末为八版）日报，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国外读者可到北京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文部订阅。

《经济参考报》社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编：100803 总编室电话：3074449
总经理室电话：3073592 广告部电话：3073837
发行部电话：3073790

《广州文摘报》从明年一月起，扩为四开八版。逢周四出版，每份定价0.50元。扩版后，在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办报宗旨的前提下，迅速地精选书、报、刊的精华，推出信息政策、文化艺术、环球掠影、法制经纬、医药卫生、科技生活、人物春秋、体育健美等专版，将会使您耳目一新。

广州市区读者请到附近邮局办理订阅手续。广东省内、广州市区、郊县的读者也可到广州日报各发行站办理订阅手续。

本报受理邮寄订户，凡汇款到本报订阅的读者，订半年15元，订全年30元（含邮资），汇款请写清本人地址和邮编。

《广州文摘报》由南宁市邮政局报刊零售公司代理全国的批发零售业务，欢迎各地邮局征订、零售。

本报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广州日报社内）

邮 码：510121

电 话：(020)8870193, 8883088 转 3207

欢迎订阅 《广州文摘报》

编者按：“乒乓外交”曾是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前奏曲，是民间外交取得重大成果的著名范例。本文作者露丝·爱克斯坦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亚历山大·爱克斯坦的遗孀，参与了当年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出面接待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全过程。她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写下了这篇生动、有趣的回忆，其中很多内容鲜为人知，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赏析价值。



美国友人目睹的“乒乓外交”内情

●司 任译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的访问，是中美两国历经23年敌对状态之后，中国第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对美国的出访。此时距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世界乒乓球赛降下帷幕时邀请美国队访华，已整整一年。值此中国乒乓球队访美22周年之际，回顾它怎样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以及它又怎样反映了当时人们之间存在的深刻误解，会是很有益的。虽然，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流相当圆满，但由于文化差异和中国官员——他们来自一个绝对服从命令的社会——与美国接待人员——他们仅代表美国的非官方组织——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也造成了未曾料想的矛盾。不过，这次访问最终还是为后来两国间一系列的交流搭建了舞台。回顾这次有发轫之功的访问活动，对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的

一些摩擦和齟齬，也许就并不为怪了。

不论从名称还是事实上说，“乒乓外交”都应溯源于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场比赛开始不久，美国乒乓球联合会的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就向中国队的领队表示，他和他的球员非常赞赏中国选手们的高超技艺。这一下使中美两国的运动员和官员逐渐亲近起来，并最终导致毛泽东作出在比赛结束后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

在1971年，要单方面促成这次访问是不可能的，因为中美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美国护照上都印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效”的字样。美国队就访问一事同驻东京的美国大使馆进行了联系，最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表示同意，但有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这次

访问是非官方的，并不意味着取消对华的旅行限制。

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都期待着以一种不丢面子的方式，结束自四十年代末以来一直延续的两国间敌对状态的话，那么世界上也就没有“乒乓外交”了。利用一种体育比赛，让它以“人民对人民”的名义主动发挥作用，两国政府便无需出面认可，这些交往都是经过最高领导层批准的。

礼尚往来，友好关系需要是相互间的。可困扰斯廷霍文的问题是，他的乒乓球联合会根本无资本邀请中国队进行一次回访。同中国队的情况不同——他们完全由政府资助，而美国乒协都是私人的和非赢利的组织，它极有限的预算，要依赖于组织成员交纳的会费。

他当时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和安阿伯密执安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亚历山大·爱克斯坦，一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开了一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的电话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委员会应设法筹集一切所需经费，并负责出面接待中国乒乓球队的来访。

尽管这一决定是在24小时之内作出的，但美国乒乓球队当时已启程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幸运的是，在美国队进入中国之前，美中关系委员会的这个决定通过发给美驻香港领事馆的电报转告了他们。这封电报承诺提供中国队访美的费用，并详细介绍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性质——它是一个公众性、超党派的教育组织，由基金会和私人捐赠资助，致力于美国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并促进友好交流。

这样，当斯廷霍文率领14名运动员和4位官员于1971年4月10日进入中国后，他才得以向中国队发出访美邀请。4天后，周恩来总理告诉美国人一个新的篇章已经揭开。他说：“我相信，这个友谊的开端将赢得我们两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尼克松总统立即抓住了这个“新开端”的有利时机，于4月14日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新的对华政策，其中包括解除某些贸易限制和禁止到中国旅行的禁令，当月晚些时候，他派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前往中国（注：原文如此），同周恩来商定了总统的出访。尽管他这样做并未在美国取得有关改变对华政策的一致意见。

对美中关系委员会说来，由于在急速变化的中美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带来的欣喜，部分地掩盖了即将面对的困难，即筹措资金，安排两周中国乒乓球队在美的行程，而这是两项复杂和艰巨任务。计划工作立即就着手进行了，尽管直到美国乒乓球队回国后我们才得知，中国人接受了邀请，但出访日期“待定”。

在此后8个月中，尽管又向中国乒乓球队和周恩来发出两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中国人的任何

回音，直到1972年1月，这个无声的等待才被打破。当时，罗恩·齐格勒正在北京为总统的出访做最后的安排，周恩来让他转告斯廷霍文，中国乒乓球队将在“鲜花盛开”的时节访问美国。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改观。1971年10月25日，她取代台湾，在联合国获得了合法席位。之后不久，由36人组成的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在纽约设址办公。

1972年3月15日，斯廷霍文收到中国乒乓球协会的电报，通知他以庄则栋为团长的20人代表团和6名记者，将于4月10日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进行“两周友好访问，行程已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予以安排”。电报最后说：“希望继续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全部交往中，中国人一直坚持一个虚构的说法，即这是“人民对人民”的访问。实际上，它是中国政府为一方，以美国非政府性组织为另一方的沟通。除了纯粹球赛的技术性问题外，其它一切都由中国政府的官员决定。中国球队出访的日期就是由周恩来确定的。随同球队来访的最高外交官员并代表周恩来处理事务的人，是钱大镛，他挂名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副团长，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的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外交部西欧、北美和澳洲司的副司长。事实上，基辛格到北京时，他即在迎接者之列，并参与了基辛格——周恩来关于总统访华具体安排的谈判，甚至还到机场为基辛格送行。

关于中国代表团行程安排的谈判，由高粱出面，他是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秘，但他的一切意见都是得到黄华大使的允准的，黄当时是驻联合国使团的团长。而在美国方面，除去有关政府不得不关注的安全问题，以及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外交礼宾问题外，就全靠美国乒协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全权负责了。

斯廷霍文一接到电报，立即在纽约同高粱进行了会晤——后者已由黄华授权负责安排中国队的行程。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决定根据自己的程序来安排访问计划和活动。由于高了解谈判通常由一人负全责，因此便坚持只同斯廷霍文一个人接洽，尽管他知道许多事项在最后决定前，同美方联合承办接待的组织的主席爱克斯坦进行磋商，是十分必要的。

当4月10日中国代表团抵美日期越来越临近时，有关行程的谈判也在加紧进行。最后双方同意中国乒乓球队将访问下述9个城市：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和安阿伯；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的贝尔法斯特；纽约市；田纳西州的孟斐斯；以及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市。

就在预计中国队抵美的一周前，中国人把到达日

期从10日推迟到12日，申述说他们在经过加拿大的旅行后要休息两天。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取消从洛杉矶入境的计划，因为14日在底特律进行的一场比赛已经排定。同时，双方商定的12日旅行计划也必须缩短，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完成行程后还可在西海岸再停留额外的5天。

1972年4月12日，泛美航空公司的“友谊”号飞机载着中国代表团29名成员从渥太华起飞，飞往底特律附近的威洛·朗机场。在威洛·朗，高粱和其他3位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与球队会合，并从始至终陪同他们进行访问旅行。

在他的简短欢迎致辞中，爱克斯坦表示，他希望“中国这支世界冠军队对美国的回访将带动两国人民之间在体育、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的一系列交流。”总统的特别代表约翰·斯卡利，代表尼克松总统在致辞中说，他相信“如同美国乒乓球队在中国所受到的热烈欢迎那样，中国队也将受到美国的热烈欢迎。”庄则栋在答辞中说：“我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而来。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去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为减少敌意的示威活动，先行的美国特工人员不允许公开中国乒乓球队抵达的时间和地点。可虽然进行了新闻封锁，但在机场附近的沿途，仍排满了热情的人们，他们手举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欢迎你们到美国来！”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主席卡尔·麦金太尔牧师不知怎么得知了中国队抵达的消息，他同另外10名示威者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市中心卡迪拉克希尔顿饭店门口挡住了他们，用手提扩音器呼喊污辱性的口号。尽管当地警察把他们与中国人隔离开来，但场景颇令人感到担忧和惊吓。

由于中国人同美方接待人员发生了争执，饭店的午餐被推迟了半个多小时。中国人坚持一定不能再发生示威现象，并取消了预计对安阿伯密歇根大学的访问。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即在美国，当示威活动出现时，可以做些处置，或预知要发生时尽可能加以限制，但却不可能被事先禁止。

抵达底特律的第一晚，罗曼·格里布斯市长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他的官邸出席用美国民族风味作酬的冷餐会。当中国人到达时，天下起了雨，市长站在一楼门厅中迎接他们。如果这是一位中国官员，他会站在街上欢迎他的客人。在离去时会陪着他们走到车子旁边，等车子望不见了方才离去，而此时，中国人似乎感受到了冷遇。

在回饭店的路上，中国翻译沈若云向我提出市长在中国客人来到和离去时表现出的“冷淡”。这引发了我们两人之间好长一段的讨论，即双方的文化差异和

不同的行为方式会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误解。

第二天一早，中国代表团来到设在林奇路的克莱斯勒汽车厂，参观汽车的总装线。几位工人在工作现场写了“欢迎中国运动员”的横幅，中国人对总装线每分钟装配46辆轿车惊叹不已，高粱在参观过程中拍了许多照片。庄则栋则跨进一辆刚刚开下流水线的轿车，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在工人餐厅用过午餐并稍作停留，中国乒乓球队返回饭店休息。之后他们到科博体育馆进行训练。明晚他们将在此进行第一场比赛。

中国人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及联合会其他几位官员会见的气氛还算平和，没有因为讨论诸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会在美国的作用这样的问题而剑拔弩张。尽管伍德科克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但接待程序是非常正式的，所提问题必须先拟定并提交给接待人员，而且出席会议的中方及美方陪同人员也被限定在12人之内。在粗略参观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办公机构后，中国人被引进一间小会议室，坐在一张椭圆形会议桌的一边，联合会的官员们面对中国人坐在另一边。这种正式、刻板 and 缺乏热情的场面，反映出联合会官员对接待中国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因为后者之中不是外交官就是记者。

当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奥克兰大学的梅多布鲁克大厅就餐。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曾是汽车大王约翰·道奇的私产。在门厅处，庄则栋率自己的团员站成一排迎接来宾。我一路握手直到高粱的面前，可他却对我伸出的手不理不睬，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我好生纳闷，便随同人们走进大厅等待宴会的开始。可从座位牌上发现，我与高粱刚好挨在一起。晚宴进行中，我只得同我的左邻和对面的人讲话，就在上甜点之前，高握住我的右手说：“爱克斯坦夫人，我和你丈夫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解决了我们的分歧。现在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你参加我们在纽约举行的招待会。”这是我第一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遇见中国人怨形于色，后来又转嗔为喜。

第二天上午，在参观一所小学时，开始一切顺利，后来却几乎成了一场灾难。一位六年级学生用中国字写了幅标语“欢迎中国队”，可不幸的是，“中国”写成了“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立即发现这个错误，并退出了教室，尽管主人道歉不迭，但中国人坚持认为是有意而为。

说来也是够有趣的，当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的体育馆进行访华的第一场比赛时，他们也看到了两条标语，一条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另一条却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有些美国人看来，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人民共和国”反正都是中国，他

们自认为没有搞错地方，可结果却是大错特错。反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由于他们刚刚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种错乱的提法对他们真有点“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了。

当天下午的事也让美中关系委员会的接待人员颇感棘手。在科博体育馆举行球赛是由密歇根著名运动员遗物收藏馆和美国乒协联合主持的，以1—3美元的极低价格售票。美中关系委员会为中国代表团和他们在底特律地区的朋友购买了50张入场券，下午2时，中国代表团捎信来要求立即再给他们50张门票。科博体育馆售票部经理不收150美元的个人支票，而坚持要现金。爱克斯坦立刻派一个学生去安阿伯取钱，可取到钱再买票已差不多过去了两个小时。

晚6时半，中国队乘大轿车前往咫尺之遥的科博体育馆。为防万一，头戴钢盔的骑警簇拥着大轿车，一路警笛呼啸而来。尽管一切平安无事，但却如临大敌。

入场式在8时开始。中美两队入场，密歇根大学的管乐队奏两国国歌。就在比赛开始时，以唐·洛普辛格为首的大约10名右翼分子，突然从上面一个看台向观众和赛场扔下许多挂着死老鼠的白色纸降落伞。可以想象，场内顿时一片大乱。直到警察冲上去扭住他们并将之拉走，场内才恢复平静。警察还扯下这伙右翼分子打出的“还我战俘”、“中国乒乓球队滚回去”等标语。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的精湛球艺简直令美国观众如醉如痴，整个比赛响彻了忘情的欢呼声，最后大家干脆都离开了座位，站在那里大声喝彩，尽管参赛的美国选手都是第一流的，但在国际比赛中，中国队排名第一，美国队则列第28名，因而根本不是对手。结果除两场球外，中国队赢了所有的比赛。

差不多直到最后一分钟，中国人提出要取消原定对密歇根大学的访问，原因有两条，其一是，曾于1871年至1901年担任密歇根大学校长的詹姆斯·伯里尔·安杰尔，当年在美中贸易委员会任职，这个委员会曾提出10年内不准中国劳工移民美国的议案。其二是，鼓吹台湾独立的“台独分子”彭明敏正在密歇根大学作访问学者。中国人认为，“台独”就是试图分裂中国。然而，他们却没有顾及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访的代表团，他们乒乓球表演和其他活动早在他们抵达之前就广为传播开来。

问题还有另一面。曾于1971年访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黑人活动家罗伯特·威廉姆斯此时也在密歇根大学，他刚刚在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完成了撰写回忆录的研究计划，他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位尊贵客人。另外，一大批能讲中文的学生和教员也期待着同中国乒乓球队晤面，观看他们表演。经过多次谈判，中国代表团终于同意访问密歇根大学，但条件是原定的徒步

旅行要改乘大轿车，并只在事先规定的地点停留。4月16日，《安阿伯新闻报》报道说：由于中国队从底特律出发时间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因而徒步访问计划被取消。同一天，《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引述高粱的话说，中国代表团原未计划访问密歇根大学，“但由于学生们好客的精神我们来了。”

中国队在安阿伯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当大轿车穿过校园时，被学生们认了出来，人们向他们挥手致意，并大声祝愿他们。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入口处，警察将以麦金太尔牧师为首、大声呼喊侮辱性口号的原教旨主义者隔开，使他们不能往一位中国运动员手里塞事先写好的声明，可一进俱乐部，艾伦·史密斯副校长已在球类馆里恭候中国客人了，学生和员工们把代表团围住，或三五成群，或个别在那里用中国语交谈。

离开学生俱乐部，代表团安全乘车来到学生宿舍的一个自助餐厅进午餐。尽管特工人员竭力把中国人隔离开，但学生们还是“突破”了安全线，同中国乒乓球队员们混在了一起，大家无拘无束的自由交谈，整个餐厅里再也分不出你我了。

宿舍外边，学生正在玩飞碟。中国人从未见过这种会飞的圆盘，看得着了迷。可惜日程安排没有时间让他们亲手去试一试了。这时一个学生飞快跑回寝室，取来一个飞碟，送给了正在登车的一个中国运动员。按惯例，这位运动员觉得必须回送个什么礼物，可手边又没有，情急之中，他把预备在路上喝的橘子汁给了这位学生。汽车启动之后，这位密歇根的大学生手捧橘子汁端详良久，似乎它是由实心的黄金制成，其实，这瓶饮料就是刚刚从自助餐厅里拿的。

下一站是篮球馆。由中国乒乓球队进行表演赛。体育馆的看台上挂着美国国旗和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横幅“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绝大多数比赛的开场一样，这一次也是先奏密歇根大学的运动员曲《向胜利者致敬》。中国人又一次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他们坚持要挂中国国旗和奏中国国歌才能进行比赛。虽然他们随身带着国旗，可在上面看台上却找不到升国旗的旗杆。更糟糕的是，国歌的磁带还在汽车上的行李里。因为时间安排非常紧凑——球队必须在下午4时离开安阿伯赶5时飞往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飞机，他们的行李全都带在车上——因而要准确找到放磁带的包几乎已不可能。幸好，爱克斯坦的一个学生录下了在科博体育馆比赛的实况，其中包括中国国歌，可他一下子不知道是录在哪一盘磁带里。结果折腾了半天，他终于找准了地方，通过体育馆的扩音器，播出了国歌，表演这才开始。

这一次的表演赛比在科博体育馆那回更激动人心。中国人分成两队，进行了团体和单打。他们不断变

换招法、技巧和攻守,把这场比赛变成了一场真正的表演。观众们激动不已,报之以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中国队离开密歇根,平安抵达弗吉尼亚州首府威廉斯堡。威廉斯堡曾是美国革命的中心,抵达的翌日,代表团参观游览了当地的历史遗迹。导游身着殖民地时期服装,这引起中国人的很大兴趣。他们还对当地手工艺品、纸制品和装饰品大为赞赏。总之,在中国人看来,同那些现代大都市比较起来,他们更能亲近和接受18世纪的美国风情。事实上,在所有游历访问过的城市中,威廉斯堡最得他们偏爱,因为这座城市展现的是相对单纯的时代风貌,带有前工业社会那种特有的朴拙遗风,这恐怕同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更为接近。而美国当代工业社会的许多方面,则离他们还过于遥远。

大约下午5时,中国代表团和美方陪同人员登车前往华盛顿。旅途中大家都很放松,几乎是一路行程一路歌。中国人唱了好几曲中文歌,并试图教车上的美国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美国人则向中国人教唱《划、划、划,你的船》。但中国人对歌词中说“生活只是个梦”颇不以为然,认为太不现实,结果给改成了“生活就是力量”。

第二天晚8时,中国运动员在马里兰大学的科尔体育馆举行了一场表演赛。入场式时奏了两国国歌。当主持人宣布说特里西娅·尼克松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也来出席观看表演时,一伙亲台湾分子突然呼喊起反华口号,另一群反越战人士也高喊“特里西娅看乒乓球,尼克松轰炸海防”,顿时场面相当尴尬。不过学生们和其他观众仍对比赛兴致勃勃,不时为双方精彩球艺鼓掌加油。

高粱有些怒不可遏,坚持要求把这些亲台分子赶出去。有人告诉他,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这恐怕很难办到。高反问:在科博体育馆时不是将洛普辛格那些人赶走了吗?人们提醒他,洛普辛格等人当时所为已不限于言论而是行动了。特里西娅·尼克松拍了拍高的肩头说,对这种骚扰,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理会,它们自然会平息下去。为了使高稍释其怒,爱克斯坦派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同总裁判长接触,请他去进行调解,但大家都知道,这必定是无功而返。

这时,一个亲台派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手执半导体喇叭,高声呼喊每一个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并用极为粗俗下流的语言辱骂他们。这些话如此尖酸恶毒,以致美国翻译都不能全部听懂她的意思。最后,警察以扰乱秩序为由把她从看台上撵了出去。比赛继续在12000名观众的热烈掌声中进行,中国队以10:2取胜。

第二天上午,在梅隆画廊的入口处,中国代表团发现有台湾记者混杂在随访的记者群中,因此拒绝进入画廊参观一个中国画展。后来,由于肯尼迪艺术中心门

口同时悬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台湾旗帜,中国代表团再次谢绝了在中心为他们特别安排的艺术表演,并没有出席由全国记者俱乐部为他们在艺术中心举行的午餐会。晚上,他们也未参加在中心举办的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不过还算幸运,在史密森学会的访问计划如期进行。中国人在宇航员迈克尔·科林斯的导游下,游览了整个空间馆。

下午,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和美国陪同人员。庄则栋率领中国运动员和另两位官员以及斯廷霍文和爱克斯坦列队站在一条栏绳前面,身后是其它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和美国乒乓球队,基辛格和另外几位外交官员也同他们站在一起。

尼克松致欢迎词中说,虽然比赛不免有胜负,但由于两国运动员建立起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因而更重要的胜利是美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将意味为和平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庄则栋在答辞中说:“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觉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并说,双方乒乓球队的互访“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庄向总统依次介绍了他的全体队员,总统同他们以及站在围绳前的中美两国官员一一握手。可却没有理会站在绳后的美国队员。当尼克松握完手准备走开时,美国队的康尼·斯威里斯喊了起来:“总统先生,难道您不愿意见自己的乒乓球队员吗?”尼克松立即回转身来说,我不知道你们也在场,马上同这些队员也一一握手。仪式举行之前,斯廷霍文曾经要求斯卡利提醒总统,美国队也出席接见。可斯卡利当场拒绝了斯廷霍文,告诉他说总统希望尽量减少握手人员的数量。

接见仪式后,中国代表团参观游览了白宫,之后,中国人又秘密前往华盛顿动物园,探望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政府送给美国人民的大熊猫星星和玲玲。两天后,第一夫人帕蒂·尼克松也光临了熊猫馆。

表面上看,玫瑰园的接见很圆满。然而在此之前,一位美国翻译曾在饭店走廊找到爱克斯坦说,由于美军轰炸越南的海防,他此番去白宫心中很是负疚,爱因斯坦回答说,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但现在不进行过细的讨论。因为他知道白宫有大批译员,并认为这纯是个人的感觉。

他全然没有想到,这位译员会同其他5位翻译在看法上取得一致,并使其中3位在未向爱克斯坦打招呼的情况下作出抵制的决定。之后,这位译员同《华盛顿邮报》的杰伊·马修斯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就在邮报上刊出带有该译员像片的文章,其中表明他们对轰炸海防的反对立场,并声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官员对他们的抗议表示“非常同情和赞赏”。此外,一位中

国血统的译员维·爱德华滋也在报上明确指出，在中国人出访美国的同时，美国又轰炸海防，这是“当面露笑脸，背后插刀子”。

《华盛顿邮报》在当天还刊出醒目标题：“周恩来谴责美军空袭河内和海防”。但同时周在北京对一批访华的美国学者表示，尽管越战升级，但中国政府寻求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政策和立场不变。

尼克松对美国译员公开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发其火，爱克斯坦也很气愤，因为译员们在受雇时已经谈好，在整个陪同过程中，要做到非政治化，保持中立，不带感情色彩。爱克斯坦认为，这些人的作法除了曲解美中关系委员会的立场外，也使中国人为难。然而，中国代表团对美方的行为并未做出公开的反应，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没有在此事上纠缠。可令人捉摸不定的是，八个月后，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在北京讨论有关教育、文化的交流项目时，同周恩来的一次会见被中方取消了，原因是美军开始轰炸柬埔寨。

在全部访问旅行中，美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不仅感到在比赛中他们处于劣势，而且在待遇上也成了“二等公民”。玫瑰园中尼克松无视美国队存在的这一幕，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感觉。斯廷霍文认为，美国队应该把自己当作“主人”，无需得到特殊的照料。事实上，虽然有些时候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使他们受到了冷落，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对安排缺乏周到的考虑。

美国队员们另一件不平的事，是没有允许他们观赏大熊猫。尼克松夫人作了决定，中国代表团前往时不包括美国队员在内，原因是考虑到公开展览后美国人随时可去，这与对中国人的礼仪安排不同。可糟糕的是，没人愿意多费唇舌向美国队员作解释，还有一事也使美国队员忿忿不平，这就是因座席不敷使用而未邀请他们到联合国大厦一同出席乒乓球表演赛。开场不久，才通知他们前往站席观看，这颇伤他们的“自尊”。

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在抵达美国之后的第七天，来到纽约。他们为600名外交官进行一场表演赛，出席观看者中包括黄华大使和乔治·布什大使以及联合国官员。第二天，中美两队在纳索县的退伍老战士纪念馆为一万名观众进行了一场表演。

在纽约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取消了原定于上午对《纽约时报》的参观，原因是《时报》对中国和台湾的态度不加区别。经过这一段接触，爱克斯坦与钱大镛——他是代表团中的最高外交官——之间虽然常常看法相左，但已大大增进了理解和信任，因此他决定找钱谈一次，指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有台湾人或其标志出现，就拒绝出席为他们特别安排的节目，会妨碍他们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钱对爱克斯坦的意见表示

感谢，并说加以考虑。

一个月后，钱给爱克斯坦写来一封信，其中说他同意爱克斯坦的看法，取消对《纽约时报》访问的作法是不正确的。此后，中国的记者代表团或其他赴美访问的团体，都不再拒绝同美国报界打交道了，尽管后者仍然报道或介绍有关台湾的情况。

4月24日是中国代表团在美正式访问的最后一天。到达洛杉矶后，他们同美国队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在欢迎晚宴上，两国队员互换了礼品并亲切道别。中国代表团将在加州停留5天，进行休整。尽管此时已无日程安排，但许多美国人，包括特工人员，仍陪伴着他们，直到他们离美赴墨西哥进行最后一站的访问。

在洛杉矶停留的几天中，中国代表团参观了好莱坞和附近的迪斯尼乐园。在环球影片公司，他们观赏了好几个预置的电影布景，其中一个突然来临的汹涌洪水，疾流直下，大树连根掘起，一直冲到观赏者的脚下，中国人对这一特技赞叹不已。在迪斯尼乐园，中国人对那些鬼怪精灵很不以为然，他们搞不懂为什么要花这许多钱来吓唬孩子。当然，他们对米老鼠和其他迪斯尼的人物也一无所知。

为使旧金山湾地区的美籍华人有机会观赏乒乓球，中国乒乓球队在斯坦福大学举行了一场表演赛。当场门票售价1美元，一个人只许买两张，结果全场爆满。

在中国代表团即将起程前往墨西哥时，中美两国的运动员已有些难舍难分了，文化隔阂也拆除了许多。他们互相交换礼物，眼含泪水相互话别。维·爱德华滋一直在打听中国队员喜欢什么，最后他送给了他们一套密歇根大学英语研究所英语教材和录音磁带。

回顾起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场面，但球队所到之处，总是一片沸腾。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它“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而且还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乒乓外交”在结束中美两国长时期的敌对状况，建立起新的相互关系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的交流上迅速扩大，这最终导致了1979年1月1日的到来，这一天，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本文原载《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1993年秋季号）

1994年9月12日，海内外炎黄子孙关注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河南郑州黄河游览区举行千余人的开工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程思远专程赴豫出席并讲话。这是程老为炎黄二帝巨塑开工而作的《炎黄颂》。

炎 黄 颂

——为炎黄二帝巨塑开工而作

●程思远

人文始祖
中华炎黄
赫赫功绩
名播万方
创指南针
环球通航
发明养蚕
首制衣裳
发明文字
信息传扬
发明钱币
开创市场
教民稼穡
衣食明章
世界文明
敦我炎黄
历七千载
代代发扬
发明医药
黎民安康

发明算术
科技曙光
发明兵器
卫士守疆
反对分裂
统一国疆
开拓进取
智慧勇刚

勤劳无畏
自立自强
中华民族
雄立东方
炎黄子孙
遍及八荒
黄河之滨
中原茫茫

追念始祖
立此巨像
天地共庆
日月同光
缅怀祖德
改革开放
祝我中华
山高水长



王 绘摄

我祖父严济慈



1988年作者与严济慈合影

的 品学与脾气

● 严立

我的祖父严济慈先生今年94岁了，他是咱们这个世纪的同龄人。

爷爷少年和青年期，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独特的时代。他经历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确实实地产生了一些新事物与新思想。他小时候是留过辫子的，什么时候剪的就不太清楚了，但大概总不会太先——先到要被抓去杀头，况且他那时也只是一个孩子；也总不会太后，因为他毕竟是“洋学生”。据我的猜想大概也就是在上中学的前后吧。

那正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而江浙一带又得风气之先，有了新式学堂。那时已废除了科举制，爷爷便抱着中国古老的“读书上进”的想法，考入新学。

但传统影响是深厚的。我爷爷的上中学，起码在形式上也还是与科举得中有些仿佛——他是坐了一部轿子去的。据那时和我爷爷在东阳中学同学的一位老者在《东阳文史资料》上撰文回忆，下湖严村那时一起被录取的五个人，临去县里上学的那一天，便预先租了五乘小轿，停在村子外面，和家人在村里告别了以后，悄悄地在村口聚齐，然后上了轿走的。这简直是有一点象私自逃跑，但他们几个少年多少也是为了新鲜，玩儿了一回类似“过家家”式的游戏。

进中学后，倒是使我爷爷在数理方面的才华显露出来。他们那时记笔记用铅笔，写作文是用钢笔——蘸水钢笔，演算数理方面的习题也是用铅笔。

从中学里出来，我爷爷就发现相对于别人来说，理科是他的一种本事了。而且那时已经有了新的“提法”：有钱的实业可以救国，有学问的教育可以救国，有聪明才智的更是科学可以救国了。青年有志

总是想救国的，所以爷爷学习自然科学更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青年时代的我爷爷是“洋”的，从那时起他开始用自来水笔写字，一直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看见他那时写的信，用的还是自来水笔。现在他经常用的仍然是五十年代开“世界和平大会”时发的纪念品，一支“和平鸽”牌特制金笔。

现在看到的，我爷爷最早的照片，是他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时照的毕业像。几个人站成一排，像片上的我爷爷，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衫，白底黑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很大的扇子。

到巴黎后照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个镶着硬纸板护框的椭圆单人照，爷爷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西装，硬领白衬衣，胸口上用黑丝带打成一个很大的领结。

说起去巴黎，那也是受了环境的影响。那时东南沿海一带，最早时兴去日本，如鲁迅，如秋瑾，都是如此。但后来，不怎么时兴去日本了。说是日本的科技是从欧洲传过来的，要学何不到欧洲去呢？

我爷爷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即使到了巴黎，也没有使他浪漫起来。像片上的衣着大概是环境使之然，他的行为依然是很中国的。他过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看书，上课，去实验室，如此而已。一直到他后来回国，乃至一直到他进入老年，过得也基本上是一种中规中矩的读书人的生活。他一生从事的事业是很现代的，并且一直都是很前沿的，但他的许多行为方式却是很古老的，同几千年来的一般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异。

他平时在家里是一个寡言的人。有时候我们去看他，就是陪他在那里坐着。在我们问过他的身体，他问过我们的工作学习以后便

坐着。如果我们这方面坐得住，是可以一直坐下去的。再其他就是看报。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如果是秋天还不太冷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就可以看见他穿着棉袄坐在院子里看报。他很注意报上的消息，有时也和我们讨论一下。但每每也就是很少的几句话，显得他很沉默。

他也看电视，也听收音机，但只限于新闻。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所费多于所当费，所得少于所得，都是浪费。”这是他一本书里的题记。可见他作为学理科的，在思想与行为上都是讲求精确的。他认为天下大事有用的都在新闻里说了，再看、再听其他的就是浪费，是做无用功。我们想，这也是他见得多了的缘故。到了他这个年纪，再让他对流行歌曲感兴趣，似乎也说不大通。但他对报纸是喜欢的，他对上面的一些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以及一些国际问题的述评，尤其爱看。所以他对周围事物是敏感的，也是愿意接受的。

在爷爷家吃饭，座位是固定的。奶奶在世的时候，二老总是相对而坐。即使逢年过节家里吃饭的人很多，他们仍是那样坐着。后来奶奶不在了，座位便一直空下来。

奶奶去世以后，爷爷每天向奶奶的遗像鞠躬行礼，至今不辍。

以往每年春节，爷爷都要去看望他大学时代的老师、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夫人。竺可桢、许德珩、吴有训等几位先生在世时，爷爷也经常带我去看望。

爷爷是一个很念旧的人。60多年以前徐悲鸿先生给我爷爷画了的一幅画，至今仍挂在会客厅很显著的地方。那是徐先生为他画的一幅铅笔素描像，至今纸张已经泛黄，而笔触依然清晰可辨。他们是在从法国回中国的轮船上认识的，徐先生那时为爷爷画了这幅画。后

来我爷爷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的理事，徐先生又专门画了一幅喜鹊与梅花，取意“喜上眉梢”，现在挂在爷爷吃饭的地方。另外还有一幅刘海粟先生1932年画的鹰与苍松，这幅画和我爸爸的年龄一样大。

从我记事起，就逐渐有人问起他的养生。因为生我的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现在有一张照片，是他73岁的时候抱着我，旁边站着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是那样年轻，朝气蓬勃，笑容里，充满着青春的光彩。爷爷的笑是轻松而有精力的。那个时候他经常一个人拄着拐杖到我家来。

我们家那个时候住在北京站前的麻线胡同，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拆了，盖起了邮政分练局。我爷爷家那个时候住在朝内南小街的后椅子胡同，他在那里住了大约35年。那个地方现在也拆了，盖起了国际饭店。我上初中时曾经每天往返在这条路上。爷爷那时每天上午或下午在长安街上散步。他走得很快的，手里拿着一根拐杖，甩来甩去地，高兴的时候就用铁头点点地。有时途中到我家来，坐或站几分钟，便走了，可见他一点也不累。有时候我跟他一起在街上走，他常常慢下脚步来等我，或让我走在他的前边，大概是怕我走丢了吧？

他出来散步大多是在夏天和所谓“春秋佳日”，这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轻捷的，有精力的。他那时每星期仍固定地有几天要到科学院去上班。冬天，他一般不到街上去走很远的路，但那时为了生火取暖，砸煤、劈柴这些活儿，都是他自己动手干。煤是那种硬煤，一块一块的，需要用斧子平的那一头，砸成比较小的块；圆形的、一尺来长，类似小树桩的木头，需要立在那里，用斧子尖锐的一头把它劈成

竖的小条。他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旧的衣服或棉袄，弓着腰，脸上的肌肉紧绷着，闭着嘴，干得十分认真。

逢年过节，最能显示出爷爷高兴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去弄厨房的火，然后烧一个家乡拿手的红烧肉，或是霉干菜蒸肉。肉是专门买的，切成寸许的大块，有皮，有肥，有瘦。他很有耐心地把它放在砂锅里焖烂，通常要一个上午，我们小孩在院子里玩儿累了，它也就熟了。盛在一种特别的大而深的有着“四季平安”，或“富贵长春”四个字的碗里。这种碗大概能装一斤多肉。其余的菜，是我们各家带去一些生熟食品、蔬果菜肴，由我的妈妈、伯母、婶婶们下厨房轮流掌灶献艺，最后摆成一桌一年仅此一次的盛宴。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一年一度大聚会的典型缩影吧。

爷爷年轻的时候抽过烟，抽过纸烟，好像还抽过烟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据说是在六十年代，偶尔我爸爸发现爷爷好几天没有抽烟了。问起来说是戒了。再问什么时候戒的，答曰：前几天。三问怎么戒的，答曰：是医生劝他少抽，他嫌麻烦，干脆就戒了。从此几十年再也没破过例。他以前烟抽得很凶的，但没有因为戒烟而显出什么痛苦。爷爷是一个内在的人，从实际上去做的人，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人，表面的人。他并没有任何张扬就戒掉了抽了很多年的烟，就是一例。另外他的酒量也很好，但他从未养成每餐喝酒或是经常喝酒的习惯。即使是在年节家人团聚的时候，他通常也只是喝半杯葡萄酒。我知道他的酒量很好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他去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或是“五·一”、“七·一”等其他的庆祝活动，通常

是总理讲完话后过来敬酒，然后是相邻的几桌、相熟的几位轮流地逐一敬酒，每逢这种场合，他总是要喝掉多半瓶茅台酒的，回来以后面孔微微泛红，笑咪咪的，显得很高兴。他说那些都是他很敬重的人士，人家来向他敬酒，他一定不能敷衍了事，这点礼貌是要讲的。

最近这些年，有些活动，他逐渐放弃了。包括春节时的下厨房做菜，七十六、七岁时的上街拿牛奶，七十八、九岁时的砸煤、劈柴，八十岁时的长安街散步，八十六岁时的访美。现在爷爷已经九十四岁了。不久前电视上播放了他在乔石委员长旁边参加了西城区人民代表大会投票的镜头。他穿着中山装，自己从大厅的中央走到桌前，弯腰取下眼镜，弓身填写选票，自己走到票箱前投下选票。不用人搀扶，也不拄拐杖，步履不蹒跚，动作不迟缓，不戴助听器，眼不花，手不抖。

我曾和妈妈一起议论过爷爷的养生之道。觉得他似乎也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体质上好，是他从小打下的基础，到老年以后他还每天做一套自编的保健操。包括下蹲、起立，弯腰摸地等，还经常用力往自己的身上拍打，打得时候叭叭有声。其作用大概是可以通筋活络。他肯定没有看过什么养生保健之类的书，药补、食补之类的理论，他肯定也没照着做过。但是他似乎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各个器官都很正常，除了治牙以外没有动过手术。这话我是亲耳听他讲过的。八十岁以后住过几次医院，也都是冬春之际的伤风感冒，从无大碍。至今他可以吃花生米，炸的，还经常吃红烧肉。

从我爷爷长寿的实例上悟出一个道理来，那些整天拼命锻炼和拼命吃药保养的人，实际上是大专注于自己的承受能力。心理学上

似乎也有一种提法，叫自我暗示，心里越怕有病，有时候倒反而越容易生病。你战略上蔑视它了，它也就没了。

从我爷爷的具体实践上看，我给他总结的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很少能见他为一件什么事而大动感情。这几年我的哥哥、姐姐们陆续有人结婚，有人生孩子。他们把自己的新婚爱人或是新生儿带回去给爷爷看，他也只是问一些平常的话，然后就是那么笑咪咪地坐着，显得很高兴，也显得很平和。绝不会象时下的有一些爷爷、奶奶那样，一见到孙辈回家就像见了皇上一样。有时候他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也只是轻轻地说一声：“哦”，再说一两句和这事有关的话，比如：“他那时候和我在某某单位是同事，对我很照应。”然后就不再说什么，坐在那里，抬起脸，长时间地望着窗外。

爷爷平常不很讲话，行文也很简单，但是让你感觉很有内容。我曾经看过一篇评述杨振宁先生的文章，说杨先生的文笔是典型的科学家所写的文学作品，文笔流畅、简洁而有韵致。我觉得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同时我也认为用“科学家所写的文学作品”形容我爷爷的日常行文与科技文章，也是很贴切的。这些搞科学的大家所写出的文章，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讲究精确，用字求精，较少枝蔓与缠绵，文笔质朴而直白，说理晓畅而谨严，照顾周到。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内容诚恳扎实，不作空洞言语，所以一般篇幅不长而言之有物。我记得我所见过的我爷爷早年所写的一本《初中物理》，只有薄薄的几十页，文笔非常简洁。我现在还能记得很清楚的一句话是关于物体的定义。爷爷写道：“如我们日常所见，一张桌，一把椅，一架梯子，都

是物体。”没有那些拗口的，抽象的哲学定义，言简意赅，使任何一个初学者都一看明了。

爷爷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喜欢亲身实践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之初，曾经身体力行，提倡由科学界各个学科的顶尖专家亲自面对面地给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借以打牢他们的各专业基础，同时也唤起他们对各学科的热爱。当时真是曾经轰动了一时，全国自然科学界的近百位各门类的顶尖专家，在科大创办之初一直到“文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陆续轮流到科大给大学低年级学生讲课，为建国后成功培养自然科学界各方面的人才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爷爷曾经连续6年亲自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学课程。他每次讲课都是借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有时二、三年级的很多学生也要跑去听，因为他每次所讲都有新的内容。他主张“学习要深入浅出，教学要深入浅出”，认为这样学生才能深入思考，提出问题，进而试图解决问题；老师也才能把深奥复杂的道理讲清楚，讲透彻，对教、学双方都可以有很大的提高。

他一生从事科研，也一生从事教育。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他以八十乃至九十多岁的高龄，多次回科大视察、指导工作，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还是我国第一所正式的培养研究生的学府——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在此期间他办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由他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联合提倡并创办的中、美双方联合招考中国物理研究生赴美攻读的CUSPEA项目，在邓小平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组织人员出国留学之

始。迄今共考选成绩优异者9批共900多人赴美国72所大学与研究机构深造，至今已有很多人学成回国，投身建设。

有时候我常想，在家里的爷爷，只是一个平常的老人，只是一个在冬天里自己砸煤劈柴的老人，只是一个经常爱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抬头看着天的老人，而他在外面，在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有着一个怎样多采的世界啊。

他认识那么多的人，他有机会和那么多优秀的人合作，他有机会把他的才能充分地展示与贡献给社会，他也有机会帮助和培养了那么多的人。

在一次纪念会上，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盛誉的钱三强先生深情地回忆起三十年代初爷爷对他的帮助和培养。

那是一次我难得一见的盛会。中国科学界的那么多“之父”坐在那里，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中国的著名科学家都聚拢在一起。他们是那样的简朴、平凡，毫无时下一般所谓名人的狂傲之气。他们只是那么文质彬彬地坐着，笑咪咪地，细声细语地交谈。离得远的人，他们只是远远地相互招手，微笑，打招呼。绝没有人大呼小叫地四处奔走。他们见过辉煌，也拥有过辉煌，但绝非是名利中的人。这使我悟到：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超然物外，也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能在朴素中显露出才华来。

与我同坐的有杨振宁先生称为中国半导体科学之父的黄昆先生，享有中国原子弹之父美称的彭桓武先生，以及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先生，中科院的王佛松副院长，中科院物理学部的章综主任，以及中科院物理所的杨国桢所长等诸位。他们彼此间谈到科研体制的改革，谈到科技人员的工资，又

向我妈妈问起大学里的教师住房与学生的军训。黄昆先生说起他的儿子在英国当木匠，做出了很好看的家具，较之机器制做的家具有了艺术品的韵味。何泽慧先生说起我爸爸从瑞士给她和钱三强先生带回来的“契司”很好吃。彭桓武先生爱喝桌上的一种饮料，喝完后再问服务员还有没有。其实这就是科学家生活的另一个方面。研究半导体的权威照样可以鉴赏木器所发出的光韵与色彩；主持研究原子弹的领导也同样可以对某一种饮料有所偏爱；毕生探索物质深层秘密的老者也照样可以钟情于某一种特别名牌的黄油。他们让你感受到是他们的普通和善良。

爷爷的朋友尽是一些这样的人。

他们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平静与安详，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失败与挫折，科学的思维，科学的实践，排斥了懦弱者的凄惶与惊恐；因为他们拥有过成功与荣誉，创造的艰辛，劳作的代价，排

斥了肤浅者的患得患失。

爷爷这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国家，见过不少的人，所以他也能够做到同样地平静与安详。他年轻的时候在法国随居里夫人一起从事过研究工作。曾经还有过这样的说法，即居里夫人想把她的小女儿伊娃嫁给他，后来得知他在国内已与我奶奶订婚，方才作罢。后来在1937年他就把他的得意学生与助手钱三强推荐给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莲那夫妇，跟随他们做研究生，后来钱先生也成了著名的科学家。

他1946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历时一年，访问了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

五十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其他的一些国际科学会议，到了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这些地方为他早年游学欧美时所未到。

七十年代他又开始有机会到国外去。几次到日本，除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京都、奈良等地外，还去过今天已经很有名的筑

波，当时只是初建，以及广岛，这大约是为了和平的目的。

1978年到1980年前后爷爷曾几次随方毅等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到西欧各国去，见过那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总理巴尔，德国总理施密特，外交部长根舍，以及英国首相希思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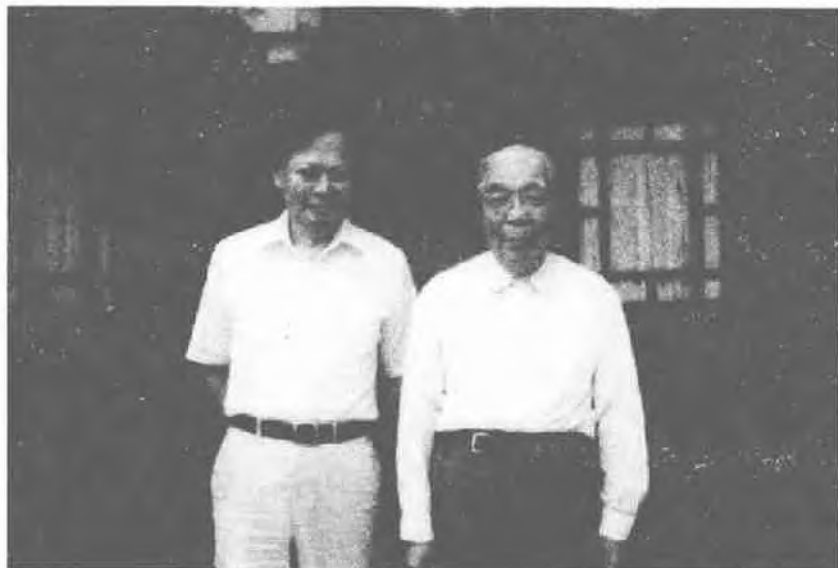
在这以后由于爷爷是法国物理学会的终身理事，所以还曾一次或两次去过法国，并且在1990年由于“对增进中、法两国之间的科技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由法国总统密特朗署名颁发的嘉奖令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一级骑士勋章。

也是从1972年开始，旅居海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纷纷回国访问、讲学，爷爷也是每次都参加或主持接待，李、杨等先生都是很客气地执晚辈礼。杨振宁先生曾将自己的论文选集送给爷爷，题辞写道：“严老伯存正，振宁，于石溪”。

后来又同阔别30多年的老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欢聚畅谈，开海峡两岸科学家交流会晤之先河。

现在的爷爷已经过完了九十四岁的生日，已经不太出门到外地去了。回首以往走过的路，他和他这一辈的许多老人一样，应该是感觉欣慰的。时间还在不断地向后延展，以后的事，要看我们的了。

（责任编辑 宋文茂）



一个曲折的悲壮故事 一场惊心的特殊较量

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

● 晓凌



黄骅烈士遗像

1945年10月，应全县人民的要求，河北省新青县名换上了一位英雄的名字——黄骅。这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在新青县的八路军——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而改名的。新青县30多万人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县名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据初步考证，过去在全国曾有28个以共产党员英名命名的县份。其中，现在仍以英雄名作县名的只有7个，即黑龙江省的尚志县、吉林省的靖宇县、山西省的左权县、陕西省的志丹县、子洲县、子长县和河北省的黄骅县。

一阵枪声，副司令员黄骅倒在血泊之中，幸存者证实，凶手就是旅部手枪队长冯冠奎等人

1943年6月30日傍晚，河北省新青县大赵村罩在黄昏的蒙蒙细雨中。

在村东南角的一个大院的东房，正在召开冀鲁边军区司令部侦察通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9个人，有的盘腿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地下，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小圈。正对着屋门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干部。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不时向发言者问着什么，往小本子上记着。他，就是会议的主持者，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同志。

6时20分左右，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林兆开始汇报情况，由于阴天下雨，屋子里显得有些昏暗。黄骅放下手中的笔记本，摆了一下手，朝门外喊道：

“小李子！”

“有！”黄骅的警卫员小李子应声进屋。问道：

“副司令员有什么事？”

“天快黑了，你去隔壁房东家，借盏油灯来。”

“是！”小李子掩上门走了。

黄骅朝迟林兆点了点头说：“你接着说吧。”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门“呀”的一声被推开了，随着一声“报告！”走进一个人来。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周云峰。他给副司令员敬了一个礼，站在门边问道：

“邢司令员岛上有信来吗？”

“有，上午刚送来的，他说你没有去山东学习，要回来。”黄骅说。

“是呀，我刚到狼坨子就病倒了，一直躺在炕上，等病好了学习期也过了。邢司令员说让我回来工作。”

“那好吧，我们这里正在开会，你先去管理股休息，回头我再找你。”

“行，我这就去。”周云峰嘴里答应着，可并没挪脚，而同屋里几个熟人打起招呼来。

黄骅见周云峰扯个没完，打断他的话头说：

“好了，好了，你快去休息吧！”

“就走，就走，”周云峰收住话头，往门外看了看，当他看到门边晃动的黑影时，突然提高嗓门说：“这天也真是……”。

随着他的话音，门边突然闪出几个穿蓑衣的人。黄骅已感觉情况有异，正要掏枪，但已经来不及了，罪恶的枪声响了，接着四、五支短枪向屋内猛射。与会人员因来不及反抗都被打倒在血泊之中。为首的匪徒见阴谋得逞，得意地狂笑着，走过去踢了黄骅尸体一脚，挥舞着手枪说：“走。”

这伙匪徒拥挤着从东腰房走进院子，正遇上10多分钟前被黄骅派去找煤油灯的警卫员小李子和范为民。他们听到枪声，急忙往回赶，在大门口与匪徒发生了枪战。范为民扔出一颗日本造手榴弹，当场炸死一名

匪徒，其余的见势不妙，冲出大院，边打边向村外跑去。

警卫战士顾不得追捕逃犯，赶快跑进会议室，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悲壮的惨景。黄骅副司令员前额被打穿，倒在血泊之中已经停止了呼吸。但他的右手还紧紧攥着插在腰间的手枪柄。同时遇难的，还有精明强干的军区参谋处长陆成道、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科长陈彪、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董兴根。这时，司令部机关干部和警卫连也闻讯赶来，身负重伤的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林兆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喃喃着：“快！快抓冯冠奎！”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十秒钟，警卫连立即出动两个排向匪徒逃窜的方向追击。但是，由于天已擦黑，又在下雨，匪徒们钻进了青纱帐，未能抓获。只是从搜寻时发现的滴滴血迹判断，有的凶手被机枪打伤。

临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发出通缉令，旅长兼司令员邢仁甫指示：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

当晚，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新青县委书记叶尚志闻讯最先赶回大赵村，紧接着，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宣传部长李启华也陆续从各地赶回来。他们一面指挥处理后事、抢救伤员，调整部署，防止敌人利用我们内乱搞突然袭击，一面向一一五师师部发出急电。

一一五师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等同志接到边区党委的电报，十分震惊。首长们不会忘记，两年前，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皖南事变后，历尽千辛万苦突出重重包围，却被军部副官、叛徒刘厚总刺死。而黄骅、陆成道的遇难就是抗战以来，我军高级领导遭内奸行刺的第二起严重事件。所以，这一惨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中央和总部的电报指示精神，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给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发出回电，告诉他们，不要把这一事件看成一般的暗杀，要组织力量，尽快破案。

探路的内奸周云峰很快就被捕，他供认了受冯冠奎指使探路的事实。但是，直接制造惨案的罪魁冯冠奎却杳无踪迹。于是，边区领导向全区发出了通缉令：

冯冠奎于6月30日晚7时许率10余人叛变，刺死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凶残万状……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

案法办。

签署人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以及边区党政军领导周贯五、刘贤权、张永逊、张耀增、王边芳等7人。许多人看到,司令员邢仁甫得知黄骅遇难的噩耗,悲痛万分,对冯冠奎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归案,为烈士报仇。

但是,军区机关和熟悉情况的一些同志却在冷眼观察着邢司令员。在冀鲁边,谁都知道冯冠奎的老底,鼻孔朝天,荒草似的胡子,一张血盆大口,两只眼睛射着凶光,活象一头从笼子里跑出来的饿狼,他原先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实在混不下去,跑到新青县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当时,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收留这样的人,但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说:“抗战不分先后嘛!要允许别人进步。”不仅把他收留下来,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他曾屡犯军纪,但都被邢仁甫保了下来,可以说,冯冠奎是邢仁甫最宠信的干部,最得力的臂膀。他去谋杀黄骅副司令,难道和邢仁甫……善良的人们不敢想下去了。

在一一五师师部,罗荣桓、肖华等领导同志也在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很明显,这是一个策划得相当周密的阴谋,不是冯冠奎这样的人所能想出来的。那么,这背后的人是谁呢?来军区参加山东分局5年工作总结会议的冀鲁边军区政委周贯五同志曾经汇报过的一个情况,又在罗荣桓、肖华同志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是3月,周贯五同志来师部汇报冀鲁边区的情况。在谈到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消极避战等情况时,说了这样一件事——

在他前来师部的头天晚上,黄骅同志去看他,黄的脸上显得忧心忡忡,一个劲地抽着旱烟,似乎有许多心事。周贯五同志感到奇怪,前两年边区的形势那么恶劣,他都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性格,现在难关已经过去了,形势正在好转,他为什么反倒更忧愁呢?

过了很久,黄骅轻轻咳了两声,望着周贯五缓缓地说:“我不知怎的,总担心我们的个别同志……唉!”

周贯五一听,就知道他说的“个别同志”是指邢仁甫,连忙问道:“怎么,邢仁甫最近又搞什么名堂了?”

黄骅摇了摇头说:“这倒没有听说,他再对我个人搞些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担心的是他总有一天要走上邪路,给我们部队造成损失。”

两人沉默了很久,直到月牙儿已经爬到房顶,周贯五对黄骅说:“这样吧,你把这些情况向卓如同志谈一下,我到了师部也尽快向上面汇报。”

想到周贯五汇报的这一情况,想到邢仁甫对师部

调他去延安学习的安排百般推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动身的事实,几位师首长都为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而感到内疚和不安。7月8日,罗荣桓、黎玉、肖华发出《训令》,训令中说:

6月30日晚,被收编之伪军冯冠奎带数人窜入会场。

开枪刺杀我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等同志,全军必须接受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一、我们的少数干部对土匪流氓的两重性认识不足,对土匪的政策运用上犯了原则的错误;二、对敌后斗争的尖锐性及敌人特务活动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三、机关保卫工作表现松懈,给敌人及内奸分子以空隙。

训令要求:

一、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国特对我破坏的严重性;二、加强机关保卫工作;三、对现已改编之土匪部队应进行政治上艰苦的改造工作,不允许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四、对一般的伪军土匪成份,在目前不应求其反正,要使他们长期埋伏。

7月上旬,师部接连给边区党委发出电报,要求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抽调得力人员组织侦破,捕获凶手,务必弄清事件真相。

搜寻、搜寻、再搜寻,全区部队、民兵都在搜捕冯冠奎,只要抓到他,一切就清楚了。虽然暂时还没有抓到,但人们相信他是跑不了的,因此在冀鲁边区,谁都认识冯冠奎,赫赫有名的土匪,军区的手枪队长,况且他又特别爱出风头。

一一五五师首长收到一份急电,司令员邢仁甫拉人叛变,清河军区副政委受命奔赴垦区

十几天过去了,凶手冯冠奎既未抓到,又没有投敌消息,案件的侦破没有新的进展。而这,更说明了冯冠奎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黑手,说明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分局和师部的领导急切地盼望着来自冀鲁边区电台的消息。

突然,与冀鲁边区相邻的清河军区电台发来了急电。师部机要科的译电员刚刚译出两行,不禁大吃一惊,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对几个关键性的字码重新进行了核对,没错!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很

快译出了这份急电，一溜小跑送到了师首长手中。

电报是以教导六旅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政治委员姚昌洲两人名义打来的，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派人给独立团团长冯鼎平送信，叫他到望子岛议事。冯去后，邢仁甫和他老婆宋魁玲又倒茶，又递烟，显得格外亲热，尔后对冯鼎平说：“黄骅、王卓如、李启华他们排挤咱们当地干部，你回去后把独立团拉到岛上来，准备和我一块走，有我带着，日本人和老蒋都不会亏待咱们的。”

冯鼎平为难地说：“哎哟，你不知道，独立团那么好拉？姚昌洲、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刘虎臣……要他们反过来，我可指挥不动。”

邢仁甫给他出点子说：“咱们部队都是农民出身，地方观念很重，你去试试看，就说师部要调咱们南下集训，大家如果起哄，就趁机把部队拉过来，干部中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

冯鼎平没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回到垦区。他支开政委姚昌洲、副团长贾乾瑞、政治处主任辛易之、党总支书记潘大可等同志，把3个直接带兵的营长、教导员王之斌、刘仁桂、刘虎臣私下叫去开会。

他把邢仁甫的话学说了一遍，然后，吞吞吐吐地说：“邢司令要我们把部队拉到岛上自卫，你们看……”

他的话还没说完。二营营长刘虎臣呼地站了起来。手按着枪把说：“这不是要叛变吗？”

冯鼎平一听，脸刷的红了，两眼盯着墙壁直发愣。

刘虎臣紧接着说：“冯团长，你太糊涂了，我们怎么能背叛革命背叛党呢？”

冯鼎平结结巴巴地说：“那我怎么办呢？眼下，要么跟着他跑。要么开小差溜掉，否则只好去投案自首。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刘仁桂、王之斌说：“当然，自首好。”

冯鼎平说：“那好吧，我去自首。”

这时候，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3个同志进来了，原来他们听说冯鼎平悄悄找几个营里领导开会。觉得事有蹊跷，便约定一起去探探风声。

事已如此，冯鼎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并问大家：“邢仁甫要我明天再去望子岛，商量接部队的事，你们看我去还是不去。”

经过研究，大家认为还是去，暂时不要惊动邢仁甫，如能了解到详细情况更好。这个意见，得到了刚刚回到团部的政治委员姚昌洲的赞同。考虑到冀鲁边区电台都用统一的密码，一旦对外联络，势必要惊动邢仁甫控制的军区电台，为了防止泄密，姚昌洲决定亲自到

邻近的清河军区，通过他们的电台，直接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当晚，他来到清河军区，找到了清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其人，并顺利地向一一五师发出了电报。

情况来得突然，但又在预料之中，罗荣桓、黎玉、肖华等领导同志当机立断，电令清河军区刘其人同志立即携带一部电台赶赴独立团驻地，协助独立团和冀鲁边区党委处理好这一突然事件，并沟通独立团、冀鲁边区党委与一一五师师部的联系。

根据师领导命令，刘其人同志率领一支小分队和电台迅速赶往独立团驻地，半路上，遇到准备再到清河军区向师部汇报情况的冯鼎平。

原来，这一天早晨，冯鼎平按团党委决议，乘船到望子岛向邢仁甫表“忠心”。当邢仁甫听说大家都很愿意跟他走，高兴得不得了，叫独立团做好准备，等和日本人联系好就拉到无棣去，到时候日本人会派船来接。并得意忘形地告诉冯鼎平，黄骅是他派冯冠奎暗杀的，现在冯冠奎已被他接到望子岛上，边区党委和军区有天大本事也找不到这来。

电台就地架起来了，随着“滴滴嗒嗒”的声音，这一十万火急的情报传到了师部，又把师首长的指示传到了刘其人的手中。

在独立团驻地，刘其人代表分局和师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首先由冯鼎平介绍了邢仁甫密谋投敌和杀害黄骅的内幕。刘其人作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能让叛徒们有所察觉；第二、把张河的两条船沉掉作河障。并派部队把守，以防敌人里应外合；第三、电台照常与岛上联系；第四、迅速对部队进行革命气节、军队纪律教育，增强执行党的指示、师首长指示的自觉性。并根据冯鼎平的请求，暂时免去了他的团长职务，但仍然由他负责与邢仁甫的联系。

一只小船从垦区悄悄启程，乘人是一位精心挑选的女性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但是，直到此时，冀鲁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还不知道邢仁甫投敌叛变的消息和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电话没有，电台不能用，唯一的办法是派人去送信。可是，派谁去通报情况呢？

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送信者不但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而且还要通过日伪的重要封锁线。

这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它关系到能否彻底



一一五师领导人罗荣桓（左二）、肖华（右一）、陈士榘（左二）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同志在一起

粉碎邢仁甫投敌叛变的阴谋，关系到冀鲁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的安全，关系到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这个情况又是那样的令人震惊，所以送情报的人必须能得到边区党委主要领导的绝对信任。

终于，决定了！

船在茫茫夜色中行进，一位奉命送信通报情况的女干部睁着一双甜美而警惕的眼睛，随时准备着应付不测，并不时催促船夫加快速度。她叫朱凝，是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当时正在垦区养病，是一位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当然，之所以选拔她挑这副重担子，还因为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她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爱人。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最终战胜众多候选人，夺得出征权。

小船沿着海边经过沾化、无棣等县。穿过层层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边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邢家王文村。

当朱凝出现在她爱人面前时，王卓如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竟肩负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

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张耀增、张永逊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朱凝传递的情报和师领导的指示。

在这之前，保卫部门也了解到，冯冠奎在行凶之后逃到了海边，到处骂娘说：“邢司令叫我杀死黄骅，说事成之后给我银子，给我官做，老子挨了一枪，他也不管了……”闹得冯家堡一带人人皆知。这事传到岛上以后，邢仁甫马上把冯冠奎接走了，据说在岛上很受优待。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对邢仁甫十分怀疑，但还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所以，正组织人员继续调查。

几方面情况汇合,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惨案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正是军区司令员邢仁甫,他在惨案之后的眼泪,只不过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团党委的领导人回顾邢仁甫的历史和所做所为,更清楚地看到,邢仁甫发展到这一步,决不是偶然的。

一个旧军官,却又拒绝思想改造,在冀鲁边军区内部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

邢仁甫,盐山县人,曾在国民党军队马鸿逵部当过副官、参谋。1929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在平津一带做党的工作,人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活动能力也比较强,但这个人品质不好。入党后,他的旧思想并没得到很好改造,他在平津一带结交的大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青帮头子、惯匪,为此,受到党组织的批评。

“七七”事变爆发后,津南党组织在盐山县旧县镇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抗日武装。

7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北民众抗敌救国总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建立抗日救国、团结对敌的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救国总会的会长是周砚秋,军事委员长就是邢仁甫。

1948年7月,冯国瑞和曾国华支队、孙继先支队到达乐陵,与三十一支队(救国军)会师。为加强边区统一领导,7月8日,在乐陵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马国瑞任书记,曾国华、孙继先、李启华、李宽和、潘寿才、杨靖远、邢仁甫为委员。根据徐向前的指示,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以乐陵为中心,向北发展建立津南政权;然后向南发展,建立黄河以北的鲁北根据地。所以,由马国瑞、李宽和主持,在乐陵召开了三十一支队及各部队负责人会议,决定取消“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番号,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后改为平津支队)。就在这时,邢仁甫开始暴露了他的“山头主义”。他借口部队中有一部分人成份不纯,须待工作成熟后再说,拖延整编。由于绝大多数同志都坚决拥护这一决定,邢仁甫不得已又提出留一部分人仍用原来的番号,由王昭明统率,以照顾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结果,没多长时间,他的这个“第二武装”就投敌了。

说公道话,邢仁甫也曾领导部队打了一些胜仗,为党、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山大王”思想却使他不能正

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他在平津支队站稳了脚,就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压制和排挤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又把很多地痞流氓、旧军官拉入部队,委以重任,不久,就在平津支队形成了一个反党帮派集团,特别是在肖华、符竹庭率领挺进纵队主力南下,杨靖远、马振华同志相继牺牲以后,他的反党宗派活动也逐渐达到高潮。

对于邢仁甫的问题,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领导有所察觉。1941年1月,冀鲁边区的部队扩编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任命邢仁甫为旅长兼司令员。但实际上,此时,邢仁甫尚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周贯五同志以政委身份兼旅长和司令员,1941年6月,又调黄骅同志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

黄骅对邢仁甫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邢仁甫专权投敌的障碍,邢仁甫决心杀害黄骅作为投敌的见面礼

黄骅原名黄金山,1911年2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阳新县良上村一个雇农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总支书记等职。在每一级领导岗位上,都充分显示了他优秀的政治品格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黄骅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深造。结业后,留任红军大学干部二团政委,和皮定钧团长合作共事。抗战爆发后,组织上调他到晋西南任游击支队支队长、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同时兼任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晋西支队当时负责联系和指导当地决死队的工作。为便于做决死队的工作,他改名为黄骅。1940年4月,他被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令员。在八路军中,黄骅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将领。

他一到冀鲁边,就显示了他的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在张大庄突围战中,掩护突围的机枪发生了故障,黄骅随手拔出20响匣子枪,弹无虚发,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在他的指挥和掩护下,我军胜利突出重围,特别是在齐庄、杨庄伏击战中,他指挥十六团和新海县大队,消灭日军70余人,伪军400余人,俘虏伪军11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小炮4门,步枪500支,手枪30余支,子弹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这一仗极大地威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在多次的战斗中,教导六旅的干部战士了解了自

己的副司令，爱戴自己的副司令，加上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所以，很快成为教导六旅最有威信的干部。

1942年4月，由于邢仁甫本人的一再要求，师首长考虑到冀鲁边区本地干部较少，从大局出发，同意他回来任教导六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员。事后看，这至少是一个欠慎重考虑的决策，邢仁甫回到边区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以前经营的那个宗派集团，此时的邢仁甫对抗战胜利已经失去了信心。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这本来是日寇走向灭亡之前的猖狂一跳，而邢仁甫却认为，共产党、八路军不行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不行了，蒋介石迟早要投降日本人，共同对付共产党。他积极要求回冀鲁边区，就是为了在万一抗日失败的时候，手里抓一支部队投降日寇，靠老蒋都有点资本。他回边区才两个月，就赶上日寇对冀鲁边区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扫荡”。这次“扫荡”由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亲自坐阵德州指挥，日寇出动两个旅团及伪军共两万多人，从德州、连锁、泊镇等铁路沿线据点出发，以多路奔袭的战术，对我东光、宁津、南皮、庆云一带实行“拉网包围”，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一分区的党、政、军机关和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被敌人包围在东光县四柳村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边区文教会主任吕器、翟晋阶、当地开明士绅杨万和、兰桔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3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邢仁甫被这次大“扫荡”吓破了胆，他要选择最佳时机投敌，就必须首先保全好自己的性命，在他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此，他不顾黄骅、王卓如、周贯五等同志的一再劝阻和批评，用一个冬春时间，在新青县的一个荒岛——望子岛上修建了所谓“后方基地”，并运去大批食物，然后，带着老婆、亲信和警卫部队躲进了“安乐窝”。

鉴于这种情况，1943年初，山东分局和师部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并计划由黄骅同志接任旅长和司令员。但邢仁甫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赖着不走，同时，加快了投敌叛变的准备步伐。第一步，就是杀害冀鲁边区战将黄骅同志。按邢仁甫的算盘，杀掉黄骅可以说是一石击三鸟：第一、投降日本人有了见面礼；第二、便于自己控制和拖走部队；第三、边区没有军事干部，便可以拖延和阻止师部调他受训的决定。

在大赵村凶杀之前，邢仁甫曾三次组织对黄骅的暗杀，都没有得手。黄骅对于邢仁甫组织的暗杀虽不知情，但已闻出邢仁甫味道不正。他寄希望于周贯五政委

向师首长反映情况后能很快采取措施，而山东分局和师部的领导对此预料不足，调离邢仁甫的决心不大，一拖再拖，黄骅对自身的安全也未引起足够警惕，这就给了叛徒们以可乘之机。

部队包围了邢仁甫的驻地，但是内奸鸣枪报警，邢仁甫逃跑了

.....

在查清邢仁甫的罪行之后，边区党委在王卓如主持下开会，大家根据朱凝传达的师领导关于“不要操之过急，尽可能避免刀戈相见，否则斗争公开，容易被敌人利用，引起混乱，妨碍大局”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开会为由把邢仁甫调出望子岛，实行拘捕，交师部法办。

这时，邢仁甫还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准备再多拉拢和蒙骗一些干部和部队投敌，以增加资本，所以，接到区党委开会的通知以后，就乘船离开了望子岛，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邢家王文村，而是住在了10里以外的毕家王文村。

狐狸已经出洞，怎么办？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和特务团副政委赵德修、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回民支队副政委刘济民等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赵德修和刘济民带两个连，悄悄将毕家王文村包围起来，在逮捕邢仁甫时，尽可能避免动刀动枪。

两个连经过紧急动员，于黄昏出发，逼近毕家王文村时，天已经接近拂晓。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向村子四周包抄过去，不料，就在这时，隐藏在特务团的内奸、4连连长王爱芝突然“叭！叭！叭！”朝天连开3枪，打破了黎明的宁静，整个行动计划立即被破坏，部队跑步散开，包围了毕家王文村。但是，狡猾的邢仁甫，一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穿，惶惶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光着脚就跑出了村庄，一头钻进了高粱地，拼命向海边跑，在一个交叉路口，正遇上军区一侦察员骑驴回村，邢仁甫欺骗说：“快下来！有情况！”

侦察员不知邢仁甫叛变，跳下毛驴对邢仁甫说：“你骑驴快走，我来掩护”。

当侦察员知道邢仁甫叛变逃跑的真相时，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这只狐狸就这样侥幸逃脱了部队的追捕，但是，却留下了许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其中有他写给沧州日酋谷川的一封信的底稿。他在信中向谷川详细介绍了新青县的战略地位，我军在该县的兵力，以及边区领导

机关在该县的常驻地点。建议谷川予以充分重视，尽快解决新青县的共产党和八路军。

边区党委向全区宣布事情真相，邢仁甫精心策划的率部集体投敌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斗争已经公开了。区党委紧急商议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邢仁甫叛变的真相通告全区党组织和部队，防止邢仁甫混水摸鱼，拉走部队。

7月17日，边区党委决定：一、向全区宣布邢仁甫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同邢仁甫作斗争；二、撤销邢仁甫的一切职务，通缉捉拿；三、由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张耀增代理行政委员会主任。

由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的《告全区同胞书》，揭露了邢仁甫的真面目：

黄骅、陆成道同志于6月30日被叛徒冯冠奎刺死……。

事实真相是由已经叛变仍隐蔽在抗日阵营之中邢仁甫所指使。……邢贼此等行为确系叛变国家、民族，故决定除将邢仁甫所兼各职撤销外，并通令各级政府、军队、团体机关及边区人民，将邢贼捉拿归案，依法惩办。

同时，边区党委决定由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应扬抢在邢仁甫行动之前赶到海边冯家堡一带，把驻在那里的部队带回来。并通知全区党组织和部队，没有王卓如签署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部队和财物。

刘应扬接受任务后，带着王卓如给几个连队干部的亲笔信，星夜出发，驻冯家堡的一个连和驻沙头的特务营两个排接到命令，毫不迟疑地跟着刘应扬回到了邢家王文村。

邢仁甫经呈子河逃回望子岛以后，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岛上的机关、部队获知他叛变的真相，同时，派人到处散发他搞的《告全区群众书》，造谣说：

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南蛮子杀害黄骅后，又要杀害我……

在到处散发颠倒黑白《告全区群众书》的同时，邢仁甫给各地、县干部都写了信，四处策反，煽动部队和群众起来骚乱，并阴谋建立所谓“肃托支队”。

许多同志在接到邢仁甫的煽动信以后，都立即把信交给了党组织，揭发了邢仁甫的阴谋。

7月20日，邢仁甫的亲信、原军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孙长江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反戈一击，揭露邢仁甫从谋害黄骅同志到投敌叛变的全部经过情况，还把邢仁甫先后给他的几封亲笔信都交了出来，邢仁甫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事已如此，宜派人暗杀王卓如、李启华，就可挽回危局……想法把部队拉出来……”

区党委一边向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公布这些材料、证据，一边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区党员积极投入反叛斗争，并在干部党员中开展了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不服从党的领导、搞独立的倾向；反对宗派主义和小组织活动；特别在部队中开展了反对个人独立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斗争。

至此，除了望子岛上人员还被蒙在鼓里，全区党政军各级机关、部队、群众团体以及人民群众都已经识破了邢仁甫的真实面目，邢仁甫被困孤岛，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

为了进一步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消除邢仁甫叛变带来的影响，山东分局和师部研究决定，改变原来调周贯五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让周贯五立即赶回冀鲁边区。

这天晚上，罗荣桓、肖华召见了周贯五，向他宣布了分局和师部的决定。罗荣桓满怀感情地说：“边区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全知道了，在这场斗争中，事实证明，边区的部队和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你要抓紧准备，尽快赶回去，把这场特殊的斗争搞好，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和壮大！”

肖华又具体指示，要派人到望子岛，把邢仁甫叛变投敌的真相告诉大家，他们现在还蒙在鼓里，一旦知道事情真相，就会同邢仁甫一刀两断，要尽量争取文斗，防止矛盾扩大，被敌人利用。

在清河星区，周贯五同王卓如、刘贤权以及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共同研究了反邢斗争。

根据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海上特务团政委傅炳翰以“送给养”为名，亲自到望子岛上去做工作。傅炳翰曾是“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秘书长，在冀鲁边区干部、战士中有很高的威信。

望子岛是个只有两平方华里的小岛，一眼可以望穿，岛上所有的人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三、四十人。但岛子四面环水，暗礁密布，大船不能靠岸，所以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地。傅炳翰一上岸，就被邢仁甫的亲信杨铮候、陈二虎、潘特、冯冠奎等人软禁起来，审问他来岛上干什么。傅炳翰说：“周政委回来了，他要我带个信

给大家，请大家回去，以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咎。”

杨铮候说：“这话信不得！”陈二虎也在一旁跟着附和，冯冠奎自知罪恶深重，把头摇得拨郎鼓似的，连声嚷嚷：“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我可不上当！”

傅炳翰看这几个家伙都是花岗岩脑袋，就转了一个话题问：“邢司令怎么不在，我找他有事。”

杨铮候抢先说：“邢司令有病，去海堡休养啦！”

傅炳翰见他老向其他人使眼色，知道里边有文章，等到只剩下陈二虎这个炮筒子的时候，就悄悄向他打听。原来，邢仁甫开始跟日本人谈判投降条件时，吹嘘自己有四千人枪，可是闹来闹去，除了望子岛上这百十来人，别的部队都拉不动，鬼子又坚持要派人来先点验人数，再委以官衔，发放军饷，邢仁甫一听慌了，觉得牛皮一破，鬼子不一定信得过他，又决定投靠国民党。他老婆有个干妈叫韩重仪，是天津救济院院长，与国民党特务系统关系密切，邢仁甫就和宋魁玲去了天津。

傅炳翰听说邢仁甫不在岛上，决心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先把部队拉下岛，但是，杨铮候等人每天一步不离地监视着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在一次解手的时候，他默空子和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说：“邢仁甫叛变了，你快叫大家下岛。”

李相轩马上把话传给其它人，不到一天，岛上的人就少了三分之一。

正在这时，邢仁甫突然回来了。他在天津等着和国民党特务联系，一直没有结果，又怕岛上出事，急忙赶了回来，一看岛上已不足百人，气得七窍生烟，下令把傅炳翰干掉。谁知一找，傅炳翰也逃跑了。

邢仁甫此时已六神无主，他唯一的希望是韩重仪快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打通关系。消息终于来了，他的亲信周保成和两个特务到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挂上了钩，但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和他的参谋长都不太相信，对周保成说：“共产党这样大的干部叛变是极少见的，如果是真的，你叫他自来。”没办法，邢仁甫只好亲自到洛阳去，表示自己叛变革命的决心。

了解到以上情况，周贯五、王卓如决定，再派大赵村惨案中的幸存者齐耀亭去望子岛做工作。

齐耀亭划着小舢板，刚一上小岛，就被岛上的部队围住了。齐耀亭一眼看见冯冠奎也挤在人群之中，灵机一动，立刻大声说：“啊，冯大哥！你可是好枪法呀，打死了黄骅、陆成道不说，还给了兄弟这么一家伙，我可躺了几个月的炕啦！”说着扒开胸前的衣服，露出块很大的伤疤。冯冠奎不知是计，脱口而出：“这不怪我，是邢司令叫我干的，你受伤也是活该！”旁边的杨铮候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建在马鞍山（赣榆县）的一一五师
抗日烈士纪念塔

冯冠奎不打自招，使蒙在鼓里和不相信李相轩说话的干部战士彻底醒悟过来，岛上的人马上分成两方，一方是邢仁甫的死党，一方是醒悟过来的干部战士，双方荷枪实弹，气氛十分紧张。

齐耀亭看到除了邢仁甫的死党，剩下的干部战士已全部争取过来，连电台的同志也和邢仁甫决裂了。想到临行前，周政委和王卓如同志要自己设法把受蒙骗的干部战士安全带出海岛的嘱咐，于是，一边向杨铮候等一伙死党宣传区党委既往不咎的政策，一边派人找船组织登船离岛。杨铮候、陈二虎等人开枪吧，怕打不赢；阻拦吧，又怕齐耀亭等人把他们的死党也策动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齐耀亭带着人和电台离去。

此刻，岛上只剩下杨铮候、陈二虎、潘特等七、八名死党和陈二虎的三十来个把兄弟了。秋风落叶、冷风习习，眼见天气渐渐寒冷，海岸即将被冰冻封锁，去洛阳的邢仁甫又杳无音信，于是，他们也下岛投敌了。

几天后，邢仁甫拿着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兴冲冲地从洛阳赶回岛上，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他精心策划的率部集体投敌阴谋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在叛徒伏法的时候，人们在烈士墓前告慰烈士，人民胜利了！

邢仁甫投敌以后，就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献计献策，他亲自写了《剿共灭匪计划》送给日本人，日本人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委任他为沧县、南皮等津南六县“剿共司令”。

9月底，日寇根据邢仁甫的建议，首先集中重兵“扫荡”。我驻新青县的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我边区领导接到情报，立即作了周密部署，派出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东放一枪、西放一枪，吸引敌人追来追去。几天后，敌人跑得精疲力竭，活象害了一场大病，特别是东洋兵和东洋马，喝了海边的苦水，大都上吐下泻，一个个元气顿丧，战斗力急速下降。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下令撤退。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返回的路上，我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已给他们挖好了死亡的坟墓。当敌人撤至韩村附近时，埋伏的回民支队突然一齐开火，顷刻之间，几百名日伪军见了阎王，一场“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

1944年1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冀鲁边区和清河两个边区合并为渤海军区，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渤海边的军民，已经望见了胜利的曙光。

曾经受过邢仁甫蒙骗的同志一旦醒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和牺牲精神，也受到了党组织的照常信任，在合并整编时，冯鼎平重新担任了四个主力团之一的垦利独立团团长。

而叛逆们却是另外的下场。

走投无路的杨铮候、陈二虎离开望子岛以后，逃到无棣县投靠国民党军张子良。张记恨陈二虎过去杀过他的亲信，假意答应，暗中却设下埋伏，叛逆们刚进城门，城门两侧突然弹雨齐发，陈二虎和几十个把兄弟大部被打死。剩下的几个叛逆虽然当时死里逃生，但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1945年9月12日，无棣县城解放，杨铮候、邢朝兴被我军俘获后处决，刘永生解放后躲在广西，被查获后押回边区处决。

最有趣的是潘特的落网。潘特原来是冀鲁军区后

勤部长，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肖华同志率领挺进纵队转战冀鲁边区时，潘特在挺纵下属的平津支队后勤部工作，断不了去纵队开会。肖华同志工作作风深入，记忆力很强，对下面的干部往往见一次面就能记住名字，尤其对冀鲁边区本地的干部更加注意，所以，潘特在肖华同志脑子里也就挂上了号。

邢仁甫叛变投敌，潘特是死党之一，这样，他在肖华脑子里又最后打了个烙印。1948年，冀鲁边区全境解放，潘特一看势头不妙，摇身一变，逃窜到北京。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潘特自知罪恶深重，改名换姓，挎个篮子，在前门卖起了香烟，俨然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小贩。他以为，这样一来，就没人认识他了。

事也凑巧，一天，刚调到北京就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将军从前门路过，人多车速慢，肖华一眼瞥见路边卖香烟的小贩十分面熟，他脑子急速将往事过了一遍，立即闪现出潘特的面孔。

车缓缓停在路边，肖华和警卫员走到潘特身边，他还以为是向他买香烟的顾客。随着那威严的喝问：

“潘特，你还认识我吗？”

潘特抬起头来，一双明亮、冒火的眼睛正盯着他。他认出来了，这是当年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一声长叹，潘特的腿软软的，不由地跪了下来。

10年时间，肖华将军竟能从人头攒动的前门，认出这个可耻的叛徒，可见将军对黄骅怀念之深和对叛徒切齿之恨。

至于那个反复无常的惯匪冯冠奎则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一碗毒酒把他送上了西天。

邢仁甫比他的爪牙们都更能干一些，日寇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天津站中校组长，还被委任为河北省第二专署保安司令兼专员，对人民欠下了更多的血债。

1949年天津解放时，这条“鱼”再也游不动了，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人民政府经过审理，认定邢仁甫罪恶深重，证据确凿。

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给德州专署的158号法令：

经本府决定，处该犯邢仁甫死刑，特押解你处，希依据材料、罪状，召开代表性会议，宣判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反映群众报告本府。

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喜泪交流。刑场上，人山人海，争看叛徒伏法的可耻下场。



华克之 1948 年摄于香港

本世纪 20 年代中到 40 年代末，在中国南京、上海和香港的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有一位行踪诡秘神通广大的人物穿梭于军政要人、商场大贾、社会贤达、江湖义士、汉奸傀儡、特工密探之间，出没在红道、白道，乃至黑道之上，做出了许许多多或令人惊心动魄，或让人扼腕叹息，或叫人拍案称奇的事情。在中国现代史上他可以说是一位罕见的传奇人物。

他的名字叫华克之。

华克之今年高龄 92 岁，仍然很健康。他现在在北京中央机关一套舒适的住宅里，和老伴一起颐养天年。

从校园领袖到政界新星

华克之原名华毓，1902 年出生于江苏宝应县五里埠村一个衰落了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优秀。小学毕业考试成绩全校第一。在江苏省立一中毕业时又以全校成绩第一被免试保送进入金陵大学学习。

虽然读书成绩一直优异，但华克之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父亲华小东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推崇很早就对他产生了积极影响。进入省立一中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使他更加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课余时间，他努力阅读了孙中山的一系列著作，并逐渐树立了对三民主义学说的信仰。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视野开阔、能写会说，组织活动能力强，很快就在一中的校园里崭露头角。进一中的第二年，不满 18 岁的华克之便当选为这

六十年前谋杀蒋介石案的策划者

华克之

●尹 骐

所颇有点名气的学校学生会主席，并在周围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热心支持者，成了校园内的一位少年领袖人物。不久，他就加入了当时仍处于低谷的中国国民党。

在一中读书的后期，华克之的活动范围已不限于校内，经常要以学联代表身份参加一些校外社会活动，特别是南京市学联组织的若干重要活动。在这类活动中，他结识了东南大学学联代表、已是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的宛希俨同志。华克之十分钦佩宛希俨的成熟老练，宛希俨则很欣赏华克之的热诚和才华。共产党员宛希俨对这位年轻的国民党员以真诚的关怀，借给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样的理论巨著，使华克之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获得了极大的教益，而且在精神上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好的沟通。

1924 年春天，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金陵大学念书的华克之以工作人员身份随江苏省的代表们到了广州。孙中山在大会上重新阐述了三民主义，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在组织上让许多著名共产党员如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参加了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使国民党成为革命民主联盟性质的政党。华克之对此表示了衷心的拥护。

从广州回南京不久，南京地方的国民党组织便跟着进行改组，建立了以国民党左派和部分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新的市党部。华克之被选为国民党南京市南区的党部委员。不久，他又被选为金陵大学的学联理事，

参与整个南京市学联的活动。从此，华克之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并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

1925年5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在南京引起了强烈反应。南京各界人士迅速成立了“五卅惨案”的后援机构，发动全市人民开展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抵制日货、捐钱捐物，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华克之参与了整个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

经过声援“五卅惨案”斗争的洗礼，华克之迅速成熟起来。不久，23岁的他就被选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并担任青年部长。成了南京政界的一位引人注目的新星。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国民党左派三名，共产党员（跨党）有4名。这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国民党员华克之和共产党员宛希俨、侯绍裘、肖楚女等在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凭一腔正气，坚决拒绝 同蒋介石合作

虽然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内的“国共合作”堪称范例，但整个国共合作的形势却越来越充满着危机。国民党内的右派人物从一开始就心存异念，孙中山不幸逝世后他们更是蠢蠢欲动，不断制造分裂事端。特别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后，各地右派势力的活动便日渐猖獗。南京的右派人物也是如此。敏感的华克之似乎早就嗅出国共合作的危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出台后，他便预感到正在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将是国民革命运动潜在的危险人物。他曾私下对朋友们说过自己的忧虑：“别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大家却在为一个人忙。一旦胜利在握，别说共产党没有活路，恐怕连我们这些正牌国民党员也要成为总司令指挥刀下冤魂的。君不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火并。”

事实果然被华克之不幸而言中。1927年春天，当蒋介石率北伐军向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基地上海、南京推进时，沿途就已发生了一些打击革命工农运动以讨好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事情。蒋介石到上海后又亲自召开清党反共会议，并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紧接着就导演了著名的“四·一二”大屠杀事件。

南京是3月24日被北伐军占领的。原先处于秘密状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立即公开活动，实际上起了临时政权作用，为恢复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正当南京人民为庆祝“光复”欢欣鼓舞之际，蒋介石指挥下

的反革命势力便向南京的革命力量下手了。4月9日，反革命势力捣毁了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随后，就将著名的共产党人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人秘密逮捕杀害。南京也象上海、广州等地一样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年轻的华克之并未被反革命白色恐怖所吓倒。就在4月12日晚，他秘密联络了一些忠实的同志商讨反对蒋介石的对策。决定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青年部长华晓的名义贴出海报，通知全市国民党员于4月14日上午集会，以抗议蒋的血腥暴行。

华克之的公开挑战行动，引起了蒋介石在南京帮凶们的一片惊慌。他们准备出动人马紧急搜捕华克之这个“叛逆”分子。蒋介石却听听了陈果夫的“当务之急是清除共党，对本党的一些糊涂分子则宜采用疏导方法尽量争取”的建议，亲自写信派人邀请华克之面谈。但华却公然拒绝了蒋总司令的这番“好意”，弄得蒋介石既愤怒又难堪。

4月14日上午，南京有六千名国民党员和左派人士赶到城南女师大操场集会。华克之在会上揭露和声讨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清党反共，分裂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会上还通过了《要求中央制止分裂继续北伐》等决议案。会后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胡萝卜不吃，紧接着便是大棒。拒绝同蒋介石合作的华克之4月14日当晚就被捕入狱了。幸而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在广大党员的强烈呼吁下，对这位年青有为的国民党员愿意援之以手，同时对蒋介石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经吴稚晖、蔡元培等说项，华克之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华克之的威武不屈品格和组织活动的才能，赢得了许多人的钦佩。在他的周围已经逐渐聚集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和真诚的同情者。他也以自己的赤诚结交了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其中既有反蒋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有中共地下党员，还有王亚樵这样浪迹江湖声称与蒋介石不共戴天的人物，甚至和当时蒋介石的亲信鄧悌也私交甚好。华克之离开金陵大学后一时没有去处，当时担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训部主任的鄧悌便让他在政训部挂一个空职，既可领一份干薪维持生活，又可以得到某种庇护，免遭不测。然而只要华克之不放弃反蒋的态度，CC派就不会容忍他逍遥自在。不久，CC又一次秘密逮捕了华克之。鄧悌为了营救这位青年朋友，不惜同CC闹翻，用自己的权力暗中将华克之从狱中救出。华克之为了不使朋友受牵连，主动要求离开鄧悌的政训部。鄧悌又将他介绍到总政治

部副主任陈铭枢的手下去挂一个“中尉录事”虚职。

但是，华克之坚持新三民主义和反蒋的立场始终不变。一次，他受委派去下面办一件案子，竟把几个被CC指控为共党嫌疑犯的人全部释放，引起了CC的强烈不满。另一次，他利用回家乡宝应探望的机会，竟说服有开明倾向的县长改革县政，推行保护农民的“二五减租”政策，引起了当地豪绅的坚决反对和上告。CC乘机再次将他逮捕。还是由鄞悌设法将他救出，并由此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一场公开对抗：CC派以江苏省党部名义在报纸上公开通辑“在逃共匪华晚”，鄞悌则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别党部的名义在报上公开“为本党忠实同志华晚辩护”。鄞悌如此积极庇护华克之，使华深感不安。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作石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便将一切与他不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全部清除掉。在这种形势下，华克之再靠鄞悌等人的友情庇护已经不可能了。有人建议他，只要在报上发表一个反共声明，便可获得蒋介石谅解，CC也就奈何他不得了。华克之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虽不是共产党，但他坚信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正确。他自己过去和共产党人宛希俨等合作共事就很融洽。他表示绝对不发表背信弃义的“反共声明”。为了不再给鄞悌等国民党内朋友添麻烦，遭连累，他决定离开南京到上海去隐居起来。

隐身江湖，谋求反蒋救国之路

上海法租界新新南里235号的小楼上聚居着几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们都很年轻。年长的华克之27岁，以下依次是张维、陈惘子、孙凤海。他们彼此都不称名道姓，而以长幼为序互称哥弟，仿佛是同胞手足或是义结金兰。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超越了一般的手足之情，更远胜于普通的结拜兄弟，而是一种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他们都没有固定职业，或者说他们都是职业革命者，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并以此自律的。他们隐居在这幢小楼上的全部的和唯一话题，就是商讨如何反对蒋介石的新军阀统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华克之是他们中的首领人物。张维是华的同乡又是金陵大学同学，是华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陈惘子也是华的同乡、小学同学，原是安徽大学学生，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后来来到上海。他已加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虽还不是中共党员，却已相信马列主义。孙凤海是徐州人，也算华的大同乡。他出身贫苦，读书不多。在旧军队中呆过几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为人性情刚直，疾恶如仇，颇有江湖豪侠之

气。自结识华克之后，决心追随这位大哥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

在无数次的商量研讨中，华克之坚信蒋介石是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只有对他进行最直接的毁灭性的打击，才是推进国民革命的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一反蒋的目标。张维、孙凤海最坚决地支持华的主张，并愿为此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有陈惘子稍有异议，但对他们的一片赤诚和凛然正气也极为敬佩。华克之已知陈惘子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为了不使他为难，后来在具体制定打击蒋介石的计划，特别是到了实施刺蒋行动方案时，便坚决不再让陈惘子参与。陈惘子在几度向华克之转达了中共组织对他们的善意劝导后，便也不再硬性劝阻，只能向他们表示良好祝愿，盼他们善自珍重。

除张维、陈惘子、孙凤海这三位铁杆哥们儿外，华克之还结识和联络了另几位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坚定的反蒋人物，都具有重义轻利的一诺千金的豪侠之气。其中有和众多上层人物交往颇深的名士任庵，有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老国民党员李怀诚等。那位始终不肯与蒋介石合作被人称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华克之。任庵、李怀诚以及王亚樵这几位都比华年岁大，阅历深，交游广，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了华克之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决心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的计划从酝酿到实施，实际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华克之和他的伙伴们都不是鲁莽轻率之辈，深知要除掉蒋介石，无论用何种方法都绝非易事。必须要有长期和周密的准备工作。在酝酿过程中，有人提议：蒋介石政权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宋子文是蒋和帝国主义勾结的主要经办者。如果把宋干掉也是对蒋的一个沉重打击。借此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实际能力，达到演练的目的。这个提议被专家速研究决定了下来，并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牛刀小试”的刺杀宋子文的计划。华克之被推举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一天，他们经过侦查获悉宋子文将从南京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和宋公馆接站汽车的车型和车号，由华克之率6人行动小组预先埋伏在火车站内。宋子文刚一下车，行动小组成员立即向宋开枪射击。可惜烟幕弹施放早了一点，使目标变得模糊，结果，宋子文只是屁股上挨了一枪，受伤未死。和他衣着长相酷似的秘书唐某却中弹成了他的替死鬼。此次行动虽然失败，但行动小组却全部安全撤离了现场，也算达到了预演的目的。

1933年秋冬之际，19路军在李济深，陈铭枢、蒋

光鼎、蔡廷锴等人策划下决定在福建举起反蒋大旗，并暗中与中共红军签订协议，最后在福州宣布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华克之、李怀诚、王亚樵都曾前往福州参与其事。华克之通过王亚樵介绍和李济深多次接触，向李积极献计献策，希望福建人民政府能够联合中共和其他进步力量把反蒋斗争不断推向前进并取得胜利。对华克之来说，只要能把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推倒，他的奋斗目标也就实现了。也许再也不必用刺杀方法去解决蒋的问题。然而不久，华克之的希望便落空了。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 19 路军很快就被蒋介石分化之后各个击破。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不足百日便宣告失败。李、陈、蒋、蔡诸公只得逃往香港避难。华克之也不得不经香港重返沪上。

事出意外，刺杀蒋介石计划以失败告终

福建事变失败给华克之和他的同伴们一个新的教训。看来用别的方法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把蒋介石除掉已不大可能。唯一可取的仍是他们思谋和酝酿已久的直接刺杀的办法。他们这一群小资产阶级热血青年从中国古代的许多志士仁人和英雄侠客们的身上继承了那种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信念，早已抱定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决心。现在他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立即把刺蒋的决心变为实际的行动，并相应制定一整套的具体实施计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经过周密商讨，他们首先从组织上做好准备，建立行动小组，并决定把参与行动的人员减少到最少限度。以避免不必要的株连和过多的牺牲。为了不使他们的行动被人误解，华克之把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陈惺子完全排除在外。只留下他和张维、孙凤海以及稍后加入的贺少茹共四人组成行动小组负责全部计划的实施。对外完全保密。这既是行动本身的需要，也是为了不去连累更多的朋友。其次，他们决定把行动基地建立在南京这个有更多机会能够见到蒋介石抛头露面的地方。同时决定在南京开办一家新闻通讯机构。因为只有这一种被当时人们誉为“无冕之王”的职业才有机会出入于许多重要的能够见到蒋的场合。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于 1934 年年底前建立了一家名为“晨光通讯社”的合法新闻单位。他们四人统统以化名出任其主要职务：华克之化名胡云卿，以华侨富商身份任通讯社长，张维化名张玉华任总务编辑室主任，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通讯采访主任，孙凤海只改一字，化名孙凤鸣任记者。

刺蒋计划的准备工作开始一直比较顺利。到 1935

年初，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贺坡光、孙凤鸣已经具有同中央社记者大体相似的资格可以进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若干重要活动场所。行刺的武器——一支性能极好的手枪也早已准备妥当。经多次讨论，一致同意由枪法最佳的孙凤鸣负责执行。他将那支手枪磨合得灵巧自如。诸事俱备，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准确及时地捕捉蒋介石公务活动的行踪，特别是他可能在公众场合出现的信息。须知蒋自执政以来坏事做绝树敌太多做贼心虚是非常害怕别人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他的。他的住所和办公地点采取了严密保安措施，要想从这些地方去实施刺杀计划几乎没有可能。唯一的机会有待他在特定的场合出现，利用记者职业的身份在可能接近他的最近距离内对其突然袭击，因此捕捉战机至关重要。

不久，终于传出一条重要消息。内外交困的国民党中央将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按惯例，蒋介石作为第一号人物是一定要亲临会议的。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开幕式之后必定有全体与会者的合影留念这一传统程序，限于条件，合影还只能在开会的礼堂门前的开阔空地上进行。这时候，新闻记者们是可以尽量涌上前去争抢镜头的。这应该是刺杀蒋介石的最好良机了，据此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将是背水一战。以华克之为首的“晨光社”小团体当即决定把全部希望都押在这即将召开的会议机遇上。于是他们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只等开会时间一宣布，便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很快，国民党官方就正式宣布了将于 11 月 1 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晨光社”小团体的准备工作也同步加紧：申请采访会议的特别通行证，将主要执行者孙凤鸣的家属送往香港，安排其他重要人员的撤离地点等。孙凤鸣固然早已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其他几位起事者也都下定了一旦被捕宁死不屈的决心。在执行计划的前三天，即 10 月 28 日，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孙凤鸣四人来到南京长江边上的一家小酒馆内，这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聚会。他们都明白，三天后的一击，不但孙凤鸣绝无生还的希望，其他几位也将被通缉搜捕，生死难卜。小聚之后，除留下执行任务的孙凤鸣外，其他三人便陆续撤离南京。“晨光通讯社”实际散伙。

1935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 时，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按时在中央党部礼堂开幕。开幕式很简单，主要由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讲了一通召开本次会议的任务和意义后，不过 20 多分钟就告结束。接着便是合影留念。出席会议的中委由礼堂鱼贯而出，按预先安排好的

位置或坐或站。前排中间依次端坐的是汪精卫、张静江、张继、阎锡山、张学良等人，惟独缺了蒋介石。摄影师事先已被通知，中委们落座之后立即拍摄，不得延误时间。几分钟内合影便结束。中委们纷纷起身准备回礼堂内参加下项议程活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凤鸣从记者群中猛地闪出，从大衣口袋内掏出手枪，对准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当即应声倒地。汪的卫士连连向孙还击，孙被击倒。可惜汪精卫虽连中三弹却无一致于死命，后经抢救治疗终于又活了下来。

蒋介石之所以未参加合影留念，据事后传闻，是因为他奸诈多疑，对这种场合的安全很不放心，临时改变了主意，使他逃脱了这一次惩罚。

孙凤鸣之所以在蒋介石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临时改变计划将子弹射向汪精卫，是因为他知道“晨光社”已将所有赌注都押在此次行动上，再也没有条件继续坚持下去制定新的计划，也就是没有退路了。与其使全部计划化为泡影，貽笑后世，不如退而求其次，刺蒋不成，刺汪也算为国为民除一大害。更多的利弊得失他大概也来不及多想了。谁知刺汪也并未致命，他自己却先倒在了血泊之中。

痛定思痛，重新找到政治归宿

蒋介石虽然侥幸逃过了一劫，汪精卫被刺杀毕竟也是对国民党统治一大打击。蒋对此事件的震怒是可以想象的，他下令组织专门力量对此案进行调查侦破。此举既是为了镇压反对者，也是为了洗刷自己，因为蒋汪不和众所周知，有人怀疑刺汪是蒋幕后指使。但最后调查结果却令蒋失望。孙凤鸣被送进医院靠打强心针仅维持了十几个小时的生命，当局想从他口中查出幕后背景，他只回答了一句“我是被良心所驱使”之后就再也不说一个字了。后来当局从“晨光社”雇佣人员中获得一点突破，抓了许多所谓嫌疑犯，而真正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华克之却始终没有找到。通缉悬赏的价格从5万大洋涨到10万大洋也毫无结果。刺汪事件的全部真相到底也未能查个水落石出。各种传媒只能根据传闻做出许多推测。当局在杀害了一些外围人员后，又在1937年春进行了一次草草的公开审判，此后也就不了了之。

刺汪事件“主犯”华克之虽然逃脱了蒋介石手下的追捕与谋杀，但在精神上却受到了一次真正血与火的洗礼。刺蒋计划的最终失败，孙凤鸣的慷慨捐躯，陈桐子、崔正瑶的不幸被害，以及其他许多同情者株连入狱，使华克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痛定思痛，反对蒋

介石罪恶统治的决心从此更加坚定，但是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刺杀的道路再也不能继续走下去。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华克之终于决定改弦易辙，寻求新的反蒋救国之路。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陈桐子生前多次向他灌输过的马列学说和共产党依靠集体依靠群众闹革命的主张才使他如梦初醒，如饮甘泉般地真正接受下来。

1937年初夏，华克之终于结束了在香港的徘徊，决心北上延安“朝圣”。他相信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找到新的正确的政治归宿。他的决心和愿望得到了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帮助。行前，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又委托他带去一封致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信件，表达了他们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对抗日救国的意见。

华克之到达延安后受到了热情接待。毛泽东在百忙中约见了他与之长谈。华克之向毛介绍了自己的全部经历和刺蒋未成的惨痛教训，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延安参加革命行列。毛泽东对华所说的一切表示充分理解，同时表示欢迎他参加革命。但又坦诚说明现在让他留在延安的不妥，因为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并未撤销，倘若国民党向延安要人就会陷入被动。毛建议他仍回香港去，并说那里目前正是他可以“用武之地”，以后还会派人和他联络的。最后，毛让华再作一次“信使”，把他给李济深先生等的一封信带去香港面交。很快，华克之便离开延安经北平、武汉、广州重返香港。

和毛泽东的一席长谈使华克之对抗战的形势和前途以及中共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完全纳入中共领导的革命轨道。他在延安时曾当面向毛发出誓言：今后凡中共有所差遣他无不竭尽全力去完成任务。回到香港后，华克之一面参加民主人士的一些活动，一面等待着中共的召唤，派人和他联系。1939年夏天，中共华南地方党的负责人连贯果然找到华克之，并将他带去见了廖承志、潘汉年。廖、潘开诚布公地对他说，准备召他加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并征询他的意见。他又一次表示：只要是党的需要，他将无条件服从。他当然知道在敌后做秘密工作很危险。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的仇视和那一道始终没有解除的通缉令更增加了危险的程度。但华克之早已抱定了为抗日救国万死不辞的决心。想到孙凤鸣、陈桐子等至爱亲朋的英勇牺牲，他还有什么危险工作任务不能去承担呢？！

在接受廖承志、潘汉年代表党向他下达新的工作任务时，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廖、潘表示，只要他在实际斗争中经受一定锻炼和考验，他们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华克之果然不负期望，廖、潘二人当然也并未食言。这个在旧社会闯荡了半生、既有过轰轰烈烈壮举又曾经被碰得头破血流的传奇人物，终于在在不惑之年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

忠心赤胆，在隐蔽战线上屡建功勋

潘汉年是中共在隐蔽战线上一位资格很老的干部。三十年代初就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有过出色业绩。他原是左翼作家出身，才华过人，能言善辩，智勇兼备，被公认为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才子型的领导干部。1939年夏天，他奉命从延安来到香港，以中情报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分局负责人的身份指导香港、上海等地的敌后情报工作。他在香港、上海等地先后建立了若干情报工作据点，分别组成了几套精干的班子。并深入敌伪内部，搜集延安总部所需要的各类情报，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华克之被调入隐蔽战线后，潘汉年根据他熟悉上海、香港等地社会情况，和各阶层人士有广泛交往，生活阅历丰富，办事精明干练，为人正直豪爽等特点，决定把他作为一位得力助手，根据工作需要随时派他去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华克之也几乎是每次都能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任务。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时间，除潘汉年中间去新四军根据地和回延安间断过大约三年时间外，其余时间他们二人都一直在香港、上海这两个地位特殊的地方从事地下斗争，共同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辉煌业绩。

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工作重点搜集战略情报，为延安中枢机关提供决策依据。这类情报的获得当然难度很大。其主要渠道是必须依靠能够接近和深入到敌伪上层内部去的人用心搜寻，这就不是靠临时抽调一般的地下党员可以胜任的，必须寻求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政治面目较带灰色同时又具爱国心和正义感并且和敌伪上层人物有着历史渊源的人士担此重任。动员这样的人出山，当然不能由共产党发号施令，而必须由和他们关系较深，为他们所信任的人从中引介举荐。华克之浪迹江湖多年，在上海、南京等地恰恰就曾结交过不少这样的知名人士。潘汉年让华克之物色其中最最有把握的几位，并把他们介绍给自己。这些人基于对华克之的高度信任，又经潘汉年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动以爱国主义真情，结果都为中共的情报工作做



华克之近影

出了宝贵贡献。

任庵先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社会贤达。他和华克之结识多年，可谓生死之交。华克之动员他出山后，根据潘汉年的安排。他曾冒极大风险秘密前往重庆会见戴笠，为潘汉年领导下的情报干部袁殊和军统之间进行了某种沟通，以防止袁殊在打入日本情报机关和公开担任“汉奸”要职后遭军统的暗害。任庵先生后来又根据潘汉年、华克之的部署，利用旧关系接近大汉奸周佛海的家庭，并从周家探听到了许多重庆方面和日伪之间暗中往来和相互勾结的情况。例如临抗战胜利前，重庆方面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曾通过周佛海收编改编近20万伪军，让这些汉奸部队换上“国军”旗号，以便就近抢占日军交出的地盘，阻止新四军参与接收，并为后来发动内战扩充兵源。为了拉拢周佛海，重庆竟秘密任命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这项任命的绝密情报被任庵、华克之获得后立即由中共情报系统电告延安，延安决定公开予以揭露，结果弄得重庆方面狼狈不堪。

华克之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和开拓型的干部。在敌后独挡一面工作也最需要这样的性格。他有时看准机会便主动向上级领导建议干一些于党十分有利的事

情。例如1945年秋，日本宣布投降，这时潘汉年已返回延安，华克之经请示临时领导他的张唯一后，大胆地通过一位和日军某军火库负责人冈田颇有交往的上海开明人士进行巧妙的蛊惑，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位国民党某战区的中将官员，以接收的名义将冈山所管的一部分军火秘密运往新四军根据地，计有五卡车TNT炸药和全新的机关枪近200挺。华克之此举曾受中央有关部门嘉奖。新四军军部在致华克之的电报中说，那批炸药可供他们部队用两三年的，实在功不可没。

1946年秋，内战全面爆发后，华克之随潘汉年撤离上海再赴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华克之又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任务。其中有一些是极为艰难和危险的。例如1948年初，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总部急需寻求一批尚待解放地区的军用地图，中央电令华南分局设法从蒋管区秘密寻找。据悉日本当年为侵华战争需要曾绘制了一大批25分之一的中国各地军用地图，日本投降后这批地图被国民党接收保存下来。潘汉年将此任务交给华克之，要他秘密前往上海、南京调查并设法弄到这批地图。华克之当然知道这批军用地图对于指挥解放战争是何等重要，但要从国民党手中搞到这批绝密地图又谈何容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潜入上海后经多方探听，得知日本人留下的这批地图当时被保存在南京国防部二厅某科内。然后他又潜入南京通过一个旧关系，几经曲折，终于从敌人的心脏部位弄到了这批地图的一部分。又通过某国驻华外交机构利用外交邮件的免检特权将这批地图运到香港再转运解放区。

历史的曲折和历史的公正

全国解放后，华克之被留在隐蔽战线上又继续干了几年，大部分时间是驻在澳门这块小殖民地，为党和国家的安全尽心尽力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国内的政治运动却也和天气一样阴晴难卜。1955年春天，正当年富力强的华克之在特殊战线上奋发有为之际，突然被召回北京，不久就被捕入狱。原因是他在隐蔽战线上的前领导人潘汉年已被打成“内奸”“反革命”。曾经由潘汉年介绍入党，又由潘单线联系，一直在潘的指挥下工作的华克之因此也就有了“内奸同伙”，共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

如前所述，华克之自青年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同蒋介石政府，后来又同日本侵略者誓不两立。他的坚决反蒋抗日态度是举世皆知的。南京清楚，延安也了解。如今一下子却成了“内奸”“反革命”同犯，真是令人不

可思议！可惜在人治高于法治，“左”风盛行的年代里，谁也不能、谁也不肯、谁也不敢去真正实事求是加以分辨和鉴别，只因为潘汉年一案乃是上面钦定。

华克之1955年被逮捕审查，一拖就是10年之久。1965年他以“参与内奸”活动罪被判11年徒刑。此时他已实际被关了11年，所以宣判后就被释放出狱。但是出了秦城监狱，并非就是获得自由，他随后又被押送到江苏徐州交群众监督改造。不久，文革风暴骤起，华克之这样既“反动”又“复杂”还“混进了党内”的人物，在文革期间所受的折磨与苦难是可想而知，真是一言难尽的。幸而他历经磨难身体却没有被搞垮。他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等到了雨过天晴之日。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平反冤假错案步伐的加快，他在1979年终于获得了平反。有关部门给他做的最后结论是：“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起草这个结论的同志还透露了“卓有贡献”三易其稿的过程：从“颇有”“很有”再到“卓有”这一字之差竟使华克之和他的家人激动了很久。

历史经过整整24年的曲折又终于恢复了公正。华克之的被平反时已是80高龄，按离休高干待遇，他得到了应有照顾。一切似乎都已成为过去。但这位经历了崎岖曲折人生道路的老人在平反之后的养老生活中，仍然又做出了几件令人钦佩不已的事。和当年的轰轰烈烈相比，这些自然都是“小事”。但其性质和意义仍是以体现这位传奇人物昔日的英雄豪杰本色。

一、他将平反后补发给他的24年的工资差额除留少量安置生活和接济当年“晨光社”的后人外，其余数万元之巨全部交还给国家。过去他曾经手过大量巨额钱财。并曾以经商手段为党筹集过大量经费。但他个人除简朴的衣食住行需要外，从未为自己私人积蓄过一分钱。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对钱财的态度。

二、他通过种种努力，在中央统战部部门和江苏省政协的支持下，在徐州铜山县黄集乡为“晨光社”义士孙凤鸣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刺蒋未遂和刺汪之举虽然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座纪念碑的终于建成总算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

三、他在自己的家里友善地接待了当年奉戴笠之命追捕自己，如今早已从善如流的原军统头目沈醉先生。“相逢一笑泯恩仇”，既体现了共产党人宽容大度胸怀，也仍然延续反映了他个人性格中的英雄豪杰气概。

（责任编辑 方实）

巾帼英雄

秋瑾

● 严风达
陶丽华

1907年3月17日，杭州西子湖畔春意盎然，那飘曳如带的白堤和苏堤上布满了绿树红花，依依垂柳，高耸的六和塔和保俶塔直刺青天，巍然挺立。远处群山迭嶂，花木葱笼；近处湖水涟漪，轻舟如梭。秋瑾和挚友徐自华兴致勃勃地游览凤凰山，凭吊南宋故宫旧地。面对大好河山，秋瑾大声说：“为了你，我美丽如画的祖国啊！”接着她又赋诗道：“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她接着又吟道：“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她俩漫步来到岳坟，秋瑾神色凝重地瞻仰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 的灵墓。

“你想死后埋在这里？”徐自华打趣地问。

“如果真能长眠于此，对我的福份就太大了。”秋瑾由衷地感叹道。

“如果你先我而死，我一定了却你的遗愿；如果我先你而死，请你也把我安葬于此地。”徐自华感伤地说。

“那就要看谁能先得到这个便宜了。”秋瑾朗然一笑。

秋瑾为筹备起义，终日奔走呼号，难得杭州一游。先贤遗迹，青山碧水，使她忽而情绪激昂，忽而涕泪泫然，忽而心气平和。有感于家国兴衰，她在断桥吟诵了反清义士张煌言的名诗：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没有想到，事过不到四个月，1907年7月15日，秋瑾就英勇就义了。当地人用几片薄板草草收殓，葬于乱坟之中。徐自华姐妹欲冒死收埋，被同志们苦苦劝阻。一直等到冬季的一个风雪之夜，徐自华、陈去病和一个西湖船夫，悄悄把秋瑾棺木移至西冷桥畔，换了一口好棺材安葬。实现了秋瑾生前的遗愿。

秋瑾，字璇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绍兴。她祖父和父亲在厦门做官时，曾将全家迁居厦门，1877年11月15日，她就诞生在那里。她自幼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在家塾里，几年功夫就读完了好多部古书和许多古诗词。11岁时，她学会了做诗。她虽然卓有才华，可是深深感受到封建家庭对她的束缚，特别是当她看到那些“洋人”耀武扬威地进出她祖父的办事机构，更激起她的民族意识。她想如果自己是男子就好了，而那时，男女太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太低贱了。她决心要用自己的“热血”唤醒千百万妇女的灵魂，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她尊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和忠心报国的穆桂英、梁红玉为“女仙”。

15岁那年，秋瑾一家回到老家绍兴。她听说外婆家有一个名叫单老四的表哥武艺高强，便让妈妈带她到外婆家，向表哥学习舞剑抡棒以及骑马驰骋等本领。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秋瑾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身体也强壮了起来。这种能文能武的奔放生活，养成了她开朗乐观的性格。

但是，后来父亲命她与湖南湘潭百万富翁王献臣的小儿子王廷钧结亲。王廷钧比秋瑾小两岁，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好逸恶劳，与“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秋瑾格格不入。秋瑾婚前就写诗骂他“为人无信更无义”，“妄自尊大欺贫弱”。但在那个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秋瑾只好“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生活在苦闷中的秋瑾，时常拍案而叹：“捶胸痛哭，愤不欲生。”

1904年，秋瑾不顾丈夫的重重阻挠，毅然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途。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秋瑾站在甲板上，思绪万千，她高声吟道：“……回怜祖国危如卵，未有英雄挽世难”。“……金瓶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秋瑾到日本以后，一不学医，二不入师范，认为这些只能解除少数人的痛苦。她很快学会了日语读、说、听、写的的能力，并广泛结识志士仁人，例如鲁迅、宋教仁、陶成章等。1904年秋天，孙中山先生派梁嘉光等在日本横滨成立了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秘密革命团体“三合会”，秋瑾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前往参加。

秋瑾也象其他入会者一样履行了入会仪式。

烟雾缭绕，杀气腾腾的屋里，一柄雪亮的钢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你来做什么？”

“我来当兵吃粮。”

“反清复明，你忠不忠？”

“忠心耿耿！”

“如果不忠怎么办？”

“上山逢老虎咬，出外遇强盗。”

回答完了，秋瑾与入会者从写有“反清复明”的白色横幅下钻越，然后再从一堆烈火上一跃而过，同时高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入会者割破手指，把鲜血滴在盛有鸡冠血的酒碗里，歃血盟誓。

1905年春天，秋瑾为了筹措留学经费和探望母亲，返回了祖国。在国内，胆识过人的革命猛将徐锡麟与秋瑾初识。那天，秋瑾身着长衫，脚登皮鞋，一身潇洒的男式打扮。徐锡麟赞誉说：“蕤卿有英雄之气，神圣之道德，麟实钦佩之至，毕生所崇拜者也。”不久，她



秋瑾遗影

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秋瑾重返日本，考入“青山女子实践学校”学习。这年8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组建同盟会。经黄兴介绍，秋瑾与孙中山见面。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为折服，并立即加入同盟会。她举起右手肃立在桌边，庄严宣誓：“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率，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入会后被同志们推举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这年11月，清政府为了阻止留日学生策动反清革命，勾结日本政府炮制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妄想以此来控制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和限制人身自由，八千中国学生以罢课来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动法令。日本的一些报纸趁机诬蔑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富有民族气节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方的政治迫害于12月8日在大森海湾愤然跳海自杀。陈天华的殉国，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反抗怒涛。秋瑾还领留学生组成敢死队，与日本当局和中国驻日公使汪大燮展开了坚决斗争，迫使日本政府取消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

秋瑾和陈天华一样，主张全体留学生罢课回国，以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有一次秋瑾演讲时，说到激昂之处随手拔出靴筒中的倭刀插在桌上，怒喊：“谁回到中国

投靠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回国后，创办了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积极培养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秋瑾戎装佩剑，带领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秋瑾并非天足，她却凭借这双缠过足的小脚经常日行五六十里，以与革命党取得联系。在秋瑾等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全部成了光复会会员，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也迅速发展到了六七千人。

1906年年底，徐锡麟由安徽来到上海，找秋瑾研究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一个寒夜，一场大雪刚停，天地一片白茫茫。上海一幢旧楼上，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会议在热烈地讨论斗争大计。最后一致决定在安徽和浙江两省同时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安徽方面的工作由徐锡麟负责，秋瑾则负责浙江方面的筹备任务。

1907年夏初，秋瑾把全部革命力量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的顺序分别编为八个军，总称为八个军，并称为“光复军”，徐锡麟任首领，秋瑾任协领。计划在1907年7月19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同时起义。计划确定后，大家十分兴奋。秋瑾更是激动，当即取出“倭刀”挥舞起来，高兴地说：“宝刀！宝刀！用你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

可是，功到垂成，风云突变，徐锡麟因为组织内部出了叛徒，便决定单独于7月6日提前起义。他虽然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仓促从事，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徐锡麟悲壮地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徐锡麟的弟弟徐伟是个软骨头，他招供了秋瑾的革命活动情况。7月10日，清政府从杭州派出三百多兵勇，开往绍兴逮捕秋瑾。

7月10日，秋瑾得知安庆起义失败，挚友徐锡麟惨死在清王朝刽子手的屠刀下，而且被用牛角刀割膛取心，祭奠于恩铭灵前，恩铭妻妾仍不解恨，唆使卫队取心烹食。秋瑾万分悲恸，终日不食不语。她强忍巨大悲痛给女友徐双韵写了绝笔对联：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这时，秋瑾处于万分危急状态。7月13日，赫赫有名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乔装老叟，通知秋瑾远走他乡，保存实力。秋瑾慷慨答道：“男子死于光复者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共勉之。”王金发泣别秋瑾，带走了革命组织名册，并赠秋瑾一把德国造的六响手枪。

当天下午4时，清军就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早已

抱定决心学谭嗣同誓死不逃，而让学生和办事人员逃生。待清军逼近时，秋瑾开枪拒捕，弹尽被捉。秋瑾被反绑双手，前面有士兵开路，后面有士兵押送。秋瑾大义凛然，从容行进，村民和儿童站在田头目送着她背影的消失。

当晚六点，绍兴知府贵福马上升堂审讯，大堂上刑具具备，杀气腾腾。贵福责令跪下，秋瑾厉声回答：“革命党人没有这个习惯。”

“你知罪吗？”贵福叱问。秋瑾冷蔑地一笑，举头望天。

“交代你的同党！”

秋瑾对组织机密一律答以“不知道。”

贵福无计可施，下令用刑，跪火链、火砖……但这一切都不能使秋瑾屈服。

当敌人逼着她写供词时，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敌人没有办法，于是伪造供词，捏造罪证，强捺指印，草草定案。

7月15日凌晨，数十名清兵荷枪实弹从狱中提出了秋瑾。秋瑾身穿白布衫、黑纱裤，从容镇定地走向囚车。行至轩亭口，秋瑾向监斩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准许她写信诀别亲友；第二、临刑时不脱衣带；第三、死后不枭首示众。监斩官李钟岳答应了后两条要求。

秋瑾整理了一下长衫衣带，昂首踱步，走向了轩亭口。“抑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年仅31岁的秋瑾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在场绍兴民众无不掩面流泪。

秋瑾的遗体被徐自华等姐妹安葬后，又经过了几十年的沧桑坎坷。

1908年春天，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胡菊龄、陈去病等人组织了“秋社”。在周年祭的时候，由陈去病念了悼词，徐自华起草了墓表文章，吴芝瑛录写，胡菊龄刻字。清政府得知“秋社”活动，十分恐慌，下令秋瑾兄长秋誉章将秋坟迁至其公婆所属墓地，公婆以秋瑾是朝廷“犯妇”为由，不准迁入。秋誉章只得盖了一所茅亭停放棺木。

辛亥革命成功后，徐自华将秋瑾灵柩迁还杭州西冷桥畔。

1912年孙中山先生途经杭州，亲临秋瑾墓地，题写了匾额：巾帼英雄

还题写了对联：

江户矢丹忱 重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 愧我公招侠女魂

1930年，由社会名流王子余等人主持，在秋瑾殉难的轩亭口竖立了秋瑾烈士纪念碑，在绍兴卧龙山修建了风雨亭。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题词：

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儿女争光。

然而，没有想到，在十年浩劫中，连秋瑾这样的伟大革命家，争取女权运动的伟大先驱者也没有幸免。1966年底，一带所谓“红卫兵”，手持铁铲来到秋瑾墓之前，可怜秋瑾女士牺牲后半辈子都不得安宁，秋瑾墓被掘地三尺，移葬至杭州郊外的鸡笼山。

“四人帮”一伙垮台后，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关心下，重新寻找秋瑾遗骨。这时，已时过15年，那帮“红卫兵”已不知去向，只有当年被逼掘坑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还依稀记得大体方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乱荒山中找到了秋瑾女士的遗骨。她死后穿着一双红鞋。

1981年，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部门在西冷桥畔重建秋瑾墓。上面嵌大理石，上刻孙中山先生当年为秋瑾所题“巾帼英雄”一词。

汉白玉雕成的秋瑾立像倚山面湖，松柏环列，浩然正气，一如她的生前。



秋瑾灵柩1908年停厝于西湖（1908年摄，左一秋誉章，左二廉泉）

本社启事

由于本刊自1994年交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后，发行量急骤增加，补购过期刊物的读者要求强烈。现本刊总第2期、第3期、第9期和1994年第1期已脱销。存有以上各期并愿意转让的读者，请速与本社联系。

本刊1993年合订本已经售完，读者不要在汇款了。

炎黄春秋杂志社

能言善辩的

乔冠华

● 吴妙发

乔冠华是我们国家有名的大秀才。尽管他已逝去多年，可是他生前发表的许多演讲和撰写的文字依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显示出极其雄辩的逻辑力量。他的文字，主要是国际问题上的文字使对手颤栗，无地自容，而使朋友欢欣，得到鼓舞。记得英国一位大哲人说过，真正的文字并不因人的躯壳不复存在而黯然失色，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会得到锤炼和锻造，使其像利剑一样愈加锋利而永存于历史的宝库。

乔冠华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一生撰写了为数不少有关国际问题的声明和评论，其中1970年的“五·二〇”声明就是最为有名的一篇。当时毛主席根据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到处横行霸道，竟欲称霸全球的罪恶企图，提出中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员，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态，于是萌发了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的念头。这个高瞻远瞩的想法得到周总理的完全赞同。为撰写这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发表的重要文稿，周总理亲自布置，找了几位秀才写了一稿又一稿，最后一稿呈送毛主席。毛主席阅后觉得不满意，请周总理组织人员再行撰写。周总理这时找了乔冠华，详细讲述了毛主席的意图，要求他尽快写出。乔冠华受命后回到他所住的外交部宿舍报房胡同，同其夫人龚澎商量后，关起门来，边斟茅台边构思。乔冠华领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图比较深刻，对美国本性和手法了解透彻，加之他文字功底深厚，一句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能载入史册的话语从他脑海里倾泻而出，于是他请秘书逐句逐句地记录下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篇拟就的初稿就放置在他的案头。于是，他字斟句酌，从行文、结构、气势以及是否朗朗上口等各个方面进行周密的思考和过细的修改。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篇以毛主席名义向全世界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语言必须是最好的，逻辑应当是最严密的，气势也要是最恢宏的。又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从案桌起身，把改好的稿子装进公文包，坐车直奔周总理办公

室。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时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同乔冠华一边朗读一边修改，最后表示可以送主席了，乔冠华才欠起疲惫的身子，向周总理告辞回到住所。过了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周总理和乔冠华，毛主席一见面就表示稿子可以了，并说修改了几处，请你们看一下。毛主席的几句话，使乔冠华放下心来。不久，周总理还亲自电告乔冠华说，毛主席对他的稿子表示满意，认为文稿写得有气势，有文采，比前几稿增色许多。

1970年5月20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前、长安街两侧的街道上站满了百万群众，毛泽东主席以他大革命家和大诗人的气质，宣读了乔冠华起草并经他亲自审阅定稿的《打到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〇”声明。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第二天，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塔斯社、安莎社等播发了消息，世界上许多大报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评论这篇声明“文字犀利，气势磅礴，逻辑严密”。

乔冠华这方面的才华在其青年时代已崭露头角，而且显得才气逼人。1939年，仅仅26岁的他已经写出了很具说服力、气势不凡的国际杂文。在《英苏谈判与德意同盟》一文中，乔冠华以犀利的文笔指出，“去年十月以来，欧洲的和平与秩序，建筑在一个虚幻的稜堡上，……慕尼黑协定和英意协定。在这个稜堡下面，呻吟着一千五百万的捷克人，两千四百万的西班牙人，更下面则有六百七十万的奥国人。”要知道，当时希特勒施展挑拨离间，张伯伦一厢情愿地大和平烟幕使欧洲大陆丧失斗志，陷入和平的梦幻之中。乔冠华的这篇杂文一针见血地道破慕尼黑协定的虚伪性，指出它是一个“虚幻的稜堡”，对广大人民来说不啻是一贴清醒剂。

乔冠华，惯用历史的比喻加强其文章的逻辑力量。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西班牙九九六天的斗争，充分地证明了一个民主的国家的确实可以保卫自

己。”但最后是“英法绞死了共和西班牙”，他警告英法不要高兴得太早，说“在这一个意义上，法西斯并没有打进了马德里，而是打进了伦敦和巴黎。”这对英法当时领导人的绥靖思想是多么深刻的剖析。乔冠华最后以这样一段激励人心的文字结束其文章：“约莫一九〇〇年以前，当纳撒热人耶稣绑赴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有些妇人为他哭泣的时候，他曾骄傲的对她们说过：‘耶路撒冷的妇人，你们不要哭我，请哭你们自己吧！’今天，我们可以同样说：不要为马德里哭泣，请把你们的眼泪，洒向巴黎和伦敦去吧！马德里是永生的，它活在现在与未来为民主而斗争的一代的伟大的心中。”

乔冠华的文章，不光分析深刻，见解独到，而且充满了文采。在《英苏谈判与德意同盟》文中谈到意大利出兵阿尔巴尼亚，逼迫产后仅三日的阿尔巴尼亚皇后仓皇出走的侵略行为，与英国军舰见此反把其军舰散布在东西地中海两头不于动作的做法讽喻为“烛影摇红，千秋疑案”。可谓气贯长虹，充满浩然之气。1939年10月，乔冠华撰写的《中立国决定欧战的命运》一文中把苏联与美国比作为“今天这个世界当中耸立着的两座历史的斯芬克斯”，说它们“一座是在华盛顿，一座是在莫斯科”，然后非常形象地说，“随着历史波涛的倾泻，这两座斯芬克斯迟早先后说出话来，那声音是决定的。”他把二战中两个没有及时明确表态的苏联与美国比喻为“斯芬克斯”，既形象又贴切，使人们充满对这两个大国态度的神秘感和迷惑不解，接着笔锋一转说“历史波涛的倾泻”，把历史比作人们脑海中的大洋，其进程喻为汹涌的波涛，使本来难以懂得透彻的国际杂文顿时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1940年，乔冠华一篇题为《西线终于爆发战事》更是气势磅礴，其文笔又如千军万马一发而不可收。他列举了许多战事后说：“山雨欲来，地中海大有西风即起之势”，使人们预感到同盟国已发起了对轴心国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之后，乔冠华在《欧洲战争已发展到世界战争的前夜》（1940年10月）、《法国的崩溃》（1940年9月）两文中用了颇具文采的描写，如“马斯诺的偶像崇拜”，法国“波尔多的政府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英吉利海峡流的是大西洋的水”，“大西洋的彼岸耸立着资本主义世界最坚强的堡垒——美利坚”，最后乔冠华在纵观二战全局后断言：“万木无声待雨来”，意指同盟军已不声不响地作好一切反攻准备，决战的日子即将到来。这是大手笔，而且给人永志难忘的印象。

时光又过去了多年。乔冠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总

理的教诲下，经过历史老人的磨炼，其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光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他为“才思敏捷，口才雄辩，知识广阔，难以打交道的外交家”。日本一位外相曾称赞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培养出来的不可多得的外交才子”。据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他出任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主要有以下考虑：知识渊博、掌握多国语言，演讲口才杰出，在当时条件下，此职非他莫属。而他肩负重任出席多届联大大会期间，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托。

我作为出席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有幸目睹了乔冠华其动人风采的一面。虽然时光老人已把二十多年的岁月远远地留在了后面，可那经历的一幕幕，所目睹的一景景，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以致无法从我记忆中抹去。

在出席第26届联大奔赴巴黎途中，乔冠华对突然从空中飘落而来的西方记者的提问的答复，据我当时的记录，显得是那样的从容不迫，潇洒自如；那样的充满自信，妙趣横生；那样的以理服人，幽默诙谐：

乔：各位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吧？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飘飘欲仙，在天上飘来飘去可真自由自在啊！

记者们大笑。

记者：乔先生，你作为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团长，对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突然？

乔：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一句成语来说，这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像鸵鸟一样，把身子往沙滩里一钻，以为就自得其乐呢！其实呢？它往沙滩里越钻得深，就愈显得它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

记者：你指的是谁？

乔：各位都是聪明人，还要我明言吗？

记者们（大笑）：我们明白了。

记者：你觉得这次联大决议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乔：还有一句老话，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希望对方也采取现实主义政策，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敌视中国乃至忽视中国的存在是没有用的，难道这样一来，中国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吗？我很爱好地图，有空时，经常拿出来看看，从来还没有见过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讲不承认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国家便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荒唐的事情。你们是记者，通晓事理。没有这个道

理，是不是？

记者们笑并点头。

乔：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大原则，同意这个原则，其它事情就好办了。这叫作共同语言。

记者：中国代表团将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

乔：我们首先要感谢广大亚非拉国家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多年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感谢坦桑尼亚等许多提案国为此作出的艰苦工作。对联合国的许多事务，由于多年的阻挠，讲老实话，我们很不熟悉。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尽快熟悉联合国有关事务作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应有的贡献。

在整个答复过程中，乔冠华始终不卑不亢，谈笑风声，还不时地插上一两句英语，对中国成语作些幽默诙谐的解释，使这些难以打交道的西方“无冕之王”不时地发出笑声，甚至还在答复结束后响起阵阵的掌声。一两个钟点就在这种欢快、自然而又服人的气氛中过去了。到了巴黎后，记者们向乔道谢告别，很快又飘回到他们各自的通讯社去写第一手的报道。

乔冠华来到纽约后不久就对联合国中国籍职员作了一次肝胆相照，使人为之动容的演讲。联合国秘书处有不少中国籍职员，他们有的从事笔译，有的专攻口译，有的张罗各种文件汉字打印工作。他们当中有早年来到美国谋生的先辈的儿女，辗转美国各地最后来到纽约，凭一技之长通过各种苛刻考试，进到联合国得到一份工作。有的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来到美国求学的留学生，还有不少人是来自台湾的蒋方军政人员，特别是蒋方所谓“外交界”的亲属，如台湾前“外交部长”沈昌焕的胞弟、驻南美一些国家的“大使”、“参赞”的夫人等。对新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怀着欢欣、疑虑等各种复杂的感情。但有一种感情是共同的：会不会被取而代之，丢掉工作？乔冠华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工作。

我记得那次会议在联合国图书馆的电影放映厅内举行。乔冠华在黄华陪同下来到会场，他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眼架秀克朗眼镜，1.8米以上的修长身子登上了以深红色天鹅作背景的讲台。他坐在用白桌布蒙着的讲台后，用亲切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大意先说，中国代表团到纽约已经好几天了，主要是头绪太多，没有更快地同大家见面，实在对不起，请大家多多原谅。讲完这番话，会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因为他们看到的共产党的大官没有任何架子，讲的是几句贴心

的诚恳话。乔冠华接着说，大家都是同胞，都是中国人，同胞见面，中国人见面就要讲心里话，特别是在这远离祖国的纽约见面，更要讲发自内心的话。我是共产党，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有妻子有儿女，不是什么青面獠牙。你们看我既不是青面，又没有獠牙，是不是？既然是同胞，是亲人，就不要相信这些不实的宣传。这时人群里鼓起了掌声，发出了笑声。气氛不光活跃，而且亲切了。他接着说，代表团听说大家有了顾虑，怕我们来后彻底更换人员，使大家没有饭吃。我现在郑重宣布：一个不换，大家都有饭吃。乔冠华讲完这几句话后，热烈的掌声响彻电影放映厅。乔冠华最后还坦诚相告，代表团成员对联合国业务不了解，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帮助代表团尽快开始工作。会议开得不长，将近40分钟的讲话使大家一下子缩短了距离，加深了了解。

乔冠华在联大的几次讲话，应该说是他演讲口才的精华所在。尽管他的演讲带有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痕迹，但今天来看，仍然是那么犀利，那么形象，那么才气逼人。

乔冠华在第28届联合国大会批评两个超级大国“拼命争夺世界霸权”是“当前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而且深刻揭露了前苏联是所谓发展中国家“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的虚伪面貌。他说：“过去我们中国也有人相信过这样的话，因为苏联是伟大列宁的故乡，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怎么能够不对发展中的国家给予全心全意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呢？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长期的切身体会，例如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侵犯边界、进行颠覆等等，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它推行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领土扩张主义。”语言十分犀利，有如一把刺入要害的利刃，使前苏联代表好不尴尬。

在同一篇演讲中，乔冠华还指出：“苏联领导人最近给我们中国加了一顶帽子，叫做反对缓和。这是张冠李戴。”当翻译翻完这句话后，全场发出了笑声，觉得用语很新鲜。乔冠华接着说：“你们说，你们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你们为什么不作一两件事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们的诚意呢？”乔冠华讲完这些，全场响起了很少见的热烈掌声，可见他的发言触及了前苏联的本质，讲出了许多亚非拉国家想讲而又不便讲的心里话，可谓动人心弦啊！

乔冠华出席1975年第30届联大时，安哥拉正燃起熊熊的内战火焰。乔冠华在他的发言中用不少篇幅讲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安哥拉的内战是全世

界一切革命人民所痛心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有分歧是正常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劝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殖民主义赶走。所以，非洲统一组织对进行武装斗争的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都给予承认和支持，为促进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苏联领导以民族解放运动的老子自居，不顾安哥拉三派组织达成的团结对敌的协议，通过它的宣传机构，封这一派是革命的，骂那一派是反动的，蓄意制造分裂。它还向安哥拉的一派运送了大量武器，包括重型武器，这样就挑起了安哥拉的内战。”当时有些非洲国家还不大赞同中国的意见，可事隔近20年，安哥拉打得不可开交，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处于经济极为困难的境地。不久前，安哥拉准备重开谈判，解决内战问题。2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不少非洲国家也认为乔冠华是有远见的。

乔冠华在他参加的每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几乎都有许多形象的比喻。他在1975年第30届联大会议上批评苏联假裁军真扩军，讥讽说：“苏联最近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又鼓吹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削减百分之十的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这是苏联的自鸣得意主张。……但是，他至今没有告诉过我们，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究竟是多少。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花好几年的时间。要真正按照苏联的建议，把军费减下来，更不知道要何年何月。”“苏联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做画饼充饥”。真的要让发展中国家等待这种援助，岂不是要‘索我于枯鱼之肆’？”

在同一篇发言中，乔冠华说：“石油武器打开了经济领域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新局面。……有人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一种垄断组织，一种卡特尔。”熟悉西方经济的乔冠华这时不无嘲讽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卡特尔、托拉斯、跨国公司是工业大国首先发展的，并且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呢？”乔冠华这时提高嗓子说，并用手指在会场的上空，有点激动地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句成语等口译翻完后，会场先是活跃，接着响起了笑声和掌声。

乔冠华出席安理会同前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一番辩论是极为精彩的一幕，既充分展示了乔冠华的雄辩口才，又为新中国的外交赢得了荣誉。

安理会应巴基斯坦代表的要求而召开，讨论题目是反对肢解一个主权国家。那天的会议在下午3时举行，大概由于讨论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安理会会场

内的代表席与旁听席上已座无虚席，大家估计中苏间会有一场较量，故而兴致勃勃地早早来到会场。秘书处工作人员可能也察觉此点，很早就坐在会场中央的纪录桌旁，只待主席一声宣布开会，就带上耳机，启动身前的电动打字机，记录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乔冠华在3时前来到了会场，神色庄重地在中国代表席上就座。许多代表和乔冠华热烈握手寒暄，旁听席上的观众时时地向乔冠华投来好奇和期盼的目光。3时整，主席敲起槌子，大声宣布开会。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代表该国作了长篇发言。他口才极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前苏联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卑鄙行径，当他讲到动情处，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声音哽咽地谴责苏联的所作所为，指出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耻大辱，各国人民决不会忘记这一页。这时会场极其安静，与会者大都神色凝重，不时响起清晰可闻的叹息声。阿里·布托总理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赢得了许多与会者的同情与赞叹。因为前苏联实行错误外交政策对广大亚非拉国家造成的恶果实在使人感到义愤填膺。前苏联代表马立克越听越尴尬，脸胀得通红，不停地用手指轻声地敲击着他的代表桌，显得极不耐烦。等阿里·布托总理一发完言，马立克就大声嚷嚷起来，一边发言，一边环顾左右，脸色一直红到了脖子根。此公这次发言同过去发言一样，毫无道理可言，只靠高声调和胡乱挥动手臂来虚张声势。他先是攻击阿里·布托总理，接着大肆攻击中国“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会者听后只觉得他近二十多分钟的发言翻来复去，只有一句实质性的话，即所谓“中国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乔冠华听后当即要求发言予以驳斥。他神色严肃而又非常冷静地说，我认识马立克先生多年了，总希望能听到他发表有内容的演讲。但是，十分失望，他还是几十年的老毛病不改，只懂漫骂，不懂说理，只懂攻击，而毫无事实。你说中国如何如何，那你举出事实来嘛！但是你一个事实也举不出来。中国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广大亚非拉国家心里最清楚，全世界人民的心里最清楚。老实说，中国就坚决反对你苏联去肢解一个主权国家，这样一来岂不天下大乱了嘛！那世界还有什么宁日？国家还有什么宁日？你们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抱有私心，想在各地推行霸权主义。你们所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这种旗下推行大国霸权主义。乔冠华最后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真理容不得有半点虚假。你马立克如果手中有真理就拿出事实来嘛！想靠漫骂来压倒别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再复回了。乔冠华这番气壮山河的发言赢得大多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会后，布托总理感谢中国的支持，说凡是巴基斯坦遇到困难，中国就伸出手来帮助

我们，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许多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地与乔冠华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热烈的祝贺。旁听席上的观众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秘书处一些记录人员私下表示中国确实是硬骨头。甚至连美国代表团一位参赞也连声说，乔先生的发言非常精彩。

乔冠华从青年时代的“能说会道”发展到“才华横溢”，从文章的“气度不凡”到以后行文的“气势磅礴”，经历了一段反复锻炼的艰苦行程。

他从小熟读诗书，为他的文字功底打下了很深厚的基础，使他的许多文章充满诗歌的气质。闪耀着绚丽的文采。

他在清华大学先是攻读“国文系”，之后“又转至哲学系”，使他“具有哲学的头脑”，明白了“对任何事物都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完全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随意听旁人的话的道理”，这使乔冠华一开始就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表现在文字上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行文逻辑上有缜密的总体设想。他要求写文章或发表演讲要有新思想、新语言和周到的逻辑布局。这是他一生中身体力行的。

他留学德国三年，又留学日本二年，花相当一部分时间学外语。学日语、学德语、同时继续提高英语。他在日本蹲过监狱，在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在香港度过了近三年的时间，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材料，搞读书会，写国际问题的文章，在《世界知识》差不多每

期都有一篇，讲战争形势的，一直写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此外他做的比较多的是做报告，发表演讲。所有这些使乔冠华不但熟练掌握了以后从事外交所必需的多种外语，而且他的视野不断地开阔，知识面也越来越宽广，从而使他写起文章来得心应手，发表起演讲来滔滔不绝。

他在夏衍同志的带领下，在重庆见到了从青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伟大的革命家——周恩来。1942年年底，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参加了《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担任《群众周刊》的主编……在《新华日报》参加了编委会。负责国际评论。总理还要他参加党的外事活动。从此，乔冠华就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培养下，逐步走上了从事外交的这道路。并在这一领域里发挥了他突出的才能。

乔冠华在外交战线上耕耘了一生，可谓功不可没。他是外交部唯一没有担任过驻外大使的部领导人，一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为外交斗争出点子、提建议和写文章。

乔冠华的文才，演讲才能，确如英国一家著名杂志所说的那样，乔冠华“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外交家的敏捷，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文学家的美妙语言”。这些主观条件以及周总理几十年来对他亲手培养的客观条件，才使乔冠华写出不少永存史册的好文章，发表了许多至今仍在人们耳边回响的好演说。

欢迎订阅《农民日报》

《农民日报》是我国唯一面向全国农村发行的中央级综合性报纸。《农民日报》一贯全面准确地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农民群众及农村基层干部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随着农村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农民日报》拓宽了经济领域的报道面，加大了信息量，从农村种植业、养殖业的技术、良种、市场信息，到乡镇企业的技术、项目、设备、人才、市场供求信息；从农村市场的宏观政策、趋势，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需求，《农民日报》都关注着、报导着、服务着。

《农民日报》覆盖神州大地，以从事农村工作的

干部、乡镇企业领导及其职工和九亿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主要栏目有：经济信息、乡镇企业、农业科技信息、国际市场、读者之声、法制、理论与实践等。其中周四的“乡镇企业大世界”和周日的“大地周刊”自成风格。

《农民日报》激光照排，胶版印刷，每天对开四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月定价7.61元，年定价91.32元，邮发代号1—39，各地邮局办理订阅。国外发行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2820信箱）办理，代号D424。

社长兼总编辑：孙永仁

社址：北京朝外十里堡北里

邮码：100025 中继线：5005522

广告部：5073401



新加坡掀起“山东热”——“中国山东贸易与投资研讨会”会场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纪实

●王永志

华人移居海外的发展史 是世界史上奇异的一页

1994年3月，当我漫步在“花园城市”新加坡时，朋友们指着大华银行、华联银行等几幢摩天大楼对我说：“这几座‘大山’无论 you 从狮城的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它们。”

果然。在市区，我从几个方向眺望它们，都可以看到它们高高在上的身影。而拥有这些产业的老板便是新加坡银行大王黄祖耀、连瀛洲等华人富豪。在新加坡四大银团和50大上市公司中，除了政府控制的以外，大多为华人控股。

沿着新加坡柔佛大桥，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目睹了马来西亚博采大王林梧桐旗下的云顶大厦和糖王、旅馆大王郭鹤年名下的香格里拉饭店壮观建筑，领略了马来西亚华人在这个国度创业的风采。

可是，当我站在马六甲三保山上，我的心再也不象热带的晴空那样蔚蓝高远。那满山密密麻麻的坟墓，有

的墓碑记载着他们从闽粤何乡何村何年来，有的碑文已被风雨洗刷湮没，荡然无存。它让我想象着中国先民驾着一叶扁舟，把生命托给季候风，从漩涡到漩涡，一阵吆喝，一阵长啸，踏上几乎是蛮荒的土地，同当地人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创繁荣。他们的成功与发迹，包容着多少风风雨雨，甜酸苦辣？！

以研究“乡村中国”而成名的费孝通，对华侨华人也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侨胞绝大多数是出身穷困的劳动人民，他们迫于冻馁而抛乡离井，飘洋渡海，出外谋生，实际是现在所说的劳务输出，靠出卖劳力过活的人。经过长期的勤俭经营，甚至要经几代人的努力，才在国外站住脚跟，取得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说来，特别是在南洋诸国，大多数侨胞以从事小本商业，在流通领域里为当地居民服务，从而形成当地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小商贩和小作坊的经营者固然比当初的契约劳工地位高一些，收入也多一些，但是要从这个阶层上升到富裕阶层是不容易的。

华人早年移居世界各地，那种既辛酸又不凡的历程，是华族史也是世界史上奇异的一页。这一页写的是，人如何在劫难和艰苦中求生存和发展。由当初的

“猪仔”苦力、自由劳工、小商人，到今日驰名世界的大富豪和大企业家。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一批华人超级富豪把握商机，迅速崛起，在当地乃至世界财经舞台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

1994年6月，香港《福布斯资本家》杂志评出排在前10位的华人富翁。他们分别以其财富排列如下：

李嘉诚（香港）	70亿美元
郭炳湘兄弟（香港）	65亿美元
蔡万霖（台湾）	63亿美元
林绍良（印度尼西亚）	60亿美元
郭鹤年（马来西亚）	60亿美元
李兆基（香港）	59亿美元
林梧桐（马来西亚）	50亿美元
黄奕聪（印度尼西亚）	50亿美元
吴东进兄弟（台湾）	48亿美元
彭云鹏（印度尼西亚）	45亿美元

撇开港台超级富豪不计，分布在前十名的东南亚富豪就占了排行榜的一半，说明海外华人富豪与港台富豪势均力敌，不分伯仲。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华人资本国际化已成趋势，上述华商就有不少以香港为基地；而港台富豪也不局限于一隅。

当前，在华资企业和华人企业家在亚太和世界经济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之际，一向不喜欢露富和张扬的海外华人企业家，被称为“大王”“巨星”的名号不胫而走，名闻遐迩。我们不妨略举一二，便知分晓。

新加坡：“金融大王”李成伟家族（控股华侨银行）、郭芳枫家族（丰隆集团）、黄祖耀（大华银行）、连瀛洲（华联银行），“地产大王”黄廷方（远东机构）、邱德拔（良木园控股），“罐头食品大王”杨至耀家族（杨协成公司），“旅馆、百货大王”董俊竞、“玻璃大王”陈家和（和兴玻璃控股）等等。

马来西亚：“糖王、旅游业大王”郭鹤年（郭氏兄弟集团、嘉里集团），“博采大王、旅游业子”林梧桐（云顶集团）和陈志远（成功集团），“橡胶大王”李莱生（吉隆甲洞集团），“产业大王”邱继炳（马联工业），“建筑业大王”杨忠礼（杨忠礼集团），“钢铁大王”钟廷森（合营制钢有限公司）等等。

泰国：“饲料大王”、“农牧巨子”谢国民兄弟（卜蜂正大集团），“不动产巨子”黄子明、黄创保家族（曼谷置地、泰华荣集团），“金融巨擘”陈有汉家族（盘谷银行）、郑午楼（京华银行）等等。

印度尼西亚：“金融大王”“水泥巨擘”林绍良（沙林集团），“食油大王”黄奕聪（金光集团），“金融保险巨子”李文正、“木材大王”彭云鹏（巴里多集团）等。

等。

菲律宾：“金融大王”、“烟酒巨子”陈永载（联合银行、福川烟厂），“百货大王”施至成（SM集团），“工商巨子”吴光辉（约格森米控股公司），“金融大亨”“商界鬼才”郑周敏（亚世集团）等。

法国：“百货大王”陈克威、陈克光（陈氏兄弟公司），“零售大亨”潘洪江（友和公司）等。

巴西：“黄豆大王”、“石化业巨子”林训明（石化集团）。

美国：“金融大亨”黄仲元、陈守廉，“金融魔术师”蔡志勇，“新电脑王”王嘉廉等。

澳大利亚：“零售业和地产业大亨”陈秉达，“纺织大王”陈锡恩，“服装巨子”谢杰民。他们三人均入选澳大利亚200富豪榜中。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 吸引了关心故土的华人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财团、大企业和港台财团在经济国际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欧美、澳洲华人企业家也趁势崛起。

中国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潮，吸引了世界上所有商家前来这块“热土”淘金，作为深谙“快半拍”商法的各地华商当然不会置身度外。他们的投资化成一朵朵斑斓耀眼的浪花，汇入这股波澜壮阔的浪潮中。

80年代，甚至更早些时候，东南亚华人财团利用香港作为业务国际化基地，并作为进军中国大陆的“桥头堡”。象世界级华人富豪林绍良、李文正、黄奕聪、吴家熊、陈有汉、谢国民、黄子明家族、黄廷方家族、郭芳枫家族等等，不断突破原来家族界限，以至所在国界限，在外流发展首选之地——香港投资兴办工商企业，尤其在房地产、金融业方面更是连出大手笔，被称为“翻江倒海的南洋帮、过江龙”。在看好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情势下，同时也为了同港台商家和欧美、日本财团争分“大饼”，一些海外华商、超级富豪在中国勃兴的外资潮中，也频频亮相，弄潮涛头，令世人瞩目，为传媒和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从中国大陆出发，经过多少个“八千里路云和月”，而今华人超级富豪们和一般的商家又回到自己祖辈休养生息过的地方，似乎兜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但是，一些细心的观察家认为：这不是“回归”，只是在商言商，哪里有钱赚，就奔向哪里。

1993年年底，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专家聚会中国重点侨乡广东省汕头。他们从具体案例出发，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评析：华人企业家象过江之鲫到中国大

陆投资，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血缘、乡情、宗亲的因素虽然不可抹煞，但只有在投资环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商业利润较为可观的前提下，血缘等关系才能起作用。华人商家投资大陆的实际功利，即双向甚至三向的，既对商家发展有利，也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有利，同时对投资者所在国也有利，因为华商已成为当地民族资本的一部分，其所赚取利润的税收是回馈给所在国政府或有关当局的。华人商家投资中国大陆的性质，是与世界经济国际化的潮流互动的，属于华人资本的一种国际性流动，是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一个环节，是开拓市场、进军国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华人资本在中国的回归。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就象一座地球村。

地球村的每一家每户都想发达致富，闭关自守无异作茧自缚。

中国向世界敞开了门户，也表明了中国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雄心。中国将会因为外资的注入，如同输进新的血液而更加强壮。而外资之间的竞争，也会象一群饿汉争食一块“大饼”那样激烈。

因此，华人商家到中国大陆投资，只是世界商家在中国大陆角逐的一个竞技场而已。

从“单兵作战”到“团队登陆”

新加坡华商投资旋风席卷神州

新加坡华人商家在投资中国大陆的浪潮中，表现出狮子般的敏捷勇猛和鱼样的善游会钻。

在狮城访问期间，新加坡新闻媒介经常刊登到中国大陆投资弄潮的消息，也常常有专家的分析评论。一般华人商家和公民，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往往十分感兴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公务总管冯仲汉先生告诉我，中华总商会不仅关心商务，还十分关注时局，经常派员到中国大陆考察访问，洽谈生意。同时，他们还请一些专家、官员举办讲座，例如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就作过《今日中国的投资机会》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等专题报告，吸引了不少华人商家前往听讲。

近一年多以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大陆外资总额中排名仅第5位的新加坡，突然在中国投资潮中激流勇进，作出一系列大动作：

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总理吴作栋、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高层政要频频访问中国，积极主动调整了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由吉室企业有限公司、实得力产业有限公司、泛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新加坡政府控股）以及新加坡劳工基金所属公司和私人上市集团所组成的财团，准备投入

巨额资金开发苏州工业园区；

无锡——新加坡工业园区已于1993年底正式奠基开工；

华丰股份集团和百汇控股有限公司（均为上市公司）与威海市联手合建大型国贸中心；

新加坡恒建国际集团在浙江宁波签署了开发甬江新区等6个项目的合资协议，集团总裁郑维健就是船王包玉刚的四女婿，合作者有实得力和永泰控股等大财团……

在狮城政府的统率下，一支支实力雄厚的新加坡财团组成一个军团，风尘仆仆地奔江苏、上山东、下福建、去海南，泼出一把把“银子”，签署一份份协议书，刮起一阵阵令人眩目的“新加坡投资旋风”。

被称为“家中之家，城中之城”的北京丽都假日饭店，就是十年前由新加坡华商同海外客商合资兴办的。它走过了一条由小到大、从简陋到豪华的不凡历程。

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曾出任中国特区的顾问，用“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验为中国学生上课，为特区的腾飞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80年代中期，我采访过中国引进资金、技术而奔波的新加坡商人、学者杜亿春。当时新加坡华商到中国大陆投资者还寥寥无几，但他坚持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一再证明他深谙华人“快半拍”商法的真谛。

被称为“民间外交家”的东南亚名商唐裕，50年代就在海外同中国大陆做生意。70年代、80年代初，他就同几位新加坡商家在香港开办一个公司，作为进入中国大陆投资的“跳板”。他牵线搭桥的汇成建设公司已从“小打小闹”，到大举投资，如今成为与官方资本百腾置地有限公司进军大陆房地产的龙头企业，该公司与百腾置业联手注资7000多万美元兴建厦门商业大楼和公寓大楼。

当中国刚刚开始有作出让土地的时候，新加坡地产大王黄廷方的大手笔令人感到什么叫财大气粗。而后，回过味来才恍然大悟：什么叫精明过人，什么叫目光如炬。当时，黄廷方透过香港信和集团用压倒他人的价码标下厦门和福州各一幅地皮，现在价值猛升，获利可观。

新加坡地小人少，劳动力短缺和国内市场饱和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60年代来及时调整了发展战略。以“出口导向”劳动外贸、交通、机电、金融、旅游的发展。80年代又实施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重点发展劳动力替代的技术密集型高科技工业，并跻身于“四小龙”之列。进入1988年，新加坡国内储蓄猛增，其势头大大超出投资率，为了适应世界各国

的贸易保护政策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带来出口困境,以及消化资金过剩等问题,新加坡政府果断地作出了第三次战略调整,要求企业家积极到国外去投资,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据有关资讯显示,截至1993年6月底,新加坡上市公司在海外投资共100亿新元(折合约63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在东盟国家,也有部分投到欧美等地,进入中国大陆的仅为10%。

被称为“亚洲政坛的常青树”李光耀资政对中国十几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着独特的眼光。他于1992年在《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的演讲中称:在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的14年间,中国达到了每年8.6%的平均增长率。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将会比以前做得更出色。他预言,当中国建设了连接主要沿海和河滨港口城市与内地的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时,当内地获得资金和技术时,中国的增长将是爆炸式的。这将强有力地、持续地推动东亚及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

1993年4、5月间,李光耀、吴作栋、王鼎昌等访问中国大陆,向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议,并得到中方积极的回应。

1993年9月,新加坡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财团,注册资金2亿美元。该财团成员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资产和庞大的国际市场网络。

1994年2月,中新合作开发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式签约,首期开发面积20平方公里。一时间,资金来源流向苏州,一些涉及电力、道路、港口和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电子、机械等工业项目纷纷签约,全面启动,并由此带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跨国公司前往投资。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正呼之欲出。

紧紧抓住黄金口岸,是华人经商的一个秘密。新加坡商家看中苏州这块风水宝地,在于苏州临近长江口,距离上海、无锡和杭州都很近。王鼎昌总统更认为:苏州和上海之间的关系,有如深圳和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山或印尼峇淡岛一样。

厦门、福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这些港口城市,也为新加坡政府和商家看好,不少华人工商巨子也各显神通,以狮城的资金和成功的管理经验,把握发展的商机。

南洋帮大哥大 移师香江弄大潮 郭鹤年投资大陆身价节节攀升



投资合作项目洽谈的热烈场面

郭鹤年的名字,在亚太乃至世界财经界,就像他旗下的香格里拉饭店,无人不知,家喻户晓。

他的“封号”也多如牛毛:“马来西亚、亚洲糖王”、“旅馆业大亨”、“杰出企业家”……也许今后还得加上“传媒大帝”的桂冠,因为他在购入“香港电视”股份之后,又控股《南华早报》。

他的身份也十分特别:其父郭钦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于1909年飘洋过海到了马来亚;他本人生于1924年柔佛州新山,在那里接受教育;1947年,他到了新加坡,开设了他平生的第一家公司,取名力克务;尔后又与家族鹤字辈联手创办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并在25岁的年纪被推为董事长;50年代初,他深感眼界需要开阔,便动身到伦敦学习研究和做市场调查;50年代中期,他返回马来亚,成立民天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商品贸易的生意,继而在北赖设立了马来亚第一家白糖提炼厂,由此奠定“糖王”的地位,并向旅馆业、航运业等行业进军。70年代,在“糖业”等如日中天之际,他设有“恋栈”,毅然在香港注册嘉里贸易公司,从事期货、地产、酒店业;中国大陆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后,他又大举进军中国的酒店业、地产业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他的企业王国的版图很广很大,除了“起家”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外,印尼、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欧洲、智利、墨西哥均有他的产业;香港和中国大陆更是他近一、二十年大举进军的地方。

他的经历,也许是近年著名华人企业家经济国际

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观察家认为，郭鹤年及其家族秉承华商擅于经商的传统，并着重将集团的投资多元化，在原产品业务取得成就后，便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方式进行投资。

郭鹤年的资产究竟有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有人把他称为“神秘大亨”，但是，近年来一些著名财经杂志将他列入世界级的超级富豪，并且节节攀升。美国《财富》杂志1992年在其一年一度的世界级大富豪调查中，以其18亿美元身价，将他列在118名，低于李兆基，同张荣发持平，高于郑裕彤。到了1994年，《福布斯资本家》杂志则认为郭鹤年身价已达60亿美元，是全球五大华人超级富豪之一，仅在李嘉诚、郭炳湘兄弟、蔡万霖、林绍良之下，而在李兆基、王永庆之上。无论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但郭鹤年其富有程度则是不言而喻的。

郭鹤年被人看好看涨，行内人士认为是沾了“中国因素”的光。

郭鹤年涉足神州创业已有十几个年头了。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始建于1983年，是郭氏兄弟集团在大陆的第一家酒店。

当80年代末中国酒店业受到冲击时，有人问郭鹤年对大陆的投资不减反增，这份始终不渝的信心从何而来？

他回答道：没有别的民族好过华人、炎黄子孙。一部分外民族的人也有好像华人这么好的，但好过华人的，没有。所以，我觉得海外华裔也好，港澳居民也好，到中国大陆投资是一件最好的事情。经过文革后，国内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要发展，海外华人的推动作用是相当有效的。

基于这种信心，郭鹤年便能在风浪袭来不动摇，而采取“勇者无惧、人弃我取”的决断。

郭鹤年出生在海外，但他不讳言自己的中国血统。不过，他说：我心里还是爱马来西亚，那个地方也是个好人国家，好社会。尤其我们华人在经济环境最困难的年代，很多人跑到南洋，得到当地人的提拔，象提拔我的父亲，提拔我和我的兄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我的心可以说分成两瓣，一瓣爱我生长的国家，一瓣是爱我母亲的老家。

因此，他得到中国投资天经地义，特别是当中国致力把经济搞起来的时候。

1994年3月11日，我和三位同事经过马来西亚海关，驱车转到了吉隆坡。同日，《南海商报》在头版头条刊出该报的独家消息：解除社会主义国家人员入境的限制。朋友们称，我们的“幸运之旅”得益于大马

的新政策；同时，他们还告诉我们，大马华商对中国兴趣颇高，为时间允许，愿带我们去采访一些成功的商家。

因为在马来西亚只呆了一、两天时间，我们无缘拜会一些知名华商。但从一些信息源中获悉，为了趁早在中国大陆这个“最大和最后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马来西亚政府和大马华商也催鞭跃马，向中国大陆挺进，以期获得象郭鹤年那样的回报。

当商战的硝烟向“地球村”的每一角落扩散时，“国际大串联”的热潮便不可遏止地涌动起来。

因为地缘的关系，因为经济实力的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美华人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潮，眼看着港台和东南亚华商在黄河、长江弄潮，眼看着他们的事业越来越“火爆”，就是不敢贸然地把资金投进来。他们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勇敢者”。象兴建北京建国饭店的美籍华人陈宣远，象太平协和的汪世忠就是那敢于“吃螃蟹”的一族。

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美国协和集团把投资重心从欧美转移到东南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

作为协和集团亚太区主席的汪世忠称，他们看准了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潮流，将用巨资在中国建立一个象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的国际性综合性集团公司。

现在，他领衔的太平协和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入选“世界华商300家”和“世界华商500家”，正朝着超级富豪之路迈进。

美国哥伦比亚华人教授王念祖博士认为，在欧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美国企业将投资重点转向太平洋沿岸各国的热潮中，中国将成为主要的受惠国，而未来几年美国经济景气程度即使提高，美资对中国的热情仍将“痴心不改”。

当港台和东南亚华商象过江之鲫流向中国的河流大川，欧美华人商家也一改过去隔岸观“火”变为越洋淘“金”。

欧美华人“科技巨子”、“金融大亨”进军大陆其势汹涌，既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晴雨表，又反映他们投资大陆起点高、潜力大，前景广阔，在分食中国经济“大饼”方面，不说他们与港台、东南亚华商相比有后来居上之势，至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带给中国一个惊喜，还给世界一个奇迹。这决不仅仅是广告的华美词藻，而是进军中国大陆华人商家的坚定信心。

东汉大经学家

郑玄的一生

● 管理成 王一恒

郑玄，汉经学家，毕其一生以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职责。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籍文献专家，也是当时杰出的教育家、训诂学家，并兼容校勘、语言等多方面学科，功绩斐然，颇多建树，后世称郑玄所遗著作为“郑学”。

郑玄字康成，生于公元128年（汉顺帝永建三年，东汉末年北海（今属山东）高密县双羊镇后店村人。郑玄生时，家道中落，他绝意仕途，抱道隐居，潜心研讨学问，“容百家之长于一炉，著一家之说立门户”，终至成为天下所宗的“经学大师”。在党锢之祸中，因涉嫌遭14年禁锢，不变初衷，坚持著书立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郑玄在政治上站在汉王朝一边。他虽反对那些专权骄横的宦官、外戚和官僚，却又与标榜“正义”的宗室和官僚，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同刘备、孔融友情甚厚。晚年被袁绍父子胁迫从军，竟老死于军中，卒年74岁。

赏景嬉戏非我志向

郑玄自幼聪悟，有“神童”之称。五六岁时，投师开蒙；七岁八岁，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九岁十岁，术数、天文、气象均有涉猎，还善于写作。更难得的是他学习执著，志向远大。

郑玄二十一岁那年，做过一段地方小官，又到太学受业，约从二十四、五岁开始游学，历十余年，仍归乡里。后西行入关，由卢植（字干）介绍，改从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京兆扶风人马融学古文经学。

一次，马融集诸生考论图纬，计算浑天仪（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运合中的一道难题，师徒们穷思竭虑仍解不出，大为沮丧。这时，有位弟子推举郑玄神算，马融一听，放下架子，召来郑玄。郑玄早将此题演过数遍，当下提笔一气呵成，其解天衣无缝，十分准确，众皆骇服，马融大喜过望，唤郑玄到身边，亲口传授《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当面讨教，马融大悦，又出示自己不能解剖的七道试题，让郑玄与众弟子作解，郑玄一人解完五道，卢植得二道。马融对弟子们说：“吾与汝，皆弗如也。”郑玄趁机把积攒三年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请教，随后，郑玄郑重地向马融和学友告别，准备返回故乡，继续加深对古文经的研究，马融恋恋不舍地拉着郑玄的手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马融是位冲破了古文、今文经学界限的经学家，主张今古文学自觉、公开全面地进行融合与吸收。应该说，他对郑玄的影响是巨大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郑玄终于成为一位“该通六经，兼取百家”的经学家。自清代以来的学术界，凡研究经学的，便奉郑玄的群经注说为宗主，有的学者，甚至将毕生精力，投入郑玄一部书的深研精磨，郑学之博大精深足见一斑。

集学大成“郑学”诞生

从东汉一直到今天，但凡研究汉以前的古书，特别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几部重要注述都须借鉴、研究郑玄的注本。汉代流传至今的重要注释经书有六部，除何休《公羊传解诂》、赵歧《孟子章句》外，其余四部都是郑玄一人注释，其成就超过了其他经学家，他的著述刊注给人们阅读古书以极大的方便，他的注经原则和方法

对后世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此,郑玄在中国历史经籍文献领域确立了应有的地位,他的经学学说被誉为“郑学”。

汉时,用当代隶书写成的书本叫“今文”,用汉代以前篆籀字体写成的书本叫“古文”。两汉经学因据文本不同,师授渊源不一,从而形成了治学观点不同,方法有别,风格迥异的两大学术派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学派墨守一家之言,固执门户之见,它由当权的统治阶级直接扶持,要求儒家经传更紧密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教育目的,经学更被贯以阴阳五行学说,经学内容怪异,且日趋神学化。古文学派则把儒家经传看成古代的历史材料,提倡重师法,并把古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理想化。两派为了争夺学术上的独尊地位,从一开始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斗争。同时,汉代经学家的注解字也日益繁琐,各家述注不一,繁杂正误不分,使经学变成了枯燥乏味的东西,从而走向了死胡同。

博学强记的郑玄,目睹了学术界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为了“述先圣之原意,整百家之不齐”,产生了兼通古今,沟合为一,取长补短,写成比较简约文本的想法,用范文作指导,减少经学家学习上的困难。于是,他便闭门不出,潜心刊注。首先做了大量耐心而细致的工作,既对错简伪文,精心审辨,又取古今文异本,认真校勘,再将古书篇目次第的不同编排,彼此互校,选取合理、进步的予以肯定,完成这些工作以后,再着手注释。他所注释的古书至今保存完好的如《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等。其次,由各大家的一些表面的某种迹象、某种趋势,冲破一些局部的不自觉的、公开和全方位的认识局限,将今文与古文的融合上升到自觉、公开和全方位上面加以认识、领会。他博通今古文,兼及秘纬,注群经多兼采今古,更注纬术数种,并间以说经,完全挣脱了今古文的羁绊,完成了今古文的融合贯通,纳汉代经学于一途,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上项工作中,郑玄坚持做到了:既不迷信前人,以人蔽己,也不刚愎自用,以己蔽人,而能做到不隐善、不掠美、不苟合、不盲从,闻疑载疑,实事求是。

当时还没有雕版印刷术,一切书籍都要手抄,郑玄既有大名于汉末,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玄对群经作了新的注解,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说翕然归之,信守郑玄的手抄本为范文、样本,相约不再传抄其它注本了。郑玄写出的简约求实的注本,是直接对各种迷信、邪说的彻底清扫,是经学研究的重大革新,也是多方保存先秦词义、沟通古今书面语言的伟大创举。由于郑玄遍注群经,博采今古两大经学体系之精华,使儒家

经典的注疏,汇成一家之言论,经学由此走上了古今综合的道路。这样,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郑学”诞生了。经郑玄批注的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尚书大传》等,并撰《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其批注和著述共约一百多万字,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今通行体《十三经注疏》中《毛诗》、《三礼》注,即采用的郑注。

“经神”“学海”决胜之战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郑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也是在同不同流派的“滞、鄙、拘、陋”儒的激烈辩论和较量中,在兼取百家、广泛吸收“通人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首先,经学趋于神学化。西汉今文经学盛行,朝廷置五经博士以教授之,弟子各宗一师,自秦汉以来,当权的皇帝无不酷爱、推崇神仙术。皇帝高倡于上,学者推波于下,众多儒生、术士和阴阳家,见有机可乘,神通一气,兜售其奸,将经学掺杂进阴阳五行和神仙怪异的内容使之日趋神学化,并拣起了“讖”和“纬”两种揉进迷信色彩的糟粕牵合于经义,经学从此步入歧途。

其次,派系斗争激烈,经学趋于繁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从一开始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文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经学失去了原有旺盛的生命力。郑玄在两派之争进入最后阶段的大背景下,以一介学人,率先奋起,为树自家学说,与《公羊》学派代表人物何休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使“郑学”最终得到承认和确立。

今文学家何休颖悟多智,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讖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捧起书来诵背如流,说起意来头头是道。他这个人面对提问,从不用口答,寥寥几笔,如行云流水,答案早已跃然纸上,精义简洁,论证准确,题解从未出过一次差讹,名满天下,京城称之为“学海”。

182年,郑玄与今文学家何休等公开辩论《左氏春秋》(古文经学的代表作)与《春秋公羊传》(今文经学的代表作)的优劣,这是汉代以来第四次古今文之争。有人预言:“此次今古之战绝非一般,胜者,天下学人将倚为柱石,败者将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这是一次关乎派系命运的决胜之战。何休曾著了一本《公羊墨守》的书,扬言公羊学精义概全、玄理深奥,是放之四海皆准,可永立于不败之地的经典之作,而在另一著作《左氏膏肓》中,则对左氏理论进行了全盘否定,全

面攻击，诬称为“已成痼疾不可救药”。郑玄与公羊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何休的言论作了无情的驳斥。通过一番决战，将何休驳得哑口无言，乖乖认输，发出了“康成入吾室，操我矛，以伐我乎”的哀鸣，他所代表的公羊派从此一蹶不振，而让位于郑学。随后郑玄又与陈元、李育较论今古，与刘瑰、范升针对宪章进行探讨争论，并赢得了第四次——亦即最后一次今古文决胜之战的胜利。在同何休等各派儒生的一次次辩论中，郑玄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他以古文为宗，兼取今文之精，遍注群经，很快叫响了名头，不久，就被时人颂为“经神”了，从此名声日隆，来门下投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

不乐仕进，逃避做官

郑玄出生在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见他自幼好学，很是高兴，热盼他长大成为幼承书香的“清流”、“名家”，有时带他到郑氏墓地缅怀先人的功德业绩和显赫族史，有时带他到临近的胶西国都成阴城游览领略齐鲁风情和中华文化的壮丽辉煌，有时领他在松岸柏涛间闲步，漫谈学习文化、掌握知识的神圣与重要。尽管家业凋零，仍容许他不事生产，专心致学。虽在家境困窘的条件下，也支持他负籍求学。这些使后来的郑玄受益匪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默默起誓：今世终究要做个有学问的人。

148年（汉桓帝建和二年），乡里豪绅、名门见郑玄酷爱书数，并对天文占候、风雨、隐术之类无不旁通，联名向县衙举荐他当了掌诉讼、收赋税的“乡啬夫”。郑玄勤于政事，两袖清风，很受上司和乡民的爱戴。是时，大官僚杜密为北海郡相，他到高密巡视，见郑玄头长耳大，面阔口方，长八尺余，仪表仪容不俗，当即将他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他的学业、政务情况，郑玄无不对答如流，杜密知他是“异器之才”，将他带回郡里安排了职事，不久，又送他到太学受业。太学是古代设在“天子脚下”的最高学府，受教者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子弟，余则是全国层层选拔的“绝才”、“首学”。这些“天之骄子”享受着一流的教育，他们大都具有直接入仕的锦绣前程，甚至可以一步登天，出任六部九卿的高官。封建知识分子有“三盼”，盼中举，盼入仕，盼选官，熬得十年寒窗苦，只图一顶乌纱帽。许多人为求得一官半职，甚至不遗余力投机取巧，不择手段钻营策划，与众不同，郑玄在一次次飞黄腾达的机遇面前，却有违常情地作出了“无意仕途，不愿做官”的抉择。太学结业，他不愿留在京师，从此开始了

十几年的游学生涯，这与他早期受家教影响，立定志向作学问，有一定内在的联系，而后来的遭遇更加剧了他“乐不思仕、逃避做官”观点的最终形成。他在《郑玄笺诗》中云道：“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这里他所恐惧的不只是国家将亡，而且还恐惧自己将遭迫害身陷囹圄以至身首异处。

据史书记载，168年，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戚以门人故吏凡有官职者，全部免官禁锢，这是东汉第二次党锢之祸，郑玄也被牵扯在内。灵帝建宁二年，他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坐党禁锢。十有四年。”郑玄看到如此众多的“贤人君子”，横遭杀戮之祸，自己也饱尝禁锢之苦，产生恐惧之感是在所难免的。

郑玄为什么屡被征而不乐为吏呢？他本人一语中的道明原因——“居今衰乱之世，往仕甚急且且危”。是说生在这个衰败动乱的时代，如果去做官，那将很为难亦很危险。于是，他那求仕中官之念逐渐淡薄下来，连续几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并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经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一代宗师”地位。

187年（汉灵帝平四年），郑玄拒绝大将军何进的礼遇优待“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为由拒不到任。

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迁都长安，众公卿举郑玄为赵相，借故道断不至。

199年（汉献帝建安四年），大将军袁绍“举公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他在病重时写给儿子的遗训中着重指出：“但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说明他早年无意仕进，只想在整理文化遗产方面做些工作。到了晚年，仍然“将闻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说明他还要趁年老静居的时候，把工作做完，最后感到欣慰的是：“吾虽无纹冕之绪，颇有让爵之事，自乐以论赞替之功，庶人遗后人之羞。”他预见到自己的业绩会载于史传，史家的评论大概不会使自己的后人为有他这样的先人而感到丢脸。

200年（汉献帝建安五年），袁绍、曹操相距于官渡，一场大战势不可免，袁绍为标榜“清高”、“重才”，到处网罗人才，想在战略上压倒曹操，他专门派儿子袁谭直指高密，反复动员甚至以势胁迫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只得遵从，由于重病在身，加之年事已高，行至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境）时，病势加重，是年六月病逝。患病期间，仍以旺盛的精力作了《周易注》，勤以致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临死之际，遗令薄葬，自

卿守以下官员及受业弟子约一千多人，前往凭吊。

浩然业绩 有口皆碑

郑玄是在多学科、多领域均有探求，注著皆丰，造诣颇深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彪炳史册，有口皆碑。

文化部分

一、遍注群经，考据事实，不愧为汉代经学的柱石。

郑玄先通今文，后解古文，虽师承古文经学派，但又不囿于师说，而是博采众家之长，打破师法，家法界限，兼容并蓄，立一家之言，终使汉代经学今古文的纷争暂告休止。郑玄深发儒学之义理，为儒学精神的发扬和取得长时间的思想统治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贯通今古，学不立一家，集汉学之大成

郑玄幼入太学，逐通今文，后师承马融识古文，能立足于古，贯通于今，博通群经，遍注群经，其群经笺注一出，各家经注很快销声匿迹，汉代经学归于统一，一举成为两汉儒学的集大成者。

三、训诂校勘，建树非凡，堪称大家

郑玄不仅继承了先贤的训诂成就，而且在训诂体例，方法上作出许多创新，如他揭示了注释的重要规律——依文立训而法有专守的原则，就是说，文义训诂必须顾及语境，释义必须是文中应有之义。他导魏晋以来义疏之先路，在注述工作中，通过“声类”、“音类”相同，相近的关系，进行文字通假的分析和说明，这在中华民族的古籍整理事业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郑玄是将文字、音韵、训诂熔于一炉，直接用于训释古籍，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全面成就的杰出训诂学家。

注书首先要搞好校书。郑玄在训诂方面的成就离不开他在校勘古书中付出的艰辛劳动，他在补脱订伪，审音定字，纠正错讹的校勘工作中，精心斟酌，一丝不苟。

四、语言、纬书见解独到，功不可没

郑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语言学家，他对注释经传中的许多语言现象寄予关注，在语言研究方法上见解独到，并运用科学方法对古籍作出合乎语言学原理的诠释。郑玄对语言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打破字形的束缚，首创因声求义的方法，将汉字的形、音、义结合起来考察词的来源及流变，开了汉语音韵、训诂研究的先河。②注重从语法关系上疏通文义，从词在语法系统中的作用来训释词义，促进了我国传统语

法学的发展。③依据方言材料校核古书，验明正误，不仅丰富了古代方言知识，而且为古籍注释提供了科学的语言对比方法。

郑玄不仅兼习语言学，且时观秘籍书纬术之奥，其遗书保存传世的如《尚书中候注》、《尚书五行传注》等。他在注纬中着重把握三条：①注重对其中所含哲学思想的阐发。②注重载记古代的研究成果。③注重叙述不同时期的典章制度，慎谨考释名物。郑玄纬书注逾越今古文的界限，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渗透、沟通、融合，剔除了迷信的色彩，赋予纬讖以全新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教育部分

一、倡导博文，强调约之以礼

郑玄校注的儒家经典很多，流传很广，影响今世，如他所注的“三礼”，直到清代还很有权威，这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上是一大贡献。也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发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把孔子的博文约礼当作他编写教材的指导武器，要求学生的言行德操必须符合“礼”的尺度，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在博文的同时，还要约之以礼。

二、简约义明、足可为式

在治学实践中，郑玄不像仅遵师法、固守家法的经学大师那样拘于体例，墨守成规，而是时有变化，教材简约义明，考订历史事实有声有色，如他注释《礼记·檀弓》中的“司寇惠子之丧”时，口数十字，就把当时的情景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认为：“郑君之释《礼》……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三、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在郑玄编写的大量教材中，不少见解对今天的教学仍有其指导意义，如对初学者不能只讲古代圣人的抽象大道理，教学不仅要顾及学生的年龄特性，还要注意掌握学生的可接受性等。主张在课程设置上要因人而异，在培养学生方面要做到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

四、讲究“积学”启发式施教

郑玄在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方面，造诣很深，颇多贡献，他倡导学生在猎取知识的过程中，要在“博稽”、“粗览”、“时睹”上下功夫，就是说全面领会教课书的实质内容；有选择地多读些书；用精确的资料搞好旁证博引。他认为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做到“由多求一”、“以一御万”。这是郑玄教和学的一套成功经验，其中寓有逻辑学中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方法的合理因素。

另外，通观郑玄的治学，主要采取了问难和启发式

的教学方法。他说“乃复启发为之说，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这是对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的新发展。

通德大儒，堪为人师

郑玄不仅是名满天下的经学家，还是一位德行高尚、热心助人，克己自律的楷模，他那竹的节气，松的骨格，也像他注的经那样流芳久远，屡世不衰。

一、做人要讲气节、讲人格

袁绍领兵占领冀州以后，听说郑玄是个大儒，很有名望，三番五次派人把他请到冀州，又在行营摆下宴席，命三百名谋士大僚作陪，众人相继捧杯敬酒。袁绍手下有个投降过来的官员叫应邵，是今文学派的信徒，他想当着众人的面戏弄郑玄，替论战败阵的本派师尊捞回几分面子，只见他走到郑玄面前，傲声傲气地说：“我叫应邵，曾做过泰山郡太守，想拜你为师，不知够不够资格？”郑玄不介意地打量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够不够资格不能看官大官小，要看此人讲不讲气节，有没有人格，颜回、子贡没有做过太守，孔子每逢见人就夸奖他俩是好徒弟，郗鸿豫（御史大夫），五伯舆（魏镇南将军安乡侯）是我的弟子，官职都比太守大，他们在我面前，以提官职大小为羞。”几句话一出，应邵满脸通红，再没道上腔来。

二、求学问要讲美德、讲风格

马融是“外戚豪家”、“才高博洽”。他选了十个高徒，作为教授弟子的“传话筒”，对其他受业学子从不屑一顾。郑玄投入门下，三年里，未见这位大架子的老师一面，对此，郑玄并不放在心上，不管谁来施教，他都认真听讲，默记心底，注意吃透精神，未尝一日松懈。

郑玄意欲注《春秋传》，暑去秋来，历经几年，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一次，他外出传经，与一个叫服子慎的书生同住一店，二人素不相识，服在门外车上搬行李时，与别人透露自己准备好了《春秋传》的注解材料，可望近日出书，郑玄听后，感到服生与自己的注述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知道自己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经学家，在重名声、重家法的东汉末年，若同时出书，服生这本势必遭到扼杀的命运。他沉思良久，一种扶持晚辈的激情促使他作出了大胆的抉择，将自己研究的成果无偿赠予服生。

服生恭恭敬敬地接过余温尚存的“无价之宝”，心里热乎乎，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三、坐无常师，集学一身

求知问学不讲师承，唯真是举，讲求道奥，着眼宏

观；走笔行文，思维求新，简捷明快，方法先进，把握全局，这大概是郑玄不同于一般经注学者的性格特征。例如他在举办教育方面，尤为擅长用古代的典章制度对经文中的典章制度进行类比，详加考异、溯源。他的注经中，大都充融着儒家学说的论点，活脱脱就是孔子的口气。在注释今古文经中，贯穿了自然运行法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一永恒的主题，丰富和发展了荀子的理论体系。又由于他通晓《九章算术》、《天文历法》，明推理，擅演算，其《乾象历注》、《易通卦验注》等书，注释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先进性，可又是对黄老之术的继承与发展。总之，郑玄注经，善于容纳众家于一身，实乃古今第一人。

四、严格家学、畜亦能书

郑玄不仅自己专心致学，还一心建立一个学问氛围很浓的文化家庭。《世记新语》载记：“郑康成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

《白香山诗注》有言专道：“郑康成家畜牛以角触墙成八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言不谬矣！

古祠遗风 精神千古

郑玄注经自成大家，颇负盛名，北海相孔融，敬慕其学问渊博，亲自吩咐高密知县为郑玄立一乡，名曰郑公乡，并在郑公乡广开门衢，其中一门，额题“通德门”，可容高车出入。东汉末年，又在郑公乡立郑公祠。

郑公祠经唐、清、民国三次整修。祠前有棵苍老挺拔的老柏，老干盘曲，状如虬龙，浩然矗立近两千年，相传系郑玄亲手栽植，后人曾咏赞此柏道：“露滴涛声韵，龙盘云色苍，树存人已远，凭吊坐清凉。”

祠后十五米为郑公墓，高六米。郑公死后，由河北元城运回山东，葬于剧东（今青州城东50里郑母店）。后因墓坏，归葬砺阜（即今高密郑公乡）。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使纪念这位著名经学家而建立的郑公祠不致颓废，中共高密县委、县政府从保护文物、崇尚先哲的大局考虑，作出了“抢救郑公祠”的决定。

游学、力田、注经立说构成郑玄一生生活的三部曲，他一生是贫困潦倒的一生，但又是淡名薄利，学识上极有造诣的一生。他对儒家经典一百多万字的注疏，其间虽不免有些封建糟粕，但为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学术史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和开拓性的奠基工作。综观中国文化史上许多问题，郑玄定则安，真可谓“风流千古”化及后人。

执掌美国设计斜拉桥牛耳的

桥梁专家邓文中博士

● 陈 浜



他把三十个寒暑 都献给了桥梁

邓文中博士出席国内桥梁工程或学术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位早就蜚声国际的美籍华裔桥梁专家，正逐渐地为故土的同行们所称道。

冬春的纽约好天气不多，两次造访邓文中博士夫妇都是非阴即雨，路上还污雪不化，但是，一经见面，邓先生的卓越成就和人品便一扫阴霾。我们象是沐浴在暖阳中，心情无比地兴奋与开朗。

邓文中先生的办公室坐落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条普通小街上，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两层楼房。临街一间店面，玻璃大门上镶着英文的

“达士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达士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在北美声名赫赫。千余家同行中能作为其对手的不过十家，如就大型斜拉桥而言，它更是首屈一指。几年前它还应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要求，设计了着陆火星的减速器节点结构，这个高40米，能承受7倍地心引力。由宇航员在太空失重条件下单臂徒手组装的机械，将是人类登上火星的第一个工程结构。公司现在同时参与了15座大桥的建设，或设计或监造，或审核，或咨询，兼而有之。二、三十位来自美国各地和不同国家的专家和人员在此工作，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混合结构权威汉斯卡·瓦度博士就曾在公司任副总经理，可惜，他去年不幸去世

了。

邓先生的办公室紧挨着楼梯口，顺三面墙整齐地存放了一份份资料。大办公桌上，一台电脑，一台电话。周末无人，但电话仍不时铃响。邓先生常要中断同我们的交谈，轻声低语地就话筒和线路的另一端讨论问题。高背沙发后的右转角有一台立体声。上面的一只鹰塑，就是1991年美国预应力桥梁协会颁给他的“领袖奖”奖杯。

谈起个人成就，邓先生轻描淡写，言语木讷，完全不象讨论业务那样，娓娓道来，关照入微。邓文中博士是世界级桥梁专家，一介书生，谦谦君子，看似手无缚鸡之力，但他拿起那支细细的铅笔，落个小点就会有几吨重。他说一句话，很可能节约几百万美元的开支。知识就是力量，他的力量就在于他的渊博知识。

今年56岁的邓先生，1965年在德国达姆施达特工业大学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后，就环球造桥，从德国造到美国，又从美国造到世界各地。三十个寒暑，一万多天，他全献给了桥梁，前后总计造了一百多座桥，几乎一百天一座！这样的效率，这样的成就，全世界也实属罕见。

16年前，一位美国桥梁老前辈第一次同他见面。其时，邓先生已经参与了北美所有120米以上跨度混凝土大桥的设计工作，还担任了美洲最早四座蛋形污水箱的设计顾问。这位老前辈不相信眼前40岁的人就是邓文中。他说：“你建造了这么多的桥，我还以为你是八、九十岁的人呢！”他诙谐的话语里流露了对邓文中在建桥事业上的赞美。

桥是古文明的创造，也是新科学的结晶，几千年演变进化到今天，建桥的材料除钢材之外，还出

现了预应力混凝土这新一代的造桥材料；悬索桥之后，又有了斜拉桥这新一代的桥式或桥型；除开手绘手算，人们更运用电脑这新一代的工具来制图和分析，这些新技术，兴旺发达于近几十年，是当今桥梁工程的新潮流。邓文中先生的这一百多座大、中型桥梁，就融合了桥梁工程的所有这些新潮流、新技术。

他设计的桥梁有多少达到桥之“最”，他自己也说不清

如同登山英雄们乐于在险峰绝顶徜徉一样，邓文中也爱在桥梁工程的山尖遨游，三十年心血凝成的一百多座桥里有多少个桥之“最”，他自己也弄不清了。

我们随手捻来，就有：

——60年代末法国的杜塞尔多夫克尼桥和杜伊茨堡诺因汉普桥，先后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后者还是当时唯一全部用焊接法施工的大型桥梁；

——197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松谷桥是美国第一座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桥梁；

——1977年美国太平洋科罗林群岛的科罗尔—巴伯尔图阿普桥创造了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世界跨度记录；

——加拿大温哥华的安纳西斯桥创造了斜拉桥的世界跨度记录；

——1982年华盛顿州的西西雅图桥是世界跨度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水平开合桥；

——1983年北卡罗来纳州的林科桥是世界最复杂的悬臂施工桥；

——1983年香港的大埔环路

桥，是世界最复杂的顶推法施工桥；

——1988年佛罗里达州的但点桥是美国最大跨度的斜拉桥；

——1991年乔治亚州的谭美纪念桥是世界第一的通航高度大跨度海峡斜拉桥，世界上的任何巨轮都可以从这座桥下自由通过；

此外，还有正在建筑的德克萨斯州湾边镇桥，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斜拉桥；

拟建的马修斯桥，将是世界仅有的加拱改造桥……。

仅从这些跨度之“最”、高度之“最”、设计之“最”、工艺之“最”、施工之“最”，已经足以证明邓文中造桥生涯中不平凡的辉煌业绩了。

美国的第一座预应力混凝土大桥是他设计建造的

1968年，三十而立的邓文中从德国到美国施展抱负，入了美国籍，应聘为德国德威达格公司下属美国北美洲公司的总工程师。德威达格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公司，准备开拓北美的预应力混凝土市场。邓先生担起了这个公司的重任，开始了在美国的创业。

预应力混凝土是新一代建桥材料，和一般混凝土不同，浇筑预应力混凝土的时候，要对编扎其内的高强度钢筋预先加以拉伸，这样，成型后钢筋的回缩力就象木桶加箍一样，可以使混凝土更加“抱团”，又硬又韧，预应力混凝土的这一魅力使它广被运用，解决了二次大战之后，欧洲恢复中钢材奇缺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用预应力混凝土造桥比用钢材更为物美价廉便于维护，而且其浇筑也有了基本的工艺。

70年代初，欧洲已广泛流行预应力混凝土造桥的时候，美国百分之八十的桥梁还是使用钢材建的。当邓文中初来乍到美国，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作为建桥材料时，碰到了不少阻力。

美国的桥梁作为基础设施一般由政府出资兴建，官员们害怕冒创新的风险，同时，美国钢材又多，因此，当邓文中风尘仆仆在美国四处倡议预应力混凝土大桥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总是一句很简单的问话：“美国有这种大桥吗？”“没有！”“即然没有，就等以后有了再说。”他一次又一次碰壁。后来机会终于来了。197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局到欧洲考察后，决定用预应力混凝土建造大跨度的松谷桥。按照设计，位于热带圣迭戈市的松谷桥主跨约150米，高约120米。这就使施工遇到不少难题。松谷地方有许多热带植物要加意保护，公路局只给了三米宽的地面通道，施工场地非常狭窄，而且，谷两边山势陡峭，器材难运。工人上班需先坐履带车下到谷底，再爬到很高的桥墩上工作，一个单程就要45分钟，很费工时。承包商请邓文中帮助解决这个困难，邓文先经过仔细验证，大幅度地修改了原设计，决定采用节段灌注法。施工从桥头开始，筑成一段桥面后，再向前筑下一段，这样一节节推进，桥面就是施工现场，人员和器材运输用不着从谷底上下，既缩短了时间，又不会损伤地面的一草一木。这样，美国的第一座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在邓文中的监造下，又快又好又省地顺利建成了。

开始，承包商由于对邓文中不熟悉，加上采用新的施工方法，生怕失败，就要求邓文中所在的北美洲公司同他合资建桥，企图万一出事以此来分摊风险。谁知1974年

松谷桥如期完工，不仅质量高，还节省了一百多万美元资金。这时，所谓合资建桥已不是分摊风险而是分享奖励了。

松谷桥至今仍是美国最漂亮的大桥之一，邓文中借它迈出的是自己在美国创业的最漂亮的一步。

松谷桥成功之后，局面打开了，很多公司学会了建造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桥。从此，整个北美大地有了无数的大大小的这种桥梁。邓先生参与的各种大型预应力混凝土桥梁也一座座诞生。德威达格北美洲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随着桥梁工程的发展，美国桥梁界成立了由官方、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组成的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协会，以交流情况和协调关系。1991年协会选举了众望所归的邓文中先生担任协会的设计小组主席。

邓文中和他领导的 达士公司最值得自豪的 是对世界桥梁建设的贡献

美国政府规定，一座桥的设计和建造必须分开，不能同属一个公司。1978年，德威达格公司遂接受邓先生的建议，将桥梁设计划分出来，单独成立了达士公司，由邓文中领导。从此，他有了充分施展的独立基地。借助这一方空间，他谱写了一曲曲桥梁史上的凯歌。现在，经过邓先生的苦心经营，达士公司已成为他拥有全部股份，在香港、台湾、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城市设有总共七个分部、人才荟萃的国际性公司，其业务以桥梁的设计、研究和谘询为主，旁及其他的各类工程结构。

人们用桥、看桥，赞美大桥的

壮观实用，颂扬建设者的智慧宏图，但难得有人想过，这成千上万吨重的桥身，除了在地面打好桥基，筑好桥墩，最后架起桥身的路面的常规程序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去建桥呢？可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林科桥却反其道而行之，整个地是“悬空”施工，不着地面建造成的。

林科桥坐落在优美的国家公园内，全长约六百米，是一位法国工程师设计的。公园里土质疏松，有许多珍贵树林和奇山异石必须保护。大桥线路上更有一些长在石头上的植被，如遭破坏，要百年之久才能重新长成。因此，公路管理当局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要求建桥时不得“脚踏实地”地干，连桥墩也不能下到地面去做。这几乎是“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想象。

按照这位法国工程师设计的方案。关键是要购买当时是世界唯一的一台价值150万美元的法国起重机。由于价格昂贵，运输费时，邓先生没有要这台法国机械，而采用一台仅重20吨，价格不及20万美元的起重机来代替。1980年，这座预应力混凝土桥在邓文中的监造下从桥头开工，随着桥面在半空中一节节前伸，起重机也在桥端一步步前移，所有人员和器材设备都由这台起重机运送，建成的桥面成了施工现场。由于有精确的计算，凌空延伸几十米的起重机挥动自如，移过桥下的松软地面。到了设计的桥墩位置时，起重机伸出长臂精确的由上而下地进行挖坑、打桩、筑基、筑墩等动作，如同人用双手从桥上俯身做地面工作一样，毫不费事。

就邓文中而言，这杂技似的空中造桥并不是从林科桥开始，在林科桥之前的松谷桥和林科桥之后

的丹溪桥就都是采用类似的施工办法，只不过这几座桥的桥墩是在地上施工建筑的。建造林科桥时使邓文中真正顾虑的是建造过程中的“几何控制”。林科桥是使用预铸节块拼装方法建造的，就是先把桥身一节一节地在工场造好，运到工地后按照设计图样把它们拼装成桥身，蜿蜒向前伸展。由于架桥时方向常变，又不时起伏和高低有差，再加上桥面容易左右倾斜，这三维空间上的不断变化，就使得每一节段预应力混凝土的浇筑都必须计算和控制得非常精细准确，工作量之大难以言喻。但这困难终归也被邓文中克服了。

1983年林科桥建成，30座世界桥梁史上罕见的工程，为邓文中和他的达士公司赢了许多荣誉。

全世界大约有300座斜拉桥其中十分之一是他设计的

斜拉桥（学名斜张桥）1956年诞生于瑞典（德国公司设计和建造），发达于德国，粗浅地说，它由把越过桥墩上塔顶部的钢缆同桥身梁架直接锚固在一起而成。它集技术和艺术于一体，典雅、朴素、稳重，是二百米至九百米跨度的最经济桥式。

1965年博士生结业，邓先生担任了德国最大钢铁公司之一GHH公司的桥梁工程师，专门负责大跨度斜拉桥和吊桥的设计。其间最重要的业务，是代表公司参加了两座德国的也是世界当时跨度最大的斜拉桥的设计和施工。一座是杜塞尔多夫的克尼桥，一座是杜伊斯堡的诺因汉普桥。在邓先生厚厚的一大摞桥梁画片里，有许多斜拉桥的美丽身影。象谭美纪念桥、

弗拉瑟河桥、安纳西斯桥，等等。一个个千姿百态，衬托着山光水色，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为大自然涂抹上了一丝永不消逝的彩虹般的绚烂风光。

现在全世界大约有300座大斜拉桥分布在各地，而邓文中和达士公司参与设计建造的斜拉桥就有28座，占了将近十分之一。这28座斜拉桥中有14座在北美，占整个北美大跨度斜拉桥的三分之二，1981年开工的汉廷顿大桥是邓文中在北美设计的第一座斜拉桥。

一个三分之二，一个十分之一，这是以说明邓文中是北美斜拉桥的主将，是世界斜拉桥的主将之一。一位华裔执掌斜拉桥的牛耳，能不让地球上所有的中国人感到自豪！

邓文中有两项建造斜拉桥的重要经验。一是板式桥身。即桥身为板，轻薄易于施工，即保证质量，又降低成本，加快进度。二是拉索挂篮法。“拉索”是斜拉桥特有的构件。“挂篮”是浇筑桥身的工作台，悬空固定在已筑好的部分桥身的前端，以方便施工。在建造但点桥时，邓文中就是采用“拉索”吊住“挂篮”的远端，使原需重350吨的挂篮减为125吨，节省了大量费用。美国工程界特别赞扬这两项创造。

有人说：“要是真有奥林匹克桥梁赛的话，那先生该要拿多少块金牌呵！”

从一定意义讲，一座桥相当于一篇辉煌论文和一本科学巨著。邓文中先生亲手设计缔造的一百多座桥梁，就是桥梁科学宝库中丰富的宝藏。

邓文中先生除了他丰富的建桥经验以外，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同样也为世人瞩目。迄今为止，他问世的学术论文已有五十余篇，有趣的是七十年代初开始向国内介绍邓文中先生时，当时翻译出版他的两篇关于斜拉桥的学术论文把他的名字译成了“唐曼中”。“唐曼中”是“邓文中”三字按粤语语音译成英语，再从英语音译成汉语普通话造成的结果，所以有段时间“唐曼中”“邓文中”被国内桥梁界同行误认成是两个人了，其实，唐曼中其人就是邓文中先生。邓文中曾担任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的桥梁设计的指导老师。1986年起，他又应聘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土木系研究所高等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兼任教授，先后培养了一百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邓文中的学术活动遍布全球。前不久，他还主持了上海国际斜拉桥学术会议，发表了题为《斜拉桥四十年》的演说。

由于邓文中在斜拉桥实践中的成就和学术上的造诣，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于1989年推举邓文中担任斜拉桥小组主席。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著名学会，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列有专门条目，会员七、八万人。邓先生作为斜拉桥小组主席，特意邀请了九位丹麦、瑞士、法国、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世界级专家，其中有中国的李国豪教授、日本的伊藤先生、法国的施莱辛格先生。在邓先生主持下，小组制定了全世界第一部《斜拉桥规范》全面完整地提供了斜拉桥工程的科学准则。这对于斜拉桥在全世界的广泛建造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邓文中的成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这赞誉已不知

有多少了。

有人开玩笑地说：“要是有关奥林匹克桥梁赛的话，邓先生该要拿多少块金牌呵！”

1979年，美国《工程新闻》从全世界土木工程专家中遴选出邓文中为该年度“对工程界有贡献人物”。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国际性大奖舞台。

198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纽约分会授予他“年度土木工程师奖”。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纽约分会荟萃了很多工程界精英。每年评名额仅仅一人的“年度土木工程师奖”前后延续四十多年，获得这项殊荣的都是特别杰出的人物。象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两座450米高摩天大楼的设计师，主跨达1298.4米的纽约维拉扎诺跨海吊桥的设计师，都曾是这个奖的得主。邓文中的名字与他们并列，而且是四十多位得奖者中第一位东方人，回忆当时站在领奖台上的心情，邓文中说：“想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得奖，心情是非常激动的。”1991年，美国预应力桥梁协会又颁给邓文中该年度的“领袖奖”。表彰他“对开创预应力桥梁和发展斜拉桥所做的贡献”。这就是本文开头所交代的那尊摆在他办公室里的苍劲的鹰塑。

“我是牛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牛”何其多！这或许是中华民族特别幸运的地方。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身着西服，英语流利的邓文中先生突然愉快、风趣而又不无自慰、自豪地说：“我是牛命！”

“我是牛命”这句话概括了他的过去和未来。

邓文中祖籍广东肇庆，1938

年生，11岁时随兄到香港念书，家境拮据，只能就读职业学校。后以自学完成高中课程，考上珠海大学。但因无钱交费不能注册入校。亏得会计主任同情，指点他去考学校的孟氏奖学金。但考奖学金又必须先入学。在无可奈何之下，会计主任冒然作弊，先给了他一纸交费收据去注册，许他考到奖学金后再补交钱。他没有辜负好心的老师，不仅考得了奖学金，而且勤奋读书，成绩优良，从此开始了他的远大前程。这段几十年前有点“越轨”的往事，邓文中至今记忆犹新，说起来还依然从内心对这位主任恩师不胜感激！

邓文中毕业时得到了美国、西德四所著名大学的入学许可。他选择了给全额学费、生活费和旅费的德国达姆施达特大学，师从著名的土木工程教授、钢结构权威格里甫。当时，德国在东亚、南亚总共只选中七个学生，邓文中就是其中之一。

格里甫教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曾使许多人不敢求教。而邓文中从师以后，仅11个月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而且还额外地多学了起重机课程和计算机课程。计算机在60年代初还很稀罕，格里甫教授以其声望有了一台。邓便利用每星期五晚到星期一晨的两天周末休息时间到机房里学习，直到完全掌握这台计算机的使用方法。邓文中从学生时代起就培养成的这番如牛般的勤奋好学的精神，为他后来在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带来了无数倍的助益。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邓文中选的是桥，他爱桥。他视桥梁为子女，为生命。这不仅因为他有一种成就感。用他的话说是，看到一座座大桥天随人任意地建造好，横跨在大地上，那份内心的满足足以

使他忘却了一切。邓文中迷恋于造桥，还因为他十分欣赏和信从“修桥铺路积阴德”的古训。他几次向人谈到这条古训，他就是抱着这股对人们深藏心底的爱，尽管辛苦异常，总是乐此不疲。他说：“桥造好了大家都可以用，我就是喜欢造大家都都能用的东西。”“大家”就是他心中所想的人民大众。

邓文中先生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比别人多一倍，往往延至深夜。节假日和星期天一般也在工地和工作室度过。当年，邓文中和他夫人新婚不久，把家安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每晚邓太太等他回家有时要等到深夜。她特别害怕警察出现，因为那意味着可能出了事故。果然，有一晚警察深夜敲门，邓太太开门看见是警察几乎吓晕了过去。幸好是一场虚惊。后来，为了怕太太过于焦虑，邓文中有时只好把太太也接到工作室加班了，夫妻二人一处辛苦，倒也免了两厢牵挂。

商品社会物欲横流，名利薰心。但在邓文中几十年生活中，却“出污泥而不染”。他一次次地放弃高薪而选择了艰难的工作，1965年毕业后，没有去薪酬高的机关坐办公室，而是选择了待遇要少三分之一的GHH公司。GHH是一家大公司，有炼钢、加工、设计、施工和保养等一系列工程项目和业务，邓文中认为在这家公司工作可以充分地施展他的才华，又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移民美国之后，他进了德维达格，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邓先生认为：“工程师是喜欢做事的人，钱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

邓先生的专利很多，曾有人盗用他的专利，他一笑置之，没有去追索专利费。他说别人用我的方法造福于社会，不也很好吗？何苦去计较那几个钱呢？几十年来，他对

人总是以诚相待。凡业务上的求教他有问必答，自己再忙宁可另外加班加点，也要腾出时间来解答别人的疑难。

对于得奖，他很感谢社会给予他的鼓励。但他要求自己“造出桥来才是最重要的”。1989年授予他“年度工程师奖”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在旧金山开会。朋友们向他祝贺他还莫名其妙，后来经朋友解释之下，他才明白真情。奖，没有使他发狂，发昏，而是催他更加奋进。

他的淡泊于名利的高贵情操，还表现在他造桥决不空洞地追求“第一”、“之最”。例如跨度，它的价格的平方成正比。跨度大一倍，价格几乎变为四倍，但相应地却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邓文中设计桥的跨度时纯看工程需要。当然，桥不仅仅是交通设施，也可以成为旅游景点。如果达到“跨度第一”的标准，则可以吸引游客带来巨额的旅游收入，可邓文中认为跨度要根据工程需要，决不为争第一而第一。

70年代他修建了科罗尔——巴普尔图阿普大桥比同时建造的日本滨名大桥跨度仅大0.8米，夺得了当时的跨度世界冠军宝座。有人问邓先生，那里又不能发展旅游，这个第一是不是为出名有意去争的呢？邓先生笑着摇头。他说，科罗尔大桥连接两个小岛，位置偏僻，跨度的确定恰好是两岛之间的最短距离。这样，桥墩刚好在岸上，可以避免到水深流急又冷的海中作业。但建成后才知道它比滨名大桥的跨度多了0.8米，无意中夺得了“世界第一”。邓先生说，山出名不在高，水出名不在深，桥出名则不在大而在好用。没有需要而加大跨度争第一，属于“大而无当”。桥

是用纳税人的钱建造的，分文要有回报。

“五十而知天命”。邓先生已过五十，早知“天命”了。“天命”为何？他概括自己的体会，有二段精辟而被传颂的话：

其一：“干我这一行，很辛苦，但苦中有乐。入门并不难，但绝对没有捷径。要不怕吃苦，要坚持苦干，实干。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天天上班，从来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达十几小时。在同样的时间内，我要比别人多干一倍多的工作。这样，我工作了三十年多，就可具备和积累六十多年的丰富经验。”

其二：“想当初在德国，我是选中了工资少的公司去工作，去学习的。在德国设计大桥时，我就是住在大桥旁边。年青人不要向钱看，要选择可以学到最多东西的部门去学习，去工作。绝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往工资多的地方跑，坚持这一点，将来会使你受益无穷。”

邓先生的人生准则中贯穿了和渗透着中华民族绵沿了数千年的优透道德的精华。

“为中国真心建桥” 是他最大的心愿， 因为他有一颗中国心！

中国是邓先生的出生地，是他的根。中国的振兴使他真正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扬眉吐气，也使他看到了施展才能的新天地。

“为中国设计最伟大的桥梁”是邓先生的最大心愿。

这个心愿的强烈促使他频频回国，珍视每一个机会。他担任了上海南浦和杨浦两座桥的工程顾

问。基于内心的感情，邓先生对它们的每一张图纸都细心审阅，一线一点毫不含糊，他还几次现场察看，思考办法，他称赞这两座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现在它们都竣工通车了创下了斜拉桥的世界跨度新记录。它们是中国的骄傲。其中，也有邓文中的功劳，上海同行评价说：“邓先生对我们的帮助是无私的。”这段愉快的经历，他永远不忘。

现在，他是武汉长江二桥和安徽铜陵长江大桥的工程顾问。今年三月，珠海市又邀请他出席国际桥梁专家会议，论证零丁洋大桥的可行性和设计。这座桥长达几十公里，横跨零丁洋，是澳门—珠海—香港跨海大桥的中段。面对这么大的工程设想，尽管行期匆忙，他仍然尽可能地做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邓文中常常叹息中国的桥梁太少了，中国的桥梁工程技术人才也太少了。他希望为中国架设许多最新的桥梁，他希望为中国大量培养人才。他愿意大陆青年到达士公司边工作边提高后返回国效劳，他已经开始在中国内地办达士公司的分公司，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的桥梁事业作出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的知识和锤炼的精神，为它的子孙后代攀登与遨游现代文明的顶峰奠定了基础。邓文中先生的事绩给予我们的也正是这一启示。

中华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

（责任编辑 李南友）

历经沧桑的炎帝陵

——谈关于炎帝陵的知名度

● 罗炳生

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始祖，由于他们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为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炎帝的陵墓在湖南省酃县鹿原陂，黄帝的陵墓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一南一北，犹如两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

人们对始祖的祭拜一直是非常虔诚的。根据史料记载的民间传说，官方、民间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历朝历代四时俎豆馨香，祭拜者络绎不绝。朝廷明令修建古帝王陵庙者，见之于宋。据《宋史》载：“乾德四年冬十月癸亥，诏诸郡立古帝王庙，置户有差。”因而，宋乾德五年炎帝陵殿在湖南酃县鹿原陂屹立；乾德六年轩辕庙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落成。

此后，祭祀活动纳入国家议事日程。当时官方祭祀分大祭和时祭两种，时祭于春秋两季之仲月举行，由地方官员致祭。大祭即朝廷御祭，三年一举，由皇上钦遣四品以上官员代表自己谒陵祭拜。御祭告祭的名目有即位、靖边、平乱、万寿、立储、复储、庆丰、除灾……等，祭文铭刻于石，置於碑房。宋以后的元、明、清都有御祭，辛亥

革命后废除帝制，虽无御祭，但官方、民众的祭祀活动仍然盛行。

炎帝陵和黄帝陵虽然同是民族始祖之陵，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其知名度却有很大差异，特别是近代，很多人只知黄帝陵在陕西，而不知炎帝陵在湖南。

究竟原因在哪里呢？

我的看法是：

一、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历代王朝多建都于北方。诸如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距陕西中部的黄帝陵，不过百公里、数百公

里，而离远在湖南酃县的炎帝陵，却有两千公里之遥。何况它还地处偏僻山区，交通十分不便。虽然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建都于南方的杭州，明代开始也曾建都在长江之滨的南京，但是，不仅为时较短，而且相距炎帝陵也有千余公里之遥。可以想象，在古代交通工具只有轿马、车船的条件下，从京城到炎帝陵去祭拜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据清同治版酃县志载：宋太宗时，由于炎帝陵地势险峻，河流湍急，交通艰难，宋王朝御祭官乘船遇险后，曾将炎帝陵殿移至茶陵县



午门

城南郊，在那里举行官方的祭祀活动，其间一百余年。至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衢州守臣刘清之鉴于炎帝陵没有殿堂，反而保留唐代的佛寺，实属不伦不类，于是又上奏朝廷，移殿陵侧。孝宗诏许，炎帝陵殿才又在鹿原陂得以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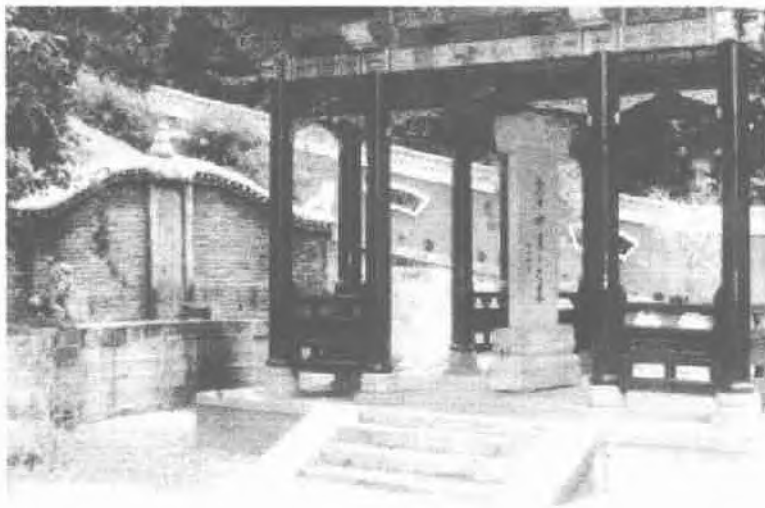
炎帝陵处于这样的历史和地位环境，又经过了这样一番周折，其知名度必然受到影响。

二、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载入抗日战争史册。

光阴荏苒，岁月进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黄帝陵附近的西安，发生了震撼中外的“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从而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又一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分别从西安和延安同时派出代表前往黄帝陵致祭。中国共产党方面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这次祭祀活动是结束满清政府的封建王朝以来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次。通过这次祭祀活动使全国人民进一步明了：我们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黄二帝；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样的一次大的祭祀活动，也使黄帝陵的知名度得到了又一次的提高。而湖南酃县当时处于抗战大后方，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蒋介石、毛泽东都不可能派人前来炎帝陵告祭。纵然在1940年10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对炎帝陵作了一次修葺，并举行了一次公祭，其规模、其影响当然远不及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对黄帝陵的公祭。

三、解放以后到文革时期的二十多年，炎帝陵遭受灾难性的破坏达4次之多。而据我们所知，黄帝陵却一直保护得较好，桥山上那郁郁葱葱的古柏，十年动乱期间也没



碑亭

有谁随意去折它一枝半椽。

1950年，是解放的第二个年头，解放了的人们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认识了很多事物，明白了很多道理，其中一个很大的道理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过去世代代穷苦的人们求祖宗庇护，祈神灵保佑没能得到，如今得到了。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在群众中展开，他们毁了祠堂里的灵位牌，砸了土地神，拆了福主庙。就在这个风头上，一些糊涂人闯入了炎帝陵，把炎帝神农氏的塑像推倒，丢进涿水河。他们不知道封建迷信与祭拜民族始祖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干下了这样一件大蠢事。

炎帝陵自宋初以来，官府就设置了守陵户，以接待敬祖的香客，维系陵殿的安全。守陵户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官府配置的田亩，佃户以偿租形式为守陵户提供粮食。可是，到了土改时期，这些田以无益公产的名目收归国有，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守陵户生计没有着落，炎帝陵只好听天由命。然而炎

帝神农氏毕竟是伟大的民族始祖，他教民耕种，发明医药，日中为市、治麻为布、削桐为琴、剡木为矢……为我们民族的文明进行了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开拓，人们是永远怀念他们。1954年除夕，子孙们为欢庆又一个半年，从四面八方前来拜谢始祖，香火缭绕。但因无守陵户照看，傍晚引发了一场大火，将行礼亭和主殿烧毁。炎陵山上因有民族始祖的陵墓，历代诏禁樵牧，所以古木参天，奇美挺秀，风景优雅，气候宜人，《炎陵志》上有“盛夏生寒”之载。但是，1958年“大跃进”，蛮干的大炼钢铁土法上马，为了伐木烧炭。几百人手持刀斧向炎陵山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不到一个月光景，郁郁苍苍的炎陵山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

1966年，中国进入“史无前例”时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闯将”们，连祖宗都不要了，炎帝陵的碑石文物自然逃脱不了“横扫”和“打倒”的厄运。等到“文革”收场，标志着民族文明的这一古建筑也差不多变成一片废墟。这又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啊！

历史终于翻出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成为大家的共识。参加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湖南代表团马安建等 23 位代表，代表着亿万炎黄子孙的迫切愿望，提出了修复炎帝陵的提案，198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出文物字（84）第 1519 号文，同意修复炎帝陵。1985 年 12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拨出修复专款，经过两年又四个月的施工，一座气势雄伟，工艺精湛，古色古香的炎帝陵殿，以它崭新的风貌再现在湖南酃县鹿原陔。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和支持炎帝陵修复工程。自 1986 年 4 月以来，胡耀邦、陈云、江泽民、周谷城、严济慈、赵朴初、周培源、杨

静仁、王首道等先后为炎帝陵题了词。海内外书画名人得知炎帝陵正在修复后，纷纷向炎帝陵赠送书法、绘画、诗词和楹联作品等。

炎帝殿修复竣工后，中央领导同志王任重、宋健、萧克等先后专程来到炎帝陵瞻仰。在台湾同胞得知炎帝陵修复竣工的消息后，台中县雾峰圣贤宫管理委员会主任林文卿先生，于 1991 年元月组团来炎帝陵寻根谒祖，虔诚地祭拜了炎帝神农氏，并将一尊炎帝神农氏全身木刻雕像恭迎到了台湾。此后，海外侨胞组团前来谒陵祭祖者连绵不断，至 1993 年 7 月，已有 19 次之多。

1992 年 11 月，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孙铁青、郑寿燮、罗哲文、庄敏等文物考古和古建筑方面的专家，到湖南酃县实地考察，有关部门批准，炎帝陵为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位得到确认。

更值得庆幸的是：93“炎黄杯”世界华人华侨龙舟赛于 1993 年 8 月 15 日分别在炎帝陵和黄帝陵取圣火，与此同时，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在炎帝陵主持公祭。1994 年经批准，湖南酃县更名为炎陵县。

这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炎帝陵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还可以告慰海内外朋友的是：在现代交通、通讯事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前往炎帝陵拜谒民族始祖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京广、浙赣复线的贯通，长沙黄花机场的建成，106 国道的拓宽，已经开通的炎陵县程控电话……为亿万炎黄子孙前来拜谒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责任编辑：洛松）

欢 迎 订 购

《炎黄春秋》学术增刊——《炎黄文化研究》

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炎黄春秋》杂志决定出版炎黄文化研究学术增刊。增刊编委会由著名学者戴逸、金冲及、冯其庸、张岂之、李学勤、姜义华等组成。主编李学勤，副主编王俊义等。

该刊辟有“文化研究专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中华文明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地域文化”、“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探索与争鸣”、“文化现象评析”、“学术动态与信息”等栏目，奉献给读者的将是各方面老中青专家学者最

新、最优秀的研究成果。

第一期主要作者有：萧克、张岱年、戴逸、李学勤、金冲及、张岂之、温济泽、马少波、丁守和、顾佩、龚书铎、廖盖隆、刘梦溪、张立文、钱逊、苏双碧、刘起釭、罗琨、李绍连、葛荣晋、黄宣民、丁伟志、龚忠武、王俊义。

第一期已于 1994 年 8 月出版，每本定价 7.50 元，购买者请将书款汇至：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 100802；联系人朗瑜；电话 6016633 转 227。

《世纪》杂志今年第2期发表了《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迷》一文（以下简称《揭》文）。《揭》文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以被弄得像真的一样，是1932年蒯世勋在翻译一本《中国的发展》中一段话时，“将 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译成了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蒯世勋是三十年代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馆成员，是一位对上海史造诣很深的学者……，《上海通志馆期刊》是上海史研究的权威性刊物，于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事被部分报刊转载，随之流传开来。《揭》文接着又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有些“老人确实看见过这牌子，但不是在解放前的外滩公园，而是解放后的博物馆里”（事实上，解放后博物馆从未展出过这块牌子——笔者）。因此

年6月的《晋源报》和《申报》均就此发表文章，对华人不得入园一事鸣不平：“华人独禁，不许一游……殊属不公”。

1881年4月6日，虹口医院恽凯军（译音）等8人想进公园，被门警阻挡，他们为此向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关，受外国驻沪领事团和驻华公使的监督）提出抗议。工部局秘书索尔本（R·T·Tharburn）复信说：“我要解释一下，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见工部局1881年年报）

1885年11月25日，陈泳南、吴虹玉（译音）等8人入园受阻，这些人因此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提出：“一切剥夺我们权利事件之发生，我们都表示反对。”工部局12月2日复信，“不准给予这项权利”（见工部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 马福龙
- 徐国梁
- 虞 骏

《揭》文作者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根本没有根据，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是“哗众取宠”，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有关报刊摘登了该文，由此引来了众多读者包括海外侨胞的议论，许多了解上海历史的读者致函报刊，对《揭》文作者轻率抹煞和曲解历史事实的作法提出批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真的是“没有根据”的故事吗？现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择要罗列于下，以就教于读者。

一、由来已久的不满和抗议

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正式公园，建于1868年。租界当局一开始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不准中国人入内，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878

局1885年年报）。

1886年7月下旬，又发生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颜永京等6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的事情（见《宋氏家族第一人》）。

在此期间，《申报》曾于1881年4月28日、29日、1885年12月8日、1888年9月21日、1889年8月11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华人被禁入园的不满：“名之曰公家花园……而其实乃系私家”，“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西人得以入园中，……而独于华人则严且厉禁不得拦入。”1909年1月27日，《申报》更于第四版的上方正中地位，刊载了一张大幅照片，并加大字标题：“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以示抗议。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书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1907年，清朝有位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中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花园，芳

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恃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1917年，民初有位姚公鹤，写了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闲话》史料笔记，提出“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问题，文中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绍西人公园（即外滩公园）时，几次版本在介绍公园概况后，都注明“华人不得入内”。

当时工部局公开的条文，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共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中，其中第1条“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4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的《公园规则》6条，其中第2条“狗与自行车不准入内”，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佣仆除外”。1917年9月在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其中第1条“公园只准外国人入内”，第4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二、中外人士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揭露与谴责

郭沫若在1923年8月28日夜所写的《月蚀》一文（见1923年9月2日《创造周报》第17号）中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蔡和森在1923年11月16日第46期《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孙中山1924年11月25日在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

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入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1925年7月2日《不列颠周报》（British Weekly）第299页上发表一名通讯员的私人信件，写道：“在上海的公园里有这样的通告‘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利于安宁。”当詹姆斯·A·希尔给《不列颠周报》去信否认这一告示时，有位中国读者K·K·W马上去信说：“我确证上面的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存在的”，还说：“希尔先生明知句子中‘华人’两字只是在最近欧战或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本埠华人社会的经久而强烈的反对，方才抹去的。”

1925年9月12日，美国迪尔伯恩出版公司编辑部W·K·卡梅伦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写信，说在美国报界和其他人士中，都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有过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而这种说话还“受到责难”。他要求总领事告诉事实真相（摘译自工部局档案）。

1929年7月15日，有位读者根据当时香港报纸上议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的告示牌问题，在《香港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在1916年亲眼目睹的措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长期以来，凡知道有这块告示牌的中国人都对之表示愤慨，这是合乎情理的。”《香港电讯报》编者A·希志斯将这份报纸转给了上海工部局。

1929年11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人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的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1930年美国埃德温·罗哲斯·恩布里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到那里去散步，除非这个中国人背着一个白人的皮包，或者用摇篮车推着一个白人的婴儿。你们都能记得这个极端的例子，上海动人的花园里一直竖立着一块告示牌，用显眼的文字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他后来在给美国宗教刊物《洗礼者》杂志编者的信中，又讲道：“我写的是若干人的说法（其中亦有传教士），他们证明他们亲眼目睹这块告示牌。”美国浸礼会A·泰

勒为此写信给上海工部局要求了解此事。

三、目睹者的陈述

目前尚健在的一位86岁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公园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补充道，这块牌子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

1989年10月6日，苏步青教授同复旦大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谈话，苏教授在谈话中讲道：“我是1919年到日本去留学的，至今已有70年了。我第一次路过上海时，外滩公园前面挂着一块牌子，我亲眼看到，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于1991年又对《上海园林》编辑部补充说，那年他是由温州经上海赴日本时，在外滩买船票，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有这块牌子。

陈岱孙教授1982年所写《往事偶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收入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岱孙文集》，讲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90年7月12日他又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一、这块牌子“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二、1920年，“即我初次见到这牌子后两年，我知道这牌子仍然‘健在’……。”

陈毅的兄长陈孟熙在回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

生于1903年的桂祖良，1926年曾在法租界工董局园林种植处工作，任一等秘书。他说，以前读书时，有次去虹口经过外滩公园门口，想进去看看，门卫不准进，指着一块木牌让他看，牌子上写着黑色的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园林局1991年5月15日访问记录）。

1960年，有位姓陆的（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老员工回忆：在他一、二十年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木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公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

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1960年为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调查记录）。

最近，日本《朝日新闻》也发表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文章，1994年5月4日“天声人语”专栏中介绍：“不少人来信说真的看到过，并记载有逗留及访问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军人、军队护士、学生、公司职员……说是在黄浦公园和法租界公园内看到，并一致描述为是在涂成白色的板上写的黑字。年长的女性在信中说，在日本人和欧美人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的中国女性可以带领主人的孩子自由出入公园，并在公园中游玩。这位写信人的双亲都曾上海居住过，此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人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一种特别罪恶感，但有时小姑娘却感到伤心，她们感到把人与狗等同起来，实是可怜’。”

最后，这里我们再摘引两则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章志书中的记载：

30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考证、分析上海的发展历史，在上海的一份夜报《大晚报》上辟了个“上海通”专版，专门刊载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在1935年6月10日第71期“黄浦滩专号”（一）上发表《外滩公园话旧》，在介绍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个公园的历史后，写道：“虽然地皮是中国官地，填土和造园的经费也出自中外居民所纳税捐，然而外滩公园跟以后所建的几个公园都不许华人入内，甚至园门口还挂着极侮辱华人的牌子，这些事，虽是健忘的人，也不至于已经忘掉了吧？”文章说：“直到1928年起，华人才可以到公共租界各公园去玩”。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专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寺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块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继之公园也藉着‘华人入公共场所，即折车驱鸟糟蹋地方’的原因，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的专用的禁地了。”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我们相信，本文引述的材料已经回答了《揭》文提出的问题。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上海街头万宝路洋烟的大广告

美国禁烟 何以生产不减
外销有方 大量倾销中国

“万宝路牛仔”攻入神州

● 叶维力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留美中国学者，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十多年，现执教于美国麻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她就美国在国内严厉反对吸烟，而在国外大力倾销香烟问题，写来一篇通讯，现刊载于下，以飨读者。

今年8月我从波士顿乘飞机去洛杉矶，一上飞机就得知在全部6小时左右的航程中，是不允许吸烟的。这对我这个不吸烟的人当然毫无问题，但我记起，至少在大约一年以前，飞这段路程仍是可以吸烟的。那时只有飞行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的才禁烟。看来，现在美国对吸烟者的限制是越来越严厉了。

今年以来，美国国内的反烟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大众媒介对烟草公司群起而攻之。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收视率极高的节目中尖锐地质问：“大烟草公司的高级主管们，做为推销死亡的商人，你们如

何每天早晨面对镜中的自己而心安理得？”著名的纽约时报周刊今年3月份采访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morris，美最大烟草公司，万宝路即为该公司产品）的几位高级主管，让他们回答这一问题。这些人当然用各种各样的遁词，为烟草业辩解。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做为菲利普·莫里斯的高级雇员，他们已变成该公司所生产的商品的化身，而丧失了承担个人道德责任的能力。类似这样的指责，近来层出不穷，说烟草公司在美国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丝毫也不夸张。

今年春天,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严禁在美国的学校和社区健康中心吸烟。最近,美众议院健康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更将禁烟的范围扩大到美国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预期这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在搬进白宫前,就宣布白宫为禁烟区。美国地方政府也开始对吸烟采取严厉措施。美全国50个州中,已有29个州宣布禁止在州内所有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吸烟。目前,已有3个州允许控告烟草公司,要求他们对治疗因吸烟所致疾病而花费的纳税人钱予以赔偿。很多私人企业,也纷纷禁烟。越来越多的餐馆不再设有吸烟区。麦当劳快餐店在美国国内数千家分店开始实行禁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抽烟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很多人不得不到室外吸烟。一次我经过一座办公楼,见到两三个人在门外抽烟。波士顿的冬天,十分寒冷。这几个吸烟人看见我,只有作苦笑状。为吸烟辩护者说,美国是自由国家,人们应有选择吸烟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Smoking)。一位由于吸烟而致喉癌的人反驳道,所谓选择的自由是烟草公司的狡辩。这位喉癌患者曾做过烟草公司的辩护律师。他说,我过去贪图财利为罪人讲话,现在得了病,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00年,美国吸烟人数将从现在的水平再下降15%,烟草公司在美国国内的赢利将大受损失。但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美国向海外输出的烟叶和香烟的总额从1986年的37亿美元猛增到1990年的110亿美元。以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为例,虽然他们美国分部的主管们目前是焦头烂额,苦于应付来自国内各界的压力,而这家大跨国公司海外部则财路通畅,业务蒸蒸日上。难怪该公司许多人认为,即使美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下降到零,他们仍拥有美国以外的“广大世界”。

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亚洲市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美国商业部对香烟专项的统计,在1993年,美国制造的香烟有44.4%输往东亚地区。另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亚洲市场在90年代的销售会上升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在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香烟销售额则像美国一样,也呈下降趋势。

今年5月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烟草业攻克东亚市场主要有两个手法:一是不惜重金大做特做广告;二是利用政治高压,迫使东亚国家对美国烟商开放市场。一家海外华文刊物的社评说,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出面支持美商的烟草出口。美国前副总统奎尔曾公开鼓吹,美国人现在吸烟少了,烟商应扩大出口。美国贸易代表组织(U·S·T·R·)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积极配合烟商们攻占东亚市场的行动。在东西方经济互动中,日本想出口汽车,台湾想出口电脑,泰国想出口珠宝,它们的主要目标都是美国市场。为此,亚洲人必须开放自己的市场,让美国的烟商发动广告战,刺激当地人民的吸烟欲望,增加美国香

烟的输入量。否则,美国将提高关税,阻止东亚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在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下,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对美国烟草和香烟的抵抗先后土崩瓦解。在1980年,日本还是一个禁止外国烟进口的国家。而现在,外国香烟(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美国香烟)已经占据了日本香烟市场的五分之一。韩国是1988年签署向美国开放本国烟卷市场的,仅仅一年,由于广告和各种烟草促销战,就使韩国男性青少年的吸烟率从1988年的18%上升为30%,女性青少年吸烟率从2%上升到9%。

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花上百亿美元开展戒烟和禁烟运动,与此同时,美国烟商却花费同样巨额的资金在东亚国家鼓励当地人口吸烟。烟草公司或是通过赞助体育比赛,或是在旅游、演唱和商品销售活动中挂出烟草公司的旗号或商标,千方百计扩大影响。面对亚洲吸烟人口的逐年增长,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Asia's having One Huge Nicotine Fit”(《尼古丁在亚洲大抽风》)的文章。文中引一位医生的讲话,说目前亚洲由于吸烟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将大大超过肺病、疟疾和爱滋病,但这一情况却完全被人们忽视了。

同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着重指出,美国烟商在成功地突进韩国、日本、台湾、泰国和菲律宾等地市场后,已将目标瞄准有12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我们中国的“烟文化”向来宽松。现在,只要看看充斥在大街小巷的摆满进口香烟烟摊,就明白外国烟草商、尤其是美国烟草商在中国是何等的成功。据报道,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已于1993年同中国国家烟草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在中国大陆生产该公司最著名的万宝路和其他名牌香烟。美国第二大烟草公司雷诺士公司(R. O. Reynolds)已先于80年代末期打入中国市场。最近以来,它一直在厦门市生产它的名牌香烟“骆驼”和“Wiuiston”。由于雷诺士公司与中国成立了一个叫做“中美烟草公司”的合资企业,它的产品就不再被认为是外国货了!现在,除了生产三种美国牌子的香烟,“中美烟草公司”的两种新产品都起了中国名字,一个叫“金桥”,一个叫“袈裟”。过去10年里,中国大陆的成年烟民人数以每年7%的速度递增。20岁以下的大陆男性中,吸烟人口高达70%。“骆驼”和“金桥”之类的香烟,对推动这种强劲的发展趋势显然“功不可灭”。

我最近回到北京,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烟摊,一盒万宝路买十二、三块人民币。这对依靠工资收入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显然是十分昂贵的。进口香烟的价钱一般都要高于国产烟。到底是什么因素驱使中国人掏钱去买这么贵的烟?我向一位吸烟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答是“拔份儿”,说的是北京土话,意思是提高身价。在时下崇尚洋货的世风中,洋烟是“洋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几年前,禁烟运动在美国尚未成气候的时候,在

我的印象中,美国所有的大型广告牌中,为数最多的是香烟广告。其中,万宝路牛仔最为人所熟知。这个骑在骏马上的美国西部牛仔,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英姿豪迈。整幅广告中,并不见有一根香烟。这恰恰是现代商业广告的特点:所推销的产品并不占据画面的主要位置,甚至完全不在画面内。取而代之的,是与产品毫不相关的形象,往往是俊男美女。消费者所看到的,是这种商品所代表的一种所谓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却得不到任何有关商品的知识。万宝路牛仔,大约是象征着美国男性无畏的开拓精神。这个形象,在50年代曾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战胜竞争对手,打开美国销售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40年后的今天,他在美国东土正面临着要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但在“广大的世界”则已成为世人熟知的第一广告形象。几年以前,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没有任何香烟广告牌。而现在,主要大街的路口,往往被万宝路、健牌等巨型广告招牌所占据。难怪纽约时报说,万宝路牛仔已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找到了比美国西部更绿的草原。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另一名牌产品,弗吉尼亚靛女,也是以形象著称。这个牌子的香烟,是专门向女性推销的,它的广告中的美女经常变幻衣饰,一次甚至穿起了中式女装。所不变的,一是模特儿总是身段苗条,以此迎合美国女人怕胖喜瘦的心理,二是该广告往往伴随着一行字:“You've come a long way, baby”(“宝贝儿,你有今天可不易。”)。在杂志上出现这个广告时,除了这行字,还附有一些所谓几十年前的黄旧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灰头土脸,整日价忙于家务。要吸烟只能偷偷摸摸,如被发现,则会遭到丈夫的追打斥责。这个广告明显地将吸烟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如今女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吸烟,这不是大大的进步吗?

目前,中国大陆女性吸烟者有3000多万,在城市青年女性中,吸烟人口呈上升趋势。这与进口女烟(摊上叫“坤烟”)打入中国市场,恐怕有直接关系。中国女同胞们,请千万警惕啊!在妇女解放这个问题上,我更崇敬前辈女性们在女子婚姻、就职、参政等各方面的贡献,而丝毫不以为吸烟与真正的妇女解放有任何关系。

显然,对于东亚和中国的众多吸烟者,洋烟代表了一种广义上的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以巨额的金钱为后盾的。如今,在中国的电视上已不允许播放香烟广告。近年来,美国各大烟草公司转向越来越频繁地赞助在中国举行的大型体育比赛来扩大影响。“健牌(Kent)国际台球精英赛”,“沙龙(Salem)职业网球公开赛”,“万宝路国际足球邀请赛”,不一而足。今年,最受球迷关注的中国大陆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是由菲利普·莫里斯亚洲集团赞助的,比赛因此被命名为“万宝路足球联赛”,来自美国西部的牛仔在中国真是风头正

健。

香烟对健康的危害,早已不是秘密。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调查,1989年中国大陆用于直接治疗吸烟致病的费用为69亿人民币,由吸烟所引起的劳动力损失为26亿人民币,吸烟引起的早逝损失为100亿人民币。三项费用加在一起,超过了当年国家烟草税利收入。另据今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吸烟与健康学术研究会披露,1992年中国大陆用于治疗吸烟所造成劳动力丧失及早逝等损失的总额高达409亿人民币,超过了当年国家烟草税收。专家预测,到2025年,中国大陆每年将有2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于公于私,于国家经济收入和于个人身体健康,吸烟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而我们国家吸烟之风正愈演愈烈。虽然有识之士在大声疾呼禁烟,有些机关单位也开始出现无烟办公室,但对于广大公众,有关吸烟危害的教育还须大大加强。我最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在我所看到的14份不同的卫生健康杂志中,只有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提到吸烟的害处。有关专家指出,大陆吸烟有三个趋势,女性吸烟者从秘密化向公开化发展,吸烟者的比重从老年化向青年化发展,吸烟的特点从消费化向奢侈化发展。进口香烟,特别是美国香烟,对这三种趋势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最近,一份在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由于看到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烟运动与美烟草商大举进攻中国市场的强烈反差,而大声疾呼,要国人警惕“另外一种形态的帝国主义”,即“烟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也罢,商业侵略也罢,事实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反烟运动与我们中国土地上的大众吸烟活动,确实有着一种奇怪的联系。他们吸的越少,我们抽的越多,而美国烟草公司老板们的腰包里越来越多地装着中国人的钱。因此,他们的腰包并未因美国国内市场萎缩而干瘪,而我们国民的体质则因洋烟进口而更加恶化。这种“经济互动”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种“国际接轨”只有越接越糟。中国进入现代国际商业领域,不应以国民体质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毒化为代价。对于我们有着鸦片战争记忆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道理是不难明白的。

(这篇文章的统计数字来自纽约时报 1994年5月15日的文章《Asia's Having One Huge Nicotine Fit》及中时周刊1994年7月3日-9日号文章《国际烟草大王联军进犯东亚》。其他有关材料来自纽约时报星期日周刊march20/94的文章《How do tobacco Executives live with themselves》及7月3日-9日中时周刊的社评。)

(责任编辑 王 恂)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今天的1994年，历史的巨轮滚动了一百圈。

在1994年的钟声即将叩响之日，我们三个年轻的海军新闻工作者，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我们的题目是：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

许多中国人说不清 什么是“甲午”

“甲午”是个啥？是个啥呢？是一团火，灼痛过中华民族的胸膛；是一块冰，冷却了东方古国走向海洋的梦。“甲午战争”，是中国海防藩篱尽失的开始，是中国海权丧失殆尽的开始，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而当我们在颐和园向一位30多岁的东北汉子采访时，他愣愣地反问：“‘甲午’是个啥？”这位佳木斯来的游客对我们的提问颇感奇怪，他说：现在都时兴公历了，连屯子里的庄稼人都不看黄历了，谁还算得清什么“甲午”？

林则徐一海军司令？从上海来北京游玩的林小姐仔细验过我们的记者证后，谈了她所知道的“甲午”。她说：“甲午战争我是晓得的了。好像上初中时学过吧？林则徐这个海军司令没当好，让日本人打沉了好多条船。不过他禁烟还是有功劳的。所以现在我一听到哪里哪里又贩卖鸦片的，就想起林则徐。”“感谢”那些贩毒者，他们使人们依稀记起了鸦片战争。而要等到什么危机降临，人们才会记起“甲午”？

生意人的历史观。“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国家的事说不清”。一位在颐和园北宫门外专卖各种纪念章的中年人说：“再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知道了也没有用。打仗，是当兵的事，做生意的就是多赚点少赔点。各摆各的摊，各干各

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

● 张剑

的活。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一位颇具风度的中年生意人说：“抱歉，我实在实在说不清，请您问我的秘书吧”。而那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掩口而笑，很优美巧妙地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100年，莫非真的已经太遥远了？发生在曾祖父那一辈的事，今天竟变得如此模糊。

我们采访过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的人，几乎所有的人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感到意外，十之六、七对甲午战争一无所知。那些略知一二的，也是靠了初级教育课本的朦胧记忆和电影电视中的零散印象。采访中，许多人反映：自离开学校之后，就很少再接触中国历史。同时，我们发现，对甲午战争的了解，年轻人比中老年人少，非军人比军人了解少，文化层次低的比文化层次高的少。更值得让人思索的是：一些本该对中华民族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却并不比别人懂得多。我们采访了13名教育工作者和17名机关干部，其中也有人说不清个所以然。

我们不禁想到：再过一百年，我们这一代也会成为曾祖父。那时，关于“甲午”这段民族屈辱的历史，我们的子孙还会知道多少呢？

在历史与现实的天平上

不能苛求每个中国人都成为历史学家，不能要求中国人时刻沉浸在对历史的沉思里。中国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

然而历史，应该有它的份量 and 位置。因为从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历史中，可以得知他们如何对待现实与未来。

遗憾的是在颐和园开往公主坟的374路公共汽车上，一位穿牛

仔服的北京小伙子这样嫁接了历史与现实，他说：“甲午战争？你说的是邓世昌吧？太知道了，电影上见过。不就是什么‘999胃泰’做广告那老头演的吗？那老头儿前几年挺火的，听说突然玩什么‘告别舞台’是钱赚足了吧？”

我们不得不钦佩小伙子的联想能力。同时，他推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很多同胞，关心的热点方圆半径不出视野，时限上下不出一年半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前，一个卖报纸的青年告诉我们：“甭说，只要有姜文、张艺谋、巩俐和马拉多纳，这报纸准能卖火。你们这些当记者的也真行。今天说巩俐把虎牙拔了，明天又说还没拔。要不就是泰森在美国一边蹲大狱一边玩女人。一天一个花样。我敢说：你要选与甲午战争，我这报纸可就卖不动了。”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清史研究所资料馆前，一位中年人说：“北京人要对甲午战争一点不知道，那是瞎话。可老琢磨它也不当吃不当喝。您问我们关心点什么？多啦，比如今年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啦，危旧房改造什么时候到我们胡同啦，我们不能不往这儿想。您得过日子，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种回答。在颐和园清晏舫，正碰上一个日本旅游团，这是个难得的采访机会。我们找到翻译说明想法，可把我们这位同胞吓坏了，连说：“别，别，别打扰外国人，人家可是来华投资的，影响不好。”

“痛心疾首”。用这个词形容中学教师张清彦此时的心情大概最准确了。这位教了三十多年历史的老师语气沉重地告诉我们：“人们越注重眼前利益，就会越远离历史。而一旦与历史隔绝，过去的辉煌就不再能唤起骄傲和自尊，往昔

的痛苦将不再能引发思索与感奋。这不是历史的悲哀，而是未来的危机。”

张清彦老师说到此，眼里充满泪光。

历史并没有走远

严冬的北京，残雪点点，寒风凛冽。我们裹着棉大衣来到北京东单北大街。这儿高楼林立，车流不息。不同肤色国籍的人驾着奔驰、林肯、皇冠、奥迪、凯迪拉克、劳斯莱斯，开进著名的五星级王府饭店。100年前，王府饭店后身的煤渣胡同也曾是车水马龙，因为大清国的海军事务衙门就建在这儿。我们访问了王府饭店花容月貌的礼仪小姐，访问了穿着皮尔卡丹进进出的旅客、访问了京腔京韵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们能说出王府饭店的各种特色服务，能说清北京所有星级以上宾馆的准确位置，却说不出脚下这块土地上曾有过什么。一位戴着老花镜摇着缝纫机修鞋的老人说：“这儿过去是海军衙门。可老房子都拆了，上哪找去呀！”

在颐和园宜宾馆——昔日皇后避暑下榻的地方。一张条案上放着只黄铜铸成的军舰模型，它和单瓶玉瓮摆在一起多少有些滑稽。我们在它面前伫立良久，猜不透它当年的主人把玩它时会有什么心境，也猜不透它要向今天的人们诉说什么。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四楼，静悄悄的展厅里是中国近代战争馆。那里黄海海战半景画生动逼真，“致远”舰的水兵保持着100年前装填炮弹的姿势。可很多北京人不知道这儿还站立着一页历史，来军博的人们似乎更注意那个热闹的挂历展厅。

历史似乎真的已经远去了。

历史真的远去吗？

让我们重新回到历史的本真上吧。我们曾藉一壶清茶，与几位研究清史、海军史的专家座谈。我们谈到清政府的腐败，谈到庞大的北洋水师遽尔覆灭的战争进程，谈到日本马关清风楼下的屈辱，谈到甲午战争后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同时，一个严肃的问题被提到我们面前。那就是：究竟什么东西促使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这19世纪最大的海战？

答案是：海洋。

专家们指出：100年前，海洋问题以从未有过的尖锐程度浮出亚洲的海面。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力图摆脱地域狭小，资源贫乏的困境，和英、俄、法、德等老牌殖民主义争夺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日本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了海洋。而欲达到向海外扩张的目的，必先征服中国，必先击败北洋海军，夺得东北地区的制海权。于是，甲午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败于甲午，失去的不只是台湾和辽东，更重要的是丧失了海洋、丧失了海权、丧失了走向世界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历史转了一个大圈，100年后的今天，亚细亚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海洋上。

据介绍，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陆地资源的匮乏日益成为尖锐的矛盾。经济战略学家预测，随着下一世纪钟声的敲响，亚洲的海洋将不断“升温”，直至“开锅”。仅以能源为例，目前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环太平洋的国家50%的石油依赖进口。到2000年，亚洲的石油日消耗量比现在还需增加700万桶。而本地目前的石油产量只能满足三分之一。人们不得不向海洋要能源。到2000年，中国石油日进口量将达100万桶。我们必须从海

上“捞出”700—1000万吨的原油，50—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确定的“八五”计划和今后7年的发展目标中，必须有10个海上油田和2个海上气田陆续投产，否则，能源的紧缺不但会使王府饭店前的奔驰和凯迪拉克因为缺油而“趴窝”，而且将拖住中国四化建设的后腿。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能源危机同样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海洋之争、海洋权益之争，将是必然的。当然，这种争夺不一定会再以“甲午”的形式重现，但争夺本身无可避免。

更何况，海洋上的斗争还不仅仅表现在一个能源问题上。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电力资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毫不夸张地

说，海洋问题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如果我们忙碌于吃喝穿住的同胞们仍然认为这些与他面对的温饱问题十分遥远，那么我们可以举出下面的数据。据统计：到1990年，我国水产品的年人均消耗量为6.5公斤，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还低2.3公斤！由于鱼类资源的短缺，大、小黄鱼的价格竟比60年代上升了200倍。问题具体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还能不发人深省吗？

如果我们再不懂得珍惜历史，不懂得从重温历史中认识现实，更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建立起全民族强烈的海洋意识，不久的将来，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也许就见不到“海鲜火锅”的牌匾了。而在这

即将到来的海洋斗争中，中国失去的远远不只是“海鲜火锅”，我们失去的将是民族发展的未来。

1894—1994，历史并没有走远，它在这100年的一头一尾，向中国人提出了几乎同样的问题，而中国人决不能给历史以几乎同样的回答。

记住“甲午”，就是记住我们民族丧失海权的教训；记住“甲午”，就是要唤起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精神、唤起爱国主义、唤起全民族的海洋意识；记住“甲午”，就是要以清醒的意识去迎接海洋世纪的挑战。

历史，它的的确确没有走远。

中国人：你还能忘记“甲午”吗？

欢迎订阅《海内与海外》杂志

《海内与海外》杂志是中国侨联主办的综合性月刊。是中国侨界首家中央级刊物。辟有“中华大地”、“大千世界”、“明星列传”、“走向世界的侨乡”、“四海采风”、“世界大都会”、“世界广角”、“社会长镜头”、“法律经纬”、“游子笔痕”等栏目，集新闻性、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于一体。自创刊以来，以其鲜明的个性、特有的“侨”味儿、云诡波谲的世界风云和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厚爱，订阅者日见增多。

在每一个年度里，《海内与海外》杂志将愈发突出“侨”字特色，革新栏目，充实内容，增加彩页，美化版面，以新颖独到的风貌和一流的编辑水平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本刊为64页，4印张，每期3.6元，全年定价43.20元（其中包括全年邮寄包装费4.8元）。

我们热忱希望统战部门、民主党派、大专院校和文化领域的单位及个人踊跃订阅。本刊除通过邮局订阅外还自办发行（注意邮局定期发行的报刊征订目录）。本刊邮发代号为82—496。

地址：北京市北新桥三条4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发行部

开户行：北京市工商银行北新桥分理处

帐号：144540—96

朋友，一本《海内与海外》杂志在手，洞悉世界风云不犯愁！

汪伪特务头子

李士群

是怎样被毒杀的

● 黄国平

“李士群死了！”

“李士群被日本主子毒杀了！”

“该死，该死！”

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汪伪江苏省主席、汪伪上海极司非尔路 76 号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死亡的消息被当作一个喜讯，从苏州城传到上海、南京，传遍沦陷区的每一个角落。

时间是 1943 年 9 月，这是主子杀死奴才的一桩公案，也是汉奸走狗之间勾心斗角的丑剧，其中还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精心安排。

冈村的热情邀请

1943 年 9 月 7 日，夜幕还未降临，李士群办完公事匆匆赶回住所，准备设宴招待刚从南京到上海的老朋友、汪伪司法部次长汪曼云。只见桌上放着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中佐的大红请帖，邀请他到冈村寓所吃饭，说是有要事相商。

对于主子之邀，李士群是不敢推辞的，况且他们之间平时又是极好的朋友，从面子上说，也不能不去。但是他早已从汪曼云等人那里得到过忠告：“日本人准备对你下手了！”所以他格外小心。

汪曼云还没有到来，李士群对老婆交待几句，让汪稍候，他很快就回来。接着就钻进了自己的防弹车，带着几个忠实保镖，急急向冈村寓所驶去。

同时被邀的还有汉奸熊剑东。熊原是军统头子康泽手下的一名干将，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是李士

群将他保释，并让他组织汉奸武装黄卫军。在大汉奸周佛海与李士群矛盾深化时，熊却站到了周的一边，担任了与李士群争武装的税警团总副队长，从而李与熊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到了互相仇视的地步。

熊剑东早在一小时以前已经到来，这天，为了不引人注目，他特意将平时坐的乳白色小汽车换了一辆黑色的，还带着自己的老婆，以防引起李士群的怀疑，因为他和冈村一起在执行着一个谋杀李士群的计划。他在执行着国民党军统方面的指令，这一点冈村并不知道，冈村只是执行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他们是不谋而合。

李士群坐着他的防弹车，驶进了冈村的公馆，几个保镖安排在楼下，并向他们作了交代，“如果两个小时我还未出来，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你们就冲上去！”保镖们虽然感到问题没那么严重，但还是严阵以待，以防万一。

冈村的家宴是借着调整李士群和熊剑东关系的名义安排的，熊剑东则以客人的地位与他密切配合。李士群虽有警惕，但却无法预料谋杀已作了周密的安排。

殷勤的招待

“李部长到！”日本宪兵高声喊道。尽管李士群此时已被削去警政部长的职务，只有江苏省主席兼特工总部主任之职，但他总不肯放弃部长的称呼，因此，人们还以部长称之，而不称他省主席。

“欢迎！欢迎！”冈村满面笑容到门口迎接，后面跟

着熊剑东和夫人，也是满脸堆笑。

“您太客气了，冈村先生！”李士群大步向前和冈村紧紧握手，又拉了拉熊的手，就步入了客厅。

丰盛的酒席已经摆好，除了日本菜肴，还有中国大菜，白兰地、威士忌、冷水摆得满满的。李士群对这丰盛的酒席，虽已垂涎三尺，但他却没有动筷子，他不知道平时很抠门的冈村为什么今天如此破费。更使他怀疑的是视己为仇敌的熊剑东今天为什么如此殷勤。

“吃菜！”冈村劝着，并亲自为李挟菜。

“我今天肚子不舒服，请原谅！”李士群推托着，在实在推不过去时，他看着冈村吃什么，自己也稍稍来一点，酒是从一个瓶子里倒出来的，但他怕杯子有问题，一口没喝。

“李阁下和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冈村把话引入正题，“你们都是有为的青年，大家正可以为国家和‘大东亚’做许多事，前途无量啊！”冈村咕咚喝了半杯白兰地，接着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为了部下的事发生了误会，真是太遗憾了。为了国家和大东亚，我今天略备薄酒，为两位和解。来，来，来！让我们为了友谊干一杯！”他一仰脖子，酒下肚了。

熊剑东也举杯一饮而尽。

李士群借口闹肚子，只是把杯举了举，没有动一口。但他却向熊表示抱歉。

熊剑东看到李士群显得诚恳，赶忙站起来，抖动着那超级的肥躯，迷起两只眼说：“今天的会见，我们俩应深深地感谢冈村科长的深情厚意。没有他今天的邀请，我们之间的误会是无法消除的。我是一个军人，是个粗坯，但也是一个直爽的人，我们现在既一言释嫌，化敌为友，有些我个人的打算还没向人吐露过，今天对李先生说说……”。

谈话似乎越来越投机。李士群似乎感到他们今天并非鸿门宴，冈村的肺腑之言，熊剑东的一番表白，使李士群觉得冈村的确是在调解，而且前嫌已释。他决计把熊拉到自己的手下。便对熊说：“我们既做了好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不知你的大计可以向兄弟透露不？”

熊剑东“真诚”地说：“现在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可相告的呢？我环顾我们的和平地区，唯浙东是个软档，我想开辟浙东，再图发展……”。

“好！”李士群说：“不知剑东兄有什么困难？”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经济……”。

“不知需要多少？”

“五百万！”

“好！”李士群慷慨地说：“我送你一千万！”

冈村和熊剑东似乎为李士群的慷慨惊呆了，两人

不约而同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紧紧地握住李士群的手。熊说：“李先生，我一生没见过象你这么豪爽的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为我们安排这么一次会见，我几乎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说了，惭愧！惭愧！”

冈村说：“你们俩都是年轻有为，我向你们祝贺！”

时间已过2小时，李士群怕自己的保镖们冲上来，赶快暂时离席，去布置一番，表示自己是安全的。他有点得意洋洋，认为自己花大钱终于将熊剑东俘虏过来了。

撤去酒席，一个女郎端上来四杯冰淇淋。冈村说：“这是我的如夫人，新从日本来。她仰慕李先生是个英雄，特地配制了四客奶油冰淇淋，请尝一尝！”女郎首先向李送来一碟。

李士群又警惕起来，连忙说：“谢谢，我实在身体不适，不宜进冷食！”并看着冈村和熊剑东。

熊和冈村都拿过一杯，并给熊剑东夫人一杯，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吃一边夸好手艺。

女郎没有走，站在一边用日语嘀咕着。冈村说：“李先生，我的如夫人说，您不尝尝他的手艺，感到很难过，您看……”。

李士群也许出于礼貌，也许看到其他三位都吃了，他终于端起碟子，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又放下了。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并对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全部吃下去表示遗憾。

看到李尝了冰淇淋，女郎笑咪咪地说了一声：“谢谢！”就闪到里屋去了。

一命归天

冈村家宴在最后一道冷食过后，李士群因汪曼云还在家中等他而首先离席，冈村和熊剑东热情地送到门口，看着李士群上车，直到驶出大门。李士群的保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李士群回到愚园路寓所已经快10点了，汪曼云还在等他

“对不起，对不起！”李士群一边向汪表示歉意，一边赶忙向厕所跑去。他不是去解手，而是去抠喉咙，想把冈村家吃的东西全吐出来，因为他疑虑未消。吐了一番以后，才陪着汪曼云到客厅吃饭。

他以为危险已经过去，兴致勃勃，一边喝酒，一边向汪曼云讲述和熊剑东释疑的经过，他洋洋得意地说：“我非常高兴，熊剑东被我用钞票打倒了，做了我的俘虏了……。”他滔滔不绝地说着，酒一杯一杯地下肚，看来他实在饿坏了。

酒后，李又约汪密谈，通宵达旦地商谈着野心勃勃的计划……。

当他第二天回苏州时，下午就开始上吐下泻不止，送到医院急救，已经晚了。他浑身收缩，抽得象个猴子。临死前，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我……悔不该不听汪曼云的。”

原来，冈村“如夫人”端出来的冰淇淋，在李士群的一碟中放入了一种日本制造的阿米巴病菌。据说这是从患霍乱的老鼠屎中提起培植的，只要吃进一点点，一分钟扩大一倍，三十六小时后，就到了饱和点，症状突发，也就无法医治了。李士群虽然已将食物吐出，但细菌是无法吐尽的。

一个忠心耿耿为日寇和汪伪政权效劳的奴才终于死了。他虽死于日寇和国民党军统之手，但就其祸国殃民的罪恶来说，的确是死有余辜，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日寇的魔窟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马列主义。1932年被中统逮捕，从而叛变了革命。在日寇大肆侵华之后，李士群又从中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到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的建立，李士群的汉奸特务生涯到了顶点。

极司非而路76号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别墅。上海沦陷后，陈逃亡香港，这所别墅也落入日寇手中，后来就拨给汪伪特务机关，这里也就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魔窟”。

这所花园洋房，经李士群一伙精心装修，在二门口挂上了“天下为公”的匾额，装成“和平民主”的景象。但就在两则，却露出阴森森的两个枪眼。在大院里，有特务头子的办公室，还有特务们的“营房”，更有残害生灵的看守所，刑具五花八门摆在一旁，凡是被抓进76号的人，都得脱一层皮，最后要么和他们同流合污，要么脑袋搬家。

就在这里，多少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被抓进来，最后大多成了汪伪特务的骨干，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也有少数不肯就范的，都被秘密送往断头台。

就在这里，又有多少革命志士和抗日英雄，被他们折磨得皮破肉烂，最后不是被活埋，就是被偷偷枪决。

进出这里的大小特务，依仗日寇后台的势力，横行霸道，人人望之生畏，把这个地方称之为“魔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残害革命志士

上海有一家《大美晚报》，在汪伪汉奸横行，国民党一些要员纷纷投入汪精卫伪政权之际，出于爱国之情，不断向那些要人发起抨击，有的被骂得得体无完肤。汪伪76号头子丁默邦、李士群派人去疏通，但该报照骂不误。丁、李立即使出特务的流氓手段，派出一个行动队去砸晚报社。当他们来到报馆后，毫无目标地乱开枪，手榴弹到处扔，排字架全部推翻，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工人被打得浑身是伤。

事情并未完结，晚报照骂依旧，而且比遭砸前骂得更凶。李士群一伙终于对报馆的负责人下毒手了。他们首先派人打死副刊编辑朱愷公，又给总经理李骏英和总编辑张似旭寄去一封恐吓信和两粒子弹，要他们将投稿人的姓名、地址告诉76号特工总部。《大美晚报》把这些特务行动都在报上公开地加以答复、断然拒绝了特务机关的要求。几天以后，汪伪76号就派人将张似旭和李骏英暗杀了。

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是汪伪76号的主要职业之一，如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共产党员茅丽瑛，接受党的指示，发起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救济难民和支授新四军。当特务们侦知茅是共产党员后，立即组织进行破坏，于1939年12月12日晚将茅打伤。这是一种毒药浸过的弹头，隔了两天，茅丽瑛就不幸去世了。这是李士群又一条人命血债。被杀害的共产党人何止一个芳丽瑛。

大搞绑票勾当

李士群不仅是个汉奸特务，而且对钱财也贪得无厌。因此不仅捕杀进步人士，为了钱财也干着绑票一类伤天害理的事。

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是个化学家，因经营三星蚊香和三星牙膏发了财。于是李士群给方戴了一项“与重庆有关”的帽子，决计将方绑架。

1940年初，正当方走出新加坡路10号家门口不远时，预先埋伏在附近的76号特务一拥而上，方一面挣扎，一面呼救。特务的枪响了，方受了重伤，终于被绑上汽车。

在76号，特务们硬是要方承认与重庆有关，并要他写信给家里派人谈判，遭到严词拒绝。

方已流血太多，几乎不省人事，但皮鞭还是噼噼啪啪地抽来，终于在严刑中死去。

方的家属经过多方打听，才知方已被76号抓去。于是到处求人，但李士群因方已死，感到无法交待，死不承认，只是让人告诉方的尸体放在殡仪馆。方家化了二十多万块钱才领回尸体。

被绑票的岂止方液仙一人，只要被李士群一伙看中，难免到76号受一通皮肉之苦，然后花上巨款才能获释。

银行惨案

1941年1月6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储备券”，接着又在上海设立分行，并依靠76号力量强行要其他银行接收。

国民党军统为了保护国民党各银行和法币利益，曾于1941年2月对上海储备分行进行袭击。于是，76号头子李士群，接受了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指示，对国民党设在跑狗场内的中央银行进行报复，在中央银行放了两颗定时炸弹，爆炸后，使多人受伤。

接着，76号警卫队长吴喜宝又袭击了江苏农民银行，炸伤2人。晚上，李士群亲自出发，率领大批特务，将中行宿舍层层包围，抓走6个高级职员，枪毙了2人，并将中行职员全部赶出宿舍，接收了中行宿舍。

更为残忍的是，李士群于一天晚上，命特务将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包围，将职员一个个驱赶到楼下，20多人排上一排，用机枪一阵扫射，全部杀死，造成了一场大惨案。

李士群作为日寇的鹰犬，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戴笠的指示

李士群的横行，已为国人所不容。对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来说，虽然想和日寇妥协，但直接危害着军统利益的李士群，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军统头子戴笠决心要除掉这个敌手。

1943年初夏，国民党军统上海站长长程克祥从秘密电台中，接到军统头子戴笠的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也许人们奇怪，戴笠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让与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商量呢？这要从周佛海脚踏两只船说起。

自北伐前后，蒋介石对周佛海曾寄以信任和重任，曾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曾任

南京政府江苏教育厅长。在周佛海投敌，与汪精卫同流合污以后，仍感激蒋介石的栽培，总想和重庆政府继续拉一些关系，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事有凑巧，军统上海站被日本宪兵队破获，站长程克祥、副站长彭寿被捕，而这两位均已打入汉奸组织内部，在汪伪政权内部任职，一个是伪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一个是伪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们利用秘密电台，向重庆提供日伪活动的情报。

程、彭被捕后，周佛海赶忙以伪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向日方保释了他们，从而打开了周佛海通向重庆之路。

1942年11月，程克祥、彭寿带着周佛海的“忏悔”信，在周派人护送下，离开上海，到达重庆，向戴笠汇报。这次表示愿意“忏悔”的除周佛海外，还有大汉奸罗君强、丁默顿、熊剑东等。

戴笠喜出望外，请示蒋介石后，蒋也很满意，因为正合他“曲线救国”路线。立即批准周等在沦陷区“带罪立功”。

当程、彭带着戴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周佛海立即给了程一个伪财政部秘书的名义，并给了一本空白支票，任其支用活动经费。

日本特务立即侦知了程、彭的活动，但是此时的日本正陷于太平洋战争后的泥潭，很想和重庆拉拉关系，故意采取不多加干涉的态度，也就使周佛海有了“立功”的机会。

当程克祥把从秘密电台接到的戴笠勒去李士群的指示送到湖南路的周佛海公馆时，周佛海真是喜出望外。这不仅是他得到了“立功”机会，更重要的是他总算可以除去一个政敌了。

周佛海砍除政敌

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是仅次于汪精卫的人物，他不仅集中金融、财政大权于一身，而且作为汪伪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使76号特工总部成了他的下属机构。他还兼着警政部长的职务。

李士群是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又是警政部的次长。由于他有着76号的本钱，周对他的确是另眼看待。李士群也自持有本钱，并不把周放在眼里。警政部除了主任秘书杨树屏是周佛海的亲信外，其余人员几乎都是李士群的心腹。因此，周佛海这个警政部长只是个空架子。

周佛海野心勃勃，和汪精卫是貌合神离，总想有一天取而代之，因而和李士群日益接近。于是和汪曼云、

李士群等 11 人结成把兄弟。就在他们结成把兄弟的酒宴上，周佛海把警政部长的职位让给了李士群。

李士群的警政部长的职位很快得到汪精卫的批准。周佛海便推荐杨树屏任常务次长，他以为，你李士群这个警政部长是我让给你的，我推荐个常务次长，你大概不好意思推辞。

谁知李士群并没有给周佛海这个面子，他对人说：“周佛海不漂亮，他既然把警政部长让给我，为什么又给我推荐常务次长，这无疑是在送给我一只蹄膀，又挖去一块肉！”他给周佛海打了回票。这对周佛海来说，简直是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

更使周佛海愤恨的是，李士群竟不顾当年和自己的协议，起用了“谁都不起用”的唐惠民任警政部常务次长。周佛海对这位换帖兄弟真是恨得咬牙切齿！

李士群到南京的派头也引起了周佛海的妒恨。李升任警政部长后，把南京的一大肥缺首都警察厅长之职给了苏成德。苏也是共产党的叛徒，当上警察厅长之后，对李士群极尽谄媚之能事，每当李来往南京时，苏总是开着几卡车警察来撑号，劈刀列队迎送，其排场超过汪精卫。

有一次，周佛海夫妇与李士群同车到达南京，苏照常开几卡车警察去迎接李士群。当他们下车时，一声口令“举枪立正！”。周佛海连忙拿下头上呢帽，点头示意。周的老婆连忙拉了一下周的衣袖说：“关你什么事，人家是来迎接自己的部长的！”周佛海立即收了笑容，他的心如刀绞，他决心要除了这个劲敌。

戴笠的秘密指示，终于给周佛海带来机会。就在接到指示的当晚，周佛海找来李士群的仇敌罗君强、熊剑东，进行了紧急会商。决定由罗、熊二人来执行。

为了不得罪日本人，他们决定采取先离间日本人与李士群的关系，来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他们作了精心的安排。

日本人的打算

其实，日本人根本不用周佛海一伙离间，他们也正在酝酿杀死李士群，而且想借用汉奸头目内部的矛盾来解决。

日本人想除掉李士群，并不是李在为日寇效劳方面不够卖劲，也不是李和日寇那个私人之间有矛盾，实在是嫌李士群尾大不掉而已。特别是目前太平洋战争失利，有意利用重庆政府之际，杀一个李士群以讨好重庆政府是太简单不过的了。

罗君强、熊剑东不断搜集李士群“仇视日本人的情

报，并源源不断地送到日宪兵队特高科冈村中佐那里：

李士群的清乡队不听日军指挥……

李士群的清乡队借日本皇军名义抢劫……

李士群利用清乡地区物资转移（日伪双方有协议，战略物资如粮食等严禁私动，李事前知道这消息，利用特务与行政力量抑价收购囤积，于命令发布前运来运去，乘机赚钱），发了大财……

李士群包庇国民党军统余××……

这些消息无疑给日本人杀李士群添了催化剂。由熊剑东找冈村商议，终于定下了谋杀的计谋。

军统的女特工人员装成冈村的如夫人，调配了特殊的冰淇淋，等冈村宴会快结束时，让李士群上钩。

李士群虽然有着特务的警觉，但终于上了钩。

死后的闹剧

李士群死了。他的亲信和老婆向汪精卫提出了四条要求：1. 要为李士群“国葬”；2. 要汪派代表致祭；3. 要汪给一件纪念品殉葬；4. 要汪亲题墓碑。

除了第一条，汪精卫说是已提请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为公葬外，其他三条全部答应。缩成猴子一样的李士群尸体被装在一口大楠木棺材中，日寇们也纷纷来吊念，李士群的喽罗们蜂拥而来，好不热闹……

李士群被埋在上海万国公墓。人死了，有关日本人谋杀李士群的传说即传遍街头巷尾，也在伪政权的官员们中流传，而且越传越盛。这下可气坏了日本侵略军的特务机关。于是，驻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又表演了一番欲盖弥彰的闹剧。

有一天晚上，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派出几个日本宪兵，把汪伪 76 号在苏州的一些特务头子、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局长，分别召到李家，并让宪兵把守着李家大门，把这些人连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聚集在大厅上。当众宣布说：“李士群先生的死，我们是同表哀痛的，意外的是你们在李死后，竟放出一个恶毒的谣言，说李士群的死，是我们日本宪兵毒死的，这是绝对的造谣。我们日本宪兵是代表日本天皇执行宪兵任务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你们的造谣，不仅对我们日本宪兵是最大的污蔑，也是对我们的日本天皇的大不敬，这是不能容忍的，为了证明我们宪兵是不干这种事情的，这几天我们进行了调查，已得到了两个线索，李士群的死是你（用手直指叶吉卿）和储麟荪把他害死的！”

这位和丈夫一起投靠日寇甘当汉奸的共产党叛徒叶吉卿，听了日本宪兵的话，简直当头一棒。大家把目

光都集中到叶的身上,此时她有口难言,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日本宪兵并没就此罢休,还继续讲下去:“据我们调查,你和储麟荪通奸,生怕给李知道,大家没命,于是先下手为强,把李毒死。”

叶吉卿明知是日本人毒死了李士群,而宪兵队反咬一口,而且当众揭她的丑,羞恨交加,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日本人看到叶吉卿已被镇住,又提出第二条“线索”,说是吴世宝的妻子余爱珍所为,原因是李士群害死了吴世宝,余是为夫报仇。余爱珍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又嫁祸于她。其实她心里很明白,丈夫吴世宝也是被日本人在饭中放进了细菌毒死的。

在余爱珍也不知怎样来回答日本宪兵的指责时,日本宪兵队长又说下去:“假如目前关于李士群被日本宪兵毒死的谣言不止,我们为了拿事实来辟谣,一定要把你们三人逮捕起来,进行侦查,弄个真相大白。不过,日本监狱的滋味可能你们也听说过,更主要的是不仅李士群和你们三人要出丑,弄得声名狼藉,而且……”

在日军威胁之下,客厅鸦雀无声,人们都低着头,叶吉卿已止住眼泪,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日本宪兵队长。

看到威胁已经奏效,日宪兵队长把话又转了个弯:“当然罗,我们知道李士群确实是病死的,我们不愿这

件事扩大,但是必须立即停止对日本宪兵队的造谣污蔑,为此你们必须承认,李士群的确是病死的,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和李士群生前也是好朋友,自他死后,对他家属的错误,也可以原谅。”说着,又从文件包里扯出一张纸来又说:“这是一张书面声明,要大家签名承认,李士群死于病重。如不签字,我们立即把叶、储、余三人逮捕,至于其他人嘛!我们看需要而定。何去何从,你们立即决定吧!”

这批平时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汉奸们,今天在日本主子面前,吓得屁滚尿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最后乖乖地在日本人写的声明上签了字。

叶吉卿又放声大哭,并在地上打起滚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签字了。但日本宪兵队并不理会她这一套,上去几个人把她从地上提了起来,把笔和纸都放到她的面前,恶狠狠地说:“快签,快签,不要不识相”。那些汉奸们也劝她:“好汉不吃眼前亏,签上吧!”叶吉卿感到已经身不由己,只好拿起笑,歪歪斜斜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日本人终于用宪兵威胁迫使李士群家属及亲信们就范,最后见诸于报的“确定”消息是:李士群因病死去!

请订阅《文化月刊》

《文化月刊》为我国首家文化新闻刊物。由文化部主管,文化部社会文化司主办。面向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各界读者。及时报道我国文化艺术界的信息、动态;探讨和透视文化热点;评介文化界新闻人物;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各国的文化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知识。

《文化月刊》栏目丰富,引人入胜。辟有专题特写、文化脉动、观察家、文化纵横、热点透视、社会写真、演艺界、艺术长廊、名人访谈、沙滩人语、三味书屋、风雨人生、军营文苑、企业文化、环球了望、台港澳之声等栏目。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文化月刊》每月10日出版,每期定价2.50元,全年定价28.8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6631

(国内统一刊号) CN11—3120/62

邮发代号 2—23 (国外代号 M594)

邮政编码: 100722

地址: 北京·沙滩·文化部

电话: 4013122

辅佐梅兰芳成为伶界大王的三名人

● 葛献挺



梅兰芳（左）与齐如山合影

1894年10月22日，伶界大王梅兰芳先生诞生在北京。这一年属甲午，中国的北洋海军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大海战中全军覆没。

梅兰芳先生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时代；多难兴邦，这个时代也是中国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时代。

梅先生一生事业的成就，均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框架之内，梅先生的主要艺术实践和社会活动，与这个伟大的时代息息相关。历史厚爱梅兰芳，梅兰芳又以他的光辉业绩，回报了历史。

分析梅兰芳先生的成名，除去他的天赋、勤奋等主观因素之外，历史给予他的机遇最少可以说有如下三点：一是在梅兰芳有为之年，幸逢辛亥革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易代革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梅注入了许多新思想，推动了他在艺术上的不断追求。二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古都北京，为梅提供了一个

“百年不散的顾曲者阶层”。民国以前，上至太后、皇帝及百官、黎民；民国以后，则为总统、内阁总长及工薪阶级乃至劳苦大众。这个“阶层”用今天的话说叫作戏曲观众。三是梅兰芳在为艺术而奋斗的征途上，得遇冯耿光、齐如山、王瑶卿这三位伯乐，由于这三位的辅佐奖掖，使梅兰芳在攀登艺术高峰的道路上，能够逢凶化吉，遇水架桥。而这三位的出现，也是时代使之然，他们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梅兰芳的一生事功，经济上离不开冯耿光，剧目上离不开齐如山，艺术表演上则离不开王瑶卿。

这里先说冯耿光。冯耿光字幼伟，广东中山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学校二期生，与蔡锷、蒋百里、唐在礼等为先后期同学，归国后曾为禁卫军骑兵标统，宣统元年改制设军咨府，冯耿光任第二厅厅长。民国以后，冯耿光先后任陆军部骑兵司长，山东临城矿务局督办，总统府顾问。冯国璋代理总统后，经王克敏推荐，冯耿光又任中国银行总裁，该行的前身为大清银行，一千就是十年。

在梅兰芳的朋友当中，冯耿光是位神龙见首不尾的人物，很神秘，一般的场合多不出面，但梅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却都有此公幕后指点。冯同梅家的关系很深，在光绪末年他就同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有往来。梅兰芳先生自己也说：“我跟冯先生认识的最早，在我14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年如一日的，所以在我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梅先生说此话，已是解放以后，当时讲成份，要划清许多界限，说冯耿光是官僚，也不错；说他是政客，也沾边；说冯耿光是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那更是货真价实。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梅先生把他同冯耿光的关系和冯对他的帮助，说到这种程度，那确实是需要勇气、良心和政治胆略的。

谈到冯耿光对梅的具体帮助，事例很多，梅兰芳的名扬国外，与其访日、访美、访苏有关；梅兰芳得以此

访三国，又同冯耿光有重大关系。

梅兰芳首次访日，日方的牵线人是文学家龙居漱三。龙居虽有名，但是无钱，便向冯耿光谈及此事。恰在此时，既是日本财阀、大军火商，又是东京帝国剧场主持人的大仓喜八郎来华访问，大仓同冯在日本时便有交往，此时冯耿光正任中国银行总裁，也正是大仓想在中国结交的权贵。大仓先在龙居陪同下观看《天女散花》，然后到梅的家中进行拜访。大仓回拜冯耿光时正式提出请梅兰芳访日的邀请，并进而商定了访日细节和日程。这才有了日本海关的免检、免验及铁路的免费运送的盛事殊荣。同时冯又通过王克敏的关系，待梅到东京时，请中国驻日使馆举行酒会以造声势，酒会举行时，不但各国大使到会，而且整个日本内阁，连总理大臣都亲临祝贺。

梅兰芳访美，起因于美国驻华公使向总统徐世昌辞行时酒席上的几句话。公使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结果。”当时不少人认为美国公使是有意开玩笑，齐如山便去向司徒雷登，司徒证实美公使所说并非戏言，并允诺在美国找人资助路费。照正常开销，梅率团访美，约五、六万银元即可，但到起程时已过四年，正值美国经济大恐慌，各种开支突增，梅自己垫出四万银元，齐如山拿出八千银元，待到临上船前两天，接连收到美国电报，均说：“美金价一天比一天高，十万之外，非再多筹几万不可。”这时幸而冯耿光费尽心力的张罗，银行界诸公的帮忙，在上海筹了十来万元，梅剧团才能上船远渡大洋前往美国。

梅兰芳1935年访苏，对家里的事总放心不下，冯耿光便将梅兰芳的子女接到自己家中，亲自照料。从中也可看出梅冯两家关系之亲密。

1949年梅兰芳由上海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冯耿光设家宴为梅送行，作陪者有李释戡、狄平子、许姬传等，席间冯耿光劝梅著书立说，以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就是在此建议下搞起来的。

再说齐如山。梅先生说：“我和齐如山先生的认识谈起来是相当有趣的，没有朋友从中介绍，纯粹是由于艺术而结合的。”

齐如山，河北高阳人，生于1875年，1962年病逝于台湾。齐早年求学北京，后留学西欧研究外国戏剧，返国适值辛亥革命，在北京与正乐育化会接触后，常与梨园界交往，民国元年与梅兰芳相识终成益友。齐从此为梅的表演艺术及艺术改革而竭尽全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为梅兰芳编写的各种剧目数十出，其中著名者

有：《嫦娥奔月》、《天女散花》、《洛神》、《西施》、《太真外传》、《红线盗盒》、《生死恨》、《木兰从军》、《凤还巢》、《霸王别姬》等，此外，齐如山也是近百年以来，研究梨园史的专家学人。1931年他与梅兰芳合作筹办北平国剧学会，并附设国剧传习所，培养出刘仲秋、郭建英、高维廉等数十名学生，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国剧画报，搜集了大量戏曲资料。台湾作家陈纪澄先生在评论齐如山与梅兰芳的关系时说：“齐如山自民国元年因《汾河湾》与梅订交后，到民国19年梅兰芳出访美国，获得文学博士荣衔，其间十五、六年，是齐与梅二位合作最密切，成绩最圆满，也是梅兰芳戏剧艺术名扬中外，得能垂诸永久最辉煌的日子，齐氏剧本著作数十种，也多半集中于这一时期，……齐氏提倡神化剧、服装与舞蹈，都饶有革命意义，如果说齐如山是划时代的剧作家，梅兰芳是划时代的演员，似乎都不算过誉。”

全国解放前夕，齐如山去了台湾，从此与梅分手，梅返回北京后，常往齐在北京旧居探望，经常询问齐在台生活情况。念旧之情，常使齐如山感叹，《齐如山与梅兰芳》一书说：“记得梅兰芳逝世的消息，自报上刊出后，齐如老曾有多日精神欠安，于是本已束之高阁的梅氏写的中堂，又挂起来。彼此牵挂，两相默契之情，



王瑶卿

令第三者看来，在世纪末的今天，着实感人。”该书又说：“二氏年龄相差二十几岁，谊属师友，情同骨肉，若是太平年月，两位能朝夕相从，以齐如老的兴趣与渊博，以梅氏的天赋与气质，携手合作，对中国戏剧的发挥绝不止于此，当可断言。偏偏三十年来，天祸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使二氏天各一方，竟因此而丢失的艺术上切磋的大好良机，不但使人为齐、梅二氏之友谊叹，更为国剧艺术叹！”

最后说王瑶卿。

王瑶卿本名瑞臻，瑶卿是其艺名，1881年生于北京。王瑶卿的父亲王彩琳，为著名昆旦。王瑶卿的外公，就是同治、光绪年间的名伶十三绝之一的老旦郝兰田。

梅、王两家有通家之好，几代均有交情，梅兰芳回忆他同王的师承关系时说：“我的《虹霓关》、《樊江关》、《汾河湾》一路戏，都宗的是王大爷一派，二本《虹霓关》不用说了，是他亲授的。《汾河湾》是我老看他的表演，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有一天，我伯父带我到王家，要我向他烧香磕头，正式拜师，王大爷很干脆的冲着我讲：‘论行辈，我们是平辈，咱们不必拘形迹，还是兄弟相称，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兰弟。’我伯父跟他交往最密，知道他的个性爽朗，不喜客套，也就恭敬不如从命的依了他的话，所以，我们虽有师徒之份，始终是兄弟相称的。”

王瑶卿是个在艺术上不断进取的人。时代在前进，艺术也不能老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上。那时，老生唱法已

有了很大变化，谭鑫培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派，深得听众称赞。而青衣方面，变化缓慢，王瑶卿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吸取老生唱腔改革的经验，率先在青衣界大胆试验，勇闯新路。他打破青衣、花旦的界限，吸取花旦的某些作表身段，以克服青衣的呆板。他发明新的唱腔，切磋琢磨，使其日臻完美，尔后传授给他的弟子。十年功夫，被誉“王腔”的唱法，传遍了整个戏剧界。梅兰芳在表演艺术上深受王瑶卿影响，不仅学习了王瑶卿的唱腔和表演，更重要的是承继了王瑶卿的革新精神，在王瑶卿“塌中”（戏曲界术语，谓中年演员坏了嗓子）后，梅兰芳按着他的路子坚定地走了下去，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综上所述，梅兰芳遇见冯耿光、齐如山、王瑶卿三位，可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自徽班进京以来，梨园相传青衣无演大轴者，大轴均属老生或武生。但是，自梅兰芳始，青衣演起了大轴。梅兰芳名副其实为第一人。

梅兰芳先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圆满，十分辉煌！在我们研究探讨梅先生成功的原因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事实：一个人的事业成功，要有种种条件，除了主观因素之外，客观因素则离不开人、财和权力的支持。过去人们讳言这一点，未必是对的。梅先生的事业已足千古，但他开创的改革戏曲的艺术道路，尚未走完，需要后来人。

（责任编辑 洛松）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介绍

《抗日战争研究》，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是以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季刊。该刊发表关于日本侵华中国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章，研究敌后根据地，正面战场的战役得失等，有些文章论述抗战时期的人物活动，诸如毛泽东、张闻天、叶挺、宋庆龄、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阎锡山等。该刊内容还涉及中国抗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大部分论文都引用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观点，学术水平较高。《抗日战争研究》文章的作者，除大陆的以外，还有港台的，有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俄国的作者。该刊所载除论文外，还有回忆录、考证、随笔、书评书讯、各地抗战遗址介绍内容。它对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推进统一祖国事业和正确认识国际形势，都是有益的。

《抗日战争研究》季刊，大32开，国内由邮局发行，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该刊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邮编100006。

经济形势越好

●李德复

越要反对形式主义

前不久,我到自己曾蹲过点的农村,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

我过去在农村、在山区、在基层呆了二十年。拿过去与现在的感觉比,总的看,这些农村主流确实是好的。有些问题过去从没解决,现在真的解决了。

一、在农村,大家真的都有饭吃了,再不愁肚子饿了;二、票证真正进博物馆了;三、农村的道路,哪怕是山区,宽了,多了,大部分能通拖拉机和汽车了;四、农村的民主气氛较以往浓多了;五、农民不是死守土地了,眼光不只是看到县城,有的看到省城,看到广州,甚至看到海外。

但大好形势下也有缺点,其中一个是老生常谈的、一直没好好解决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即好大喜功,好搞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主观风、浮夸风、命令风,如果不认真解决,会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会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这些不正之风,是以什么“正确”面貌表现的?是以搞本地区本县本土的“基本建设”出台的。应该说,大部分基本建设是发展生产必需的,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对这类基础建设,即使是人民负担重一点,过一点头,人民也是理解的。

但要看到,有些基本建设并非如此,是盲目扩大,建成了,并非促进生产力发展,并没改善人民的生活,甚至是破坏了生产,浪费了人力与财力,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得不偿失。如某地,地理环境、资源情况,并不适宜拆那么多房子,重修那么多街道和新楼,以及搞那么宽的马路,竖那么辉煌的路灯,开辟那么多的开发区,根本不管栽了梧桐树,有没有凤凰来?反正就那么盲目的干!到银行拆借贷款干,挪用干部、教师的工资干。白条子怎么来的?绿条子又怎么来的?干部的工资为什么发不出?教师的工资为什么发不出?这是重要原因!这使我想起上海《报刊文摘》上的一则新闻,一个农民,多次到邮局取不到亲戚寄来的汇款,又怕汇单过时作废,就自杀抗议!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按说,我们形势那么好,经济发展速度那么快,怎么可能发不出工资?怎么可能向农民、教师、干部打白

条、打绿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大笔大笔的款子挪作他用了!挪到一些干部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上头了。我去过一些乡镇,不管需不需要,都在大兴土木,不管底子如何?有没有财力,只顾表面功夫,只管好看,就象当年大办钢铁一样,一窝风,一起上。

若问为什么有那么一批干部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呢?而且历久不衰呢?过去这么搞,现在还这么搞呢?中国有名古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有的领导喜欢看形式主义的东西,只看路宽不宽、直不直,只看房子高不高、大不大、洋气不洋气,只看开发区的规模雄不雄伟,漂不漂亮?而不看它的实质——到底有没有经济效益?到底是不是为人民谋福利?到底对社会主义有没有好处?结果必然会害党、害国、害民、就是不害搞形式主义的人——有些干部就因此而飞黄腾达!

这些情况使我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那时候,放“卫星”,一亩麦子几千斤;一亩产稻谷几万斤!小孩子在稻谷穗上跳舞!跟着就是“不干不干,一天三顿饭,搞不搞,一个月工资跑不了?”“敞开肚皮吃”,“跑步进共产主义”,什么共产主义?是形式主义,浮夸风,吹牛风,导致苦难的1959!

这些教训难道我们忘记了?决不能!

当年,还不是有这么一批干部顺着领导的眼色报数字,顺着领导想快上说假话!这确实害领导,也害人民啦!所以,对那些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的干部决不能提拔,甚至应给以严厉处分!一个地方好不好?目前是不是应有个最起码的标准?即对农民决不打白条和其它什么绿条、红条;老实地按中央政策、省市规定向农民收税,决不乱摊派;能按月给教师、干部发工资……如果连这最基本的几条都做不到,还谈得上什么政绩?什么改革开拓?那就要对这个地方的领导亮黄牌,扎扎实实地帮助他铲除形式主义和浮夸风!也只有铲掉这毒瘤,发展的速度,才不是虚假速度!

(李德复同志系武汉《书刊文摘导报》社社长,这是他给本刊编辑部的一封信)

炎黄春秋



“中国山东贸易与投资研讨会”会场



邓文甲博士设计的安娜西斯岛大桥

海外华侨投资中国大陆纪实

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

语言与网络新境界

“万宝路牛仔”攻入神州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
来龙去脉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3.20元